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洛林	厉以宁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克崮	朱 民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周文重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楼继伟	聂振邦	樊 纲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 / John Frisbie
欧伦斯 / 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 / 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 / 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 / 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 / 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 / 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新年寄语

冰雪消融，春潮涌动。硕果累累的2013年已经远飞而去，充满着希望的2014年正健步向我们走来。

回眸2013年，我们党胜利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描绘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为未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号角，必将带来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大发展。

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把智库的建设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不仅提出了中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对智库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国智库如何站在为全人类谋福祉的高度，切实促进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促进各国交流与合作？如何担当历史责任，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这要求我们智库充分发挥智力密集的优势，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观大局、谋大事、创大业，针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加强研究，提出富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方略和措施，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同时，也要求我们打破国家、部门、学科之间的界限，广泛汇聚学术资源，建立一个国际国内智库合作交流的平台。

《全球化》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智库刊物，自创刊以来，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坚持“创新、求实、睿智、兼容”的办刊风格，高端定位、高层次起步、高质量办刊，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主动地为中央决策服务，为社会各界和企业服务；坚持“双百”方针，兼容并蓄，解放思想，尊重学术自由；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倡导良好文风；坚持精益求精，着力打造精品，实施质量兴刊战略；力求与同业建立广泛的联系机制，携手合作，共享思想智慧的创新成果，成为国内外智库交流研究的重要平台。

我们相信，《全球化》杂志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和培育下，一定能够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祝朋友们阖家欢乐、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全球化》编委会

2014年1月

• 本刊专论 •

- | | |
|--------------------|----------|
| 关注印度尼西亚可能出现非理性金融恐慌 | 刘遵义(005) |
| 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 | 许宪春(014) |
| 中国智库的历史担当 | 卢中原(021) |

• 宏观经济 •

- | | |
|---------------------|-------------|
| 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研判 | 陈文玲(025) |
| 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及评价指标初探 | 宋 群(035) |
|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 | 罗伯特·普森(048) |

• 国际经济 •

- | | |
|---------------------------------|----------|
| 2014 年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 王绍辉(059) |
| 2014 年世界经济将加快增长
——全球主要机构预测综述 | 刘仕国(067) |

• 产业经济 •

- | | |
|---------------------|--------------|
| 电子信息产业:稳增长前景可期 | 罗仲伟(076) |
| 中国流通现代化发展现状、思路及政策建议 | 周凌云 顾为东(086) |

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选择与效率研究

方 虹 方 惠 姚 鹏 何 琦(097)

• 理论前沿 •

用法治保障改革的平稳进行

张大勇(109)

• 名人观察 •

改善中国城市财政

黄佩华(118)

• 英文摘要(ABSTRACTS) •

(123)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征稿通知

(127)

欢迎订阅《红旗文摘》

(封三)

CONTENTS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able Irrational Financial Fear in Indonesia	<i>Liu Zunyi</i> (005)
About the Revisions o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of China	<i>Xu Xianchun</i> (014)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s Think Tanks	<i>Lu Zhongyuan</i> (021)
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s over the Next Decade Prospects	<i>Chen Wenling</i> (025)
Chinese Common Prosperity: Contents, Features, and Evaluation Indexes	<i>Song Qun</i> (035)
Reforming the Chinese Pension System	<i>Robert C. Pozen</i> (048)
An Analysis of 2014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Wang Shaohui</i> (059)
World Economic Growth Will Accelerate in 2014: A Summary of Major Global Institutions' Predictions	<i>Liu Shiguo</i> (067)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The Future Steady Growth Expected	<i>Luo Zhongwei</i> (076)
The status, Idea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Zhou Lingyun & Gu Weidong</i> (086)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 Selection and Mode Efficiency	<i>Fang Hong, Yao Peng, Fang Hui & He Qi</i> (097)
Ensure the Steady Reform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i>Zhang Dayong</i> (109)

· 本刊专论 ·

关注印度尼西亚可能出现非理性 金融恐慌

刘遵义

摘要：东亚货币危机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印尼卢比大幅贬值。要防止资本外逃、汇率失控、经济受损，最首要的任务是防止印尼国内企业和个人产生非理性金融恐慌。及时、坚决的干预可以发挥作用，然而，干预能够成功的保证是外汇资源必须被外界认同，是极为充足的。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 非理性金融恐慌 外汇负债 可流动外汇负债

作者简介：刘遵义，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

一、引言

1997 年 12 月 1 日，美元兑印度尼西亚卢比收于 1:3732.5；到 1998 年 1 月 23 日，卢比全面崩盘，1 美元可兑换 14555 卢比。1998 年 2 月 10 日，卢比兑美元汇率短暂回升至 7287.9:1，之后开始大跌，跌至 1998 年 6 月 17 日的 16097.4:1（当日曾一度达到 17500:1）。事实上，卢比本应价值更高。如有充足的意愿和资源，卢比兑美元汇率大可维持在 7000:1。然而，非理性金融恐慌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海外投资者和放贷人，还影响了印尼国内企业和民众。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和其它国家也没有向印尼提供及时的帮助，最终酿成灾难性后果。

图 1 和图 2 按时序展示了 1997-1998 东亚货币危机爆发前及 2007 年 1 月 1 日至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印尼卢比的每日汇率。美次贷危机随后演变为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而美联储为应对金融危机，先后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QE）。两个图表明，卢比兑美元自 2000 年起平均一直保持在 9000:1。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境外投资者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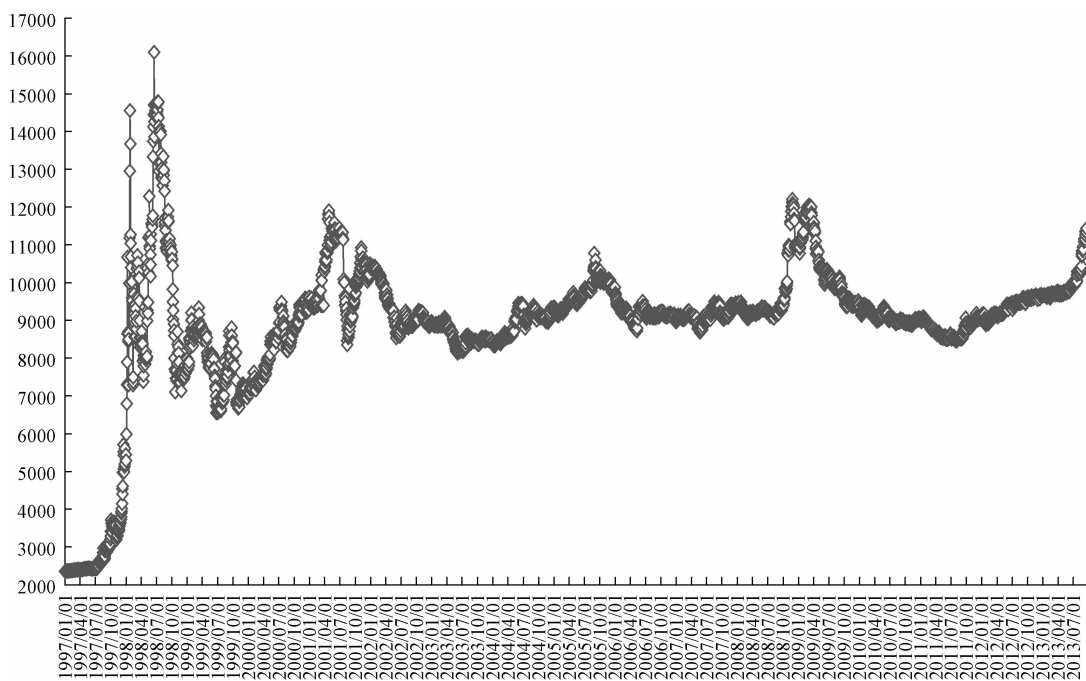


图 1 1997 年至今,印尼卢比与美元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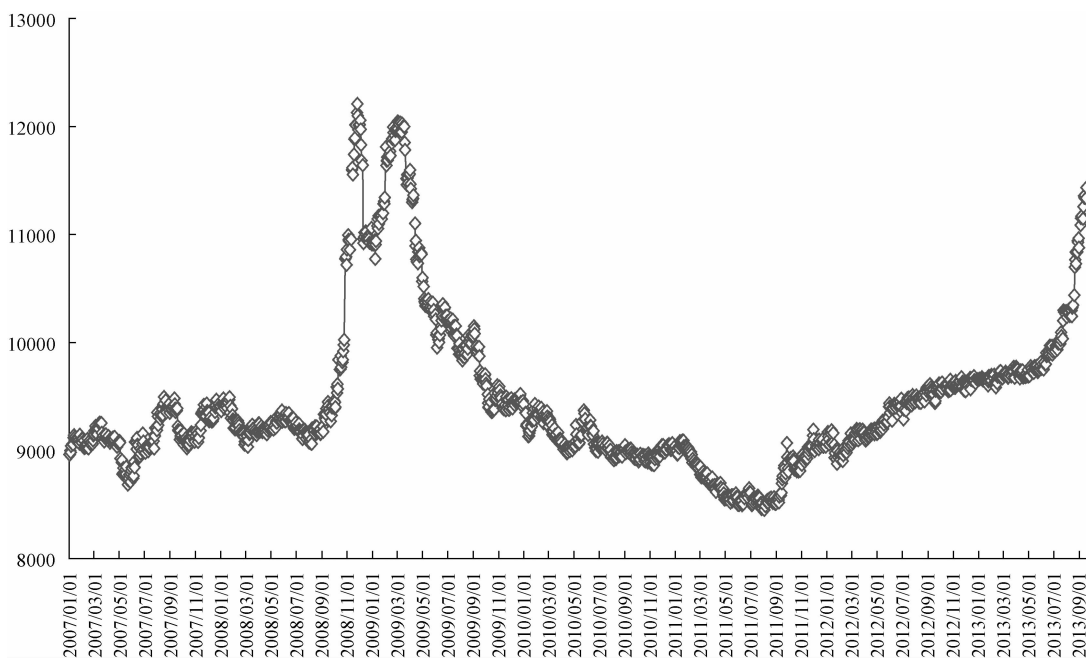


图 2 2007 年至今,印尼卢比与美元汇率

放贷人从世界各地撤回资金，以满足其本国市场的需要，从而直接导致卢比短时大幅贬值。2009 年初，美国开始施行量化宽松，向全球释放流动性，直接导致卢比随之升值。2013 年 5 月 22 日，美联储向外宣示，会逐步退出继而停止量化宽松，故而，市场对美国退市的担忧上升，资本流入开始逆转，导致印尼卢比大幅贬值，至今尚未完全回升。

然而，非理性金融恐慌是可以防止的，汇率市场过度调整的现象可以得到纠正和预防。需要的是，政府要公开展示足以扭转人们对经济特别是汇率预期的可信意愿和资源。如果汇率预期能够加以改变，每个人的处境都将会改善，政府也就会相对容易作出必要的调控。

2013 年 5 月美联储首次公开提出“逐步退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想法以来，印尼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资本和外汇外流，印尼卢比出现了与 1997 年晚期惊人相似的加速贬值。随着发达经济体利率上扬，境外投资者和放贷人将继续从印尼撤资，印尼出口商延迟调回外汇收入，进口商则加快支付购买进口商品的费用（通常以外汇支付）。问题是印尼是否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应对近期的资本外流。如果外汇市场认为印尼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境外投资者和放贷人将竞相撤资。这将引起印尼国内企业和民众的资本外逃，汇率可能会失控，而印尼经济将蒙受灾难性损失。因此，最首要的任务是防止印尼国内企业和个人产生非理性金融恐慌。及时、坚决的干预可以发挥作用，主动干预更胜于被动干预。然而，必须保证干预能够成功，而外汇资源必须被外界认同是极为充足的。

二、可流动外汇负债与外汇储备比

1995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我写了题为《东亚是否有一个新的墨西哥？》的论文，并在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劳伦斯·克莱因教授主持的多国宏观经济预测项目 Project LINK 南非比勒陀利亚会议上发表。我在论文中预测，印尼、韩国和泰国货币都将面临风险。1996 年，我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上重申了这一观点，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亦与会。随后，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其中，我使用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是“可流动外汇负债”与一国官方外汇储备比。外汇市场出现可能贬值的初步迹象时，境外直接投资者会停止来投资，境外放贷人不再放新贷，也不会延长旧贷，他们会撤资离开，境外证券投资人会清算投资存量总数，撤回资金。潜在外汇流出包括短期外币贷款（指一年内到期的外币贷款）、外币债务年利息、境外组合投资（股票和债券）累积本金与收益。但是，现有非流动外国直接投资不能被轻易撤离或调回。此外，出口商会将外汇收益囤积海外，等待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出口获得的外汇流入将大幅减少；而进口商为避免汇率恶化，则加快支付，用于进口支

付和预支付外汇的外流将显著增加。因此，在最坏情况下，可能还需要与 6 个月至 1 年的进口总额等值的外汇额。

因此，对外汇的潜在需求相当于 1 年内到期的外币贷款、外币债务年利息、海外组合投资累积本金与收益和与 6 个月至 1 年的进口总额等值的外汇总额，统称为“可流动外汇负债”。潜在外汇供应是印尼中央银行—印尼银行所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水平。如果潜在外汇需求明显超过潜在外汇供应，那么官方外汇储备就可能会出现“挤兑”。除非及时得到制止，否则，这将引发印尼国内企业和个人资金向国外流走，可能导致 1997-1998 年货币危机重演。

图 3 为印尼“可流动外汇负债”与官方外汇储备季度性比例表。图表表明，潜在外汇需求明显高于潜在外汇供应：以 6 个月的进口来看，需求是供应的近 240%；以 1 年的进口来看，需求是供应的 340% 之多。因此，除非潜在外汇储备供应量显著增加，否则官方外汇储备可能会出现“挤兑”，因为没有境外投资者和放贷人愿意承担成为最后撤资者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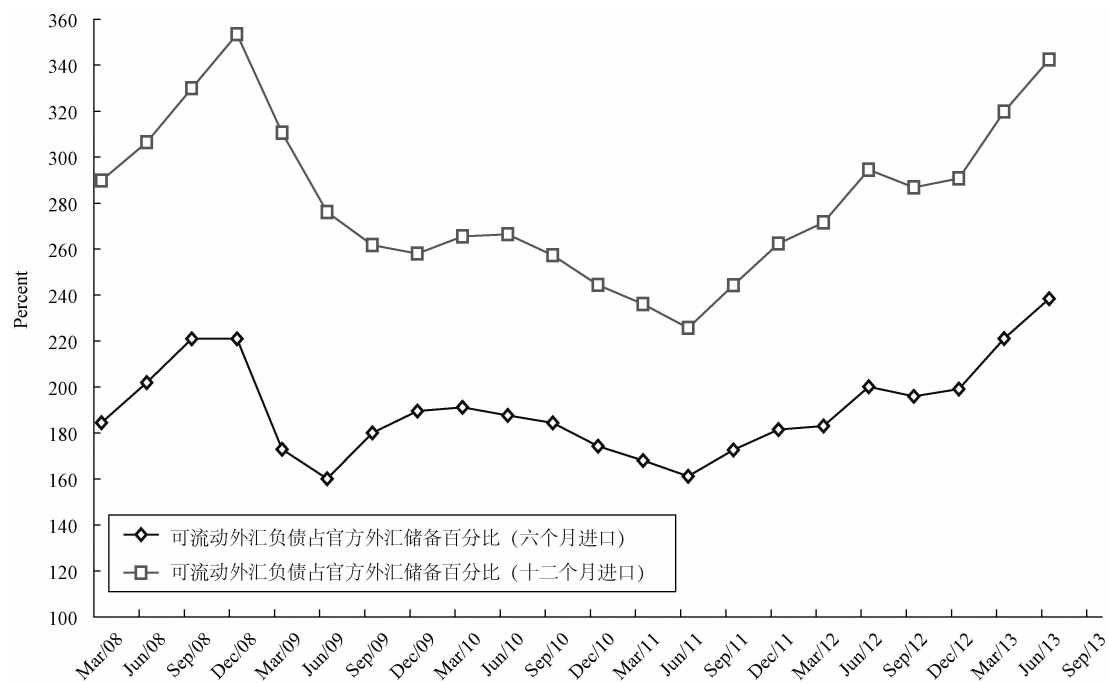


图 3 印尼可流动外汇负债占官方外汇储备百分比

在诸如是否有资本管制这样的不同情况下，已有不少成功干预外汇市场的案例。1983 年，中英关于香港主权回归的政治谈判进展不顺，一直与美元自由浮动的港币汇率暴跌。由于香港没有实施资本管制，港元暴跌，汇率从约 6 港币:1 美元跌至超过 10 港币:1 美元。后来，香港政府介入，将汇率稳定在 7.8 港币:1 美元。香港政府的介入成功地

制止了投机行为和资金外流，港币兑美元至今仍维持在 7.8:1。

1993 年，中国并行双重人民币汇率：即 5.762 元:1 美元的官方汇率和进出口商之间根据在上海外汇市场进行交易所确定的“调节”汇率（“市场汇率”）。之后，市场汇率经受了巨大的下调压力，一度跌至低于 10 元:1 美元。中国人民银行随后介入“调节汇率”市场，将汇率维持在 8.7 元:1 美元。最终，人民币成为经常性账户可兑换货币，而双重汇率也于 1994 年实现了统一，最初固定在 1 美元:8.7 元。实际上，在 1997-1998 年东亚货币危机爆发前夕，人民币一直在缓慢升值，达到 1 美元:8.3 元。

1994 年，墨西哥出现金融危机，无力偿还其发行的“特索国债”（以美元偿还的债券）。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加拿大和美国的共同参与下，美国政府向墨西哥提供了总值近 500 亿美元的救助，有效地稳定了墨西哥外汇市场和墨西哥比索的汇率。据报道，实际上使用了不到 100 亿美元的资金。

上述案例表明，政府大胆坚定地支持汇率、维持国内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的信心和改变他们对市场前景的预期，是至关重要的。国内企业和个人投资者需确信各自政府有坚定的意志和充足的资源支持本国货币。如此，资金外流现象将停止，外汇市场也将稳定。我们只需要果敢的行动和足够的专项资金。防止非理性金融恐慌类似于解决银行挤兑，存款者一旦确信银行有足够的资金可供提取，便会停止挤兑。

三、积累充足的外汇资源

当“可流动外汇负债”与官方外汇储备比接近一致时，即如果境外投资者和放贷人确信将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满足所有的需求（包括外资撤离、到期外币贷款偿还、进口所需资金及利息的支付），他们就会放心地把资金留在被投资国。据报道，当前印尼央行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总额不足 1000 亿美元。这意味着，印尼可能还需 1400 亿至 2400 亿美元的额外外汇，以满足外国放贷人、组合证券投资者和对印尼出口商的潜在需求。

如何筹集这些外汇？印尼当然可以启动《清迈倡议》，号召成员国提供部分所需外汇。印尼当然应该这样做。一个可能的问题是，许多成员国自身也同时面临着不断恶化的收支失衡、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该组织不太可能及时地提供充分救助，帮助防止印尼出现的非理性金融恐慌。而国内经济问题重重的美国亦可能需要获得国会批准，也不太可能向印尼提供实质性援助。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已超过 3.7 万亿美元，有能力单独或和日本一起以信贷限额或 5-10 年中期贷款的形式向印尼央行提供 1500 亿美元的贷款。印尼央行获得额外资金后应可支持卢比汇率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此外，中国可根据情况所需作出快速决定。但是，1500 亿美元的贷款可能远超出当前印尼央行和中

国人民银行现有互换协议所规定的数额。因此，需要做出一个专门的安排。

中国和（或）日本这样的潜在放贷国必须得到保证，不会蒙受以实际购买力衡量的债务损失。因此，贷款本金和利息可能必须与印尼石油、其它自然资源和制造业产品价格挂钩。换言之，贷款本金和利息实际价值应受到保护，免受印尼或全球通货膨胀影响。只要放贷国本金和利息的实际购买力得到充分保障，此类挂钩贷款可以使实际利率维持在每年不高于 3% 的低水平。

四、确定汇率水平

如果有意愿和外汇资源合作，印尼卢比汇率应维持在什么样的水平？过去的经验表明，只要汇率水平反映的贬值，相较于最近贬值的起点，是一个合理的、显著的，且被认为是可信的值，那么确切的汇率水平其实并不重要（例如，1983 年港币兑美元汇率可以维持在 8:1；1993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以维持在 8.5:1。这样做都可以）。然而，即使印尼卢比价值更高可能有助于降低其国内通胀率，但期望能够成功地推动卢比升值并不现实。但将卢比汇率稳定在新的且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是可行的。而且，较低的支持水平需要更少的外汇储备。

图 2 表明，一个可行的汇率水平介于 10000 卢比:1 美元至 11000 卢比:1 美元之间。尽管会有变动，截止 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印尼卢比汇率一直保持在约 9000 卢比:1 美元这样合理稳定的水平，且在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也一直保持在同样的区间。然而，特别是鉴于印尼通胀率比美国高得多，将汇率稳定在 9000 卢比:1 美元是不太可能的。卢比和美元间如要保持同样的实际汇率，就需要卢比兑美元进行名义贬值，这也将有助于保持印尼经济及其出口的对外竞争力。因此，10000 卢比:1 美元到 11000 卢比:1 美元之间的汇率看来符合两国的通胀率及普遍的期望。当前近 11500 卢比:1 美元的汇率反映了外汇市场过度的风险规避和超调。

五、配套措施

印尼央行维持卢比在某个水平和区间，应该同时采取一些配套措施来减少印尼金融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首先，印尼政府应继续允许所有经常账户交易、现有到期的外币借贷本金及利息支付、外国投资者资金和利益调目。此外，还应考虑对其他非经常账户外汇购买实施临时性管制。临时性管制的目的在于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同时，保持外汇储备。待汇率稳定后，便可取消临时管制。

其次，同样需要防止印尼卢比和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1997-1998 年，外国对冲基金在几乎所有的东亚金融市场所使用的一种流行的做法是“双短策略”。乔治·索罗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首先使用这一策略成功地买卖英镑。基本来说，“双短策略”要求投机“大鳄”同时抛空一国货币及其股票或债券。如果政府想维持汇率，则需不断购进投机者出售的本国货币，并提高利率。但这样做将导致本地市场流动性收缩，利率上升，证券和股票市场下跌。因此，投机者将或因抛售股票和债券获利，或因抛售货币而政府未能成功维持币值而获利，或者从上述两种情形中都获利（就像 1990 年初投机英镑一样）。图 4 和图 5 显示，印尼卢比大幅贬值常常与汇率上升和证券市场下挫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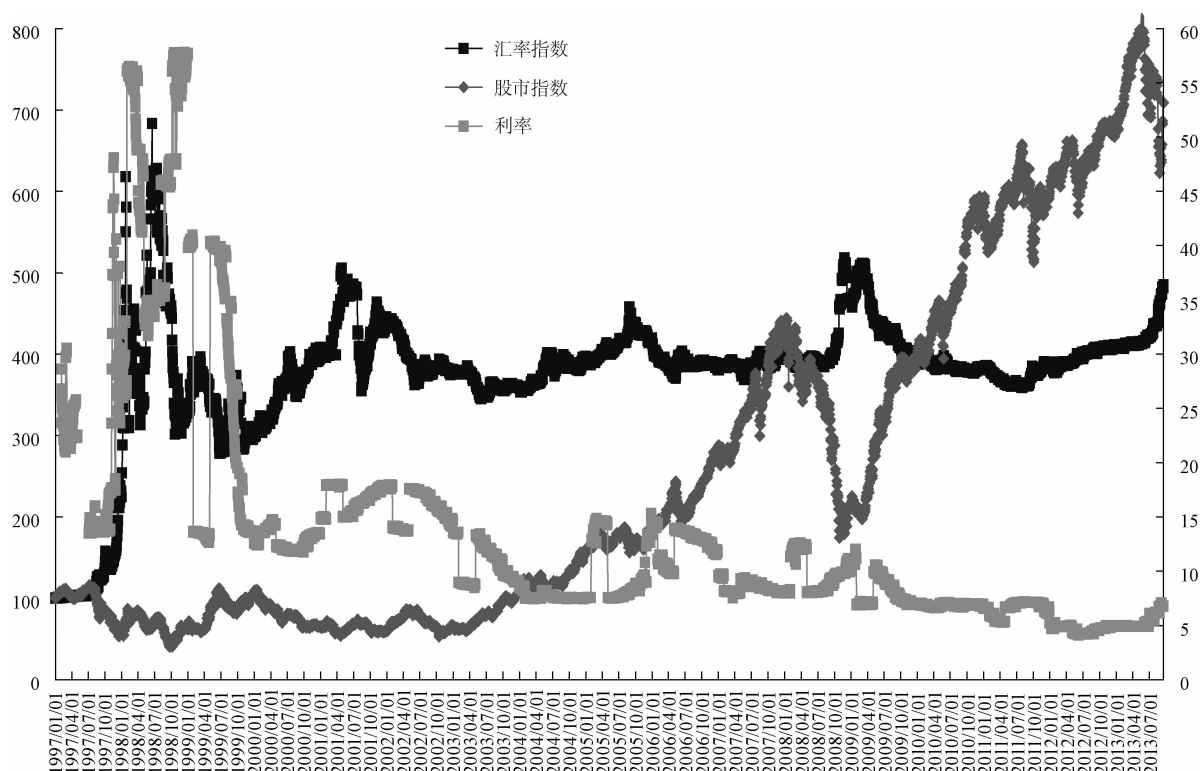


图 4 1997 年至今，印尼汇率指数、股市指数和利率三者关系

“双短策略”也可以相反的“双长策略”形式奏效。基本上，投机者可同时多头买进一国货币及其股票和债券。如果该国政府不希望汇率涨幅过大，它可以用本国货币购买流入的外汇和降低利率的方式回应。国内流动性的增加亦会引发当地利率降低，利率下降会导致股票和证券市场上扬，所以投机者在任何一种情况或两种情况下都将获利。比如，自 2009 年年初起印尼卢比和股市的上升，均可以直接归因于美联储量化宽松（QE）带来的投机性资本流入（图 5）。

为阻止并避免国外对冲基金通过双短（或双长）策略进行掠夺性投机，必须对购买和出售即期和远期外汇、股票和债券提出高保证金的要求。同时股票和债券的赤裸卖空（即卖空者不持有该股票或债券）也应当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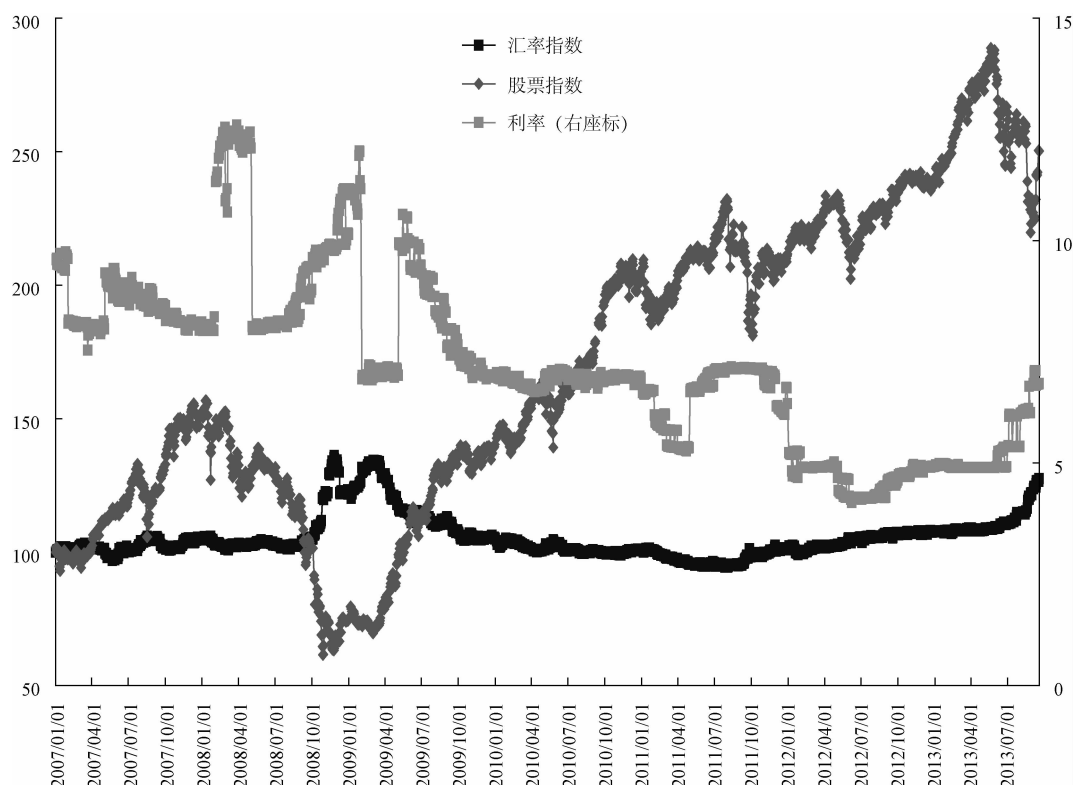


图5 2007年至今印尼汇率指数、股市指数和利率三者间关系

稳定汇率和抑制印尼卢比贬值不仅对降低印尼国内通胀率有额外的好处，还将减轻利率上升的压力。仅抬升利率不太可能抑制资本外流及稳定汇率，但无疑将降低企业投资意愿，从而减少总需求及就业。这还将对证券和其它资产市场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通过支持卢比汇率在某个特定水平上来稳定汇率是较好选择。

六、结 论

时间是关键，印尼中央银行越早能让外界了解其有意愿和资源来支持卢比在某个合理的水平上越好。若要成功达成这一目的，印尼央行必须采取措施增大可用外汇资源总量。如果可整合让外界看得见的充足资源，可能并不需要将其全部用尽，就可达到目的。

责任编辑：刘英奎

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

许宪春

摘要：为适应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管理的需求，国家统计局正在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订。本文阐述其中一些重点修订内容，包括引入知识产权产品概念，将研发支出计入 GDP；引入经济所有权概念，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计入农民财产收入；引入雇员股票期权概念，将其计入劳动者报酬；引入调整后已生索赔概念，修订非寿险服务计算方法；引入实物社会转移概念，开展实际最终消费核算；引入市场租金法，修订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

关键词：研发支出 经济所有权 雇员股票期权 实际最终消费 市场租金法

作者简介：许宪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一、引言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颁布了国民经济核算新的国际标准，《国民账户体系，2008》^①以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实施或制定了实施计划。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已经实施了 2008 年 SNA，欧盟和日本制定了实施 2008 年 SNA 的计划。我国现行国民经

^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包括不同的版本，分别于 1953 年、1968 年、1993 年和 2008 年颁布，简称为 1953 年 SNA、1968 年 SNA、1993 年 SNA 和 2008 年 SNA。1993 年 SNA 和 2008 年 SNA 都是由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制定的。

济核算体系是否需要修订，以过渡到新的国际标准呢？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 1952—1984 年，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适应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管理的需求，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采用的是产生于前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 MPS），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是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这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净产值，即国民收入^①。第二阶段是 1985—1992 年，这一时期是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经济管理的需要，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行了从 MPS 体系向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 SNA 体系转变的混合型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指标既包括 MPS 体系的国民收入，也包括 SNA 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体系已经突破了物质生产的界限，反映了非物质服务活动创造的增加值。这一体系的标志性文件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它是依据 MPS 和 1968 年 SNA 制定的，体现了混合型特点。第三阶段是 1993 年至现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管理的需要，我国采用了 SNA 体系，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实行这一体系的标志性文件《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它是依据 1993 年 SNA 制定的。这个体系表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已经完成了向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国际标准的过渡。

从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管理需求的变化以及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随着宏观管理需求的变化，随着国际标准的变化，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要修订，使之适应新的体制、新的需求，也使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核算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

2003 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产生许多新情况，经济管理产生新的需求，国际组织又颁布了新的标准，所以需要对我国现行的核算体系进行新的修订。

这次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在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方面将不作根本性的调整，但将涉及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基本指标和基本计算方法的修订。本文仅阐述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修订内容。

二、引入知识产权产品概念，将研发支出计入 GDP

当今世界，研究与开发、计算机软件、原创性文学艺术作品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固定资产的属性。因此，2008 年 SNA 引入了

^①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第 10 页，1987。

知识产权产品概念，把它作为固定资产的组成部分，把关于这种产品的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 GDP，用以描述和反映这些产品及其作用。2008 年 SNA 把知识产权产品分为五种类型：研究与开发，矿藏勘探与评估，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娱乐、文学和艺术品原件，其他知识产权产品。其中，矿藏勘探与评估，计算机软件与大型数据库，娱乐、文学和艺术品原件在 1993 年 SNA 中已经被归入固定资产，2008 年 SNA 将研究与开发纳入固定资产，把研究与开发支出由原来作为中间投入，修订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 GDP。

我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已经按照 1993 年 SNA 的建议，把矿藏勘探与评估支出、计算机软件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 GDP 了，但是还没有把其他几种类型知识产权产品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 GDP。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也积累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例如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不断强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劳动供给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等。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创新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 R&D）经费支出，由 2002 年的 1287.6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10298.4 亿元，10 年间增加了约 9000 亿元；R&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从 2002 年的 1.07% 增加到 2012 年的 1.98%。随着 R&D 经费支出的逐步增加，研究与开发活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研究与开发支出核算，我国也拥有了比较丰富的基础数据，例如，我国分别于 2000 年和 2009 年进行了两次 R&D 资源清查，常规年度也开展了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研发活动的调查，掌握了 R&D 经费支出及构成等数据。同时，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开展研究与开发核算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按照 2008 年 SNA 的建议，引入知识产权产品概念，将研究与开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 GDP，不仅存在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可能性。在广泛搜集研究与开发支出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按照 2008 年 SNA 的建议，分别从生产和需求两个方面开展了将研究与开发支出计入 GDP 的核算方法研究，得出了初步测算结果，目前正在论证阶段。

关于数据库，娱乐、文学和艺术品原件，其他知识产权产品，我国还缺乏统计资料，需要在以后条件成熟时逐步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 GDP。

三、引入经济所有权概念，将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收入计入农民财产收入

2008 年 SNA 引入了经济所有权概念，它是相对于法定所有权而言的。法定所有权指的是，在法律上拥有货物和服务、自然资源、金融资产和负债，并能够持续获得相应经济利益的权利；经济所有权指的是，承担了货物和服务、自然资源、金融资产和负债有

关经济风险，享有相应经济利益的权利^①。通常情况下，经济所有权与法定所有权归属于同一所有者。当经济所有权与法定所有权分离时，2008年SNA建议按经济所有权进行核算。这样，可以使有关核算结果更加合理和符合实际情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推动土地集约化经营，我国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进行流转。近年来，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象越来越普遍。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合同）总面积的21.5%^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应当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呢？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所以，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对相应的土地并不拥有法定所有权。如果按照法定所有权的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不能作为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的财产收入处理。但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对相应的土地承担经济风险，享受经济收益，所以拥有相应土地的经济所有权。按照经济所有权的原则，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成为土地的经济所有者，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其他个人或单位使用所获得的收入，就形成了SNA定义的地租，从而构成农民财产收入的一部分。因此，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引入2008年SNA的经济所有权概念之后，作为我国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就有了合理的处理方法。

四、引入雇员股票期权概念，将其计入劳动者报酬

雇员股票期权指的是，公司授予其部分员工在未来一个约定的日期或一段时间内，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的权利。被授权的员工大多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等，他们一般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以被授权，这些条件往往同公司业绩及个人业绩挂钩。如果被授权者经营管理有方，公司业绩优良，他们就可以在约定的时间，以原约定的较低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雇员股票期权是作为对员工的酬劳或激励而给予他们的，与员工在企业的表现和业绩有关，因而具有劳动者报酬的属性。近年来，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雇员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员工的重要方式。因此，2008年SNA引入了雇员股票期权概念，建议对雇员股票期权价值进行估值，将其计入劳动者报酬。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雇员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员工的一种

^①见2008年SNA，第3章，第21和26段。

^②资料来源：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解读中央1号文件》，《农民日报》，2013年2月3日。

方式。2006 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以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得到了快速发展。据证监会统计^①,截止 2013 年 4 月 30 日,共有 464 家上市公司提交了股权激励计划,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18.6%。其中 308 家上市公司的 357 个股权激励计划处于实施阶段。从股权激励的方式看,大部分的股权激励计划采取授予期权的方式。因此,雇员股票期权制度正被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和实施,所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按照 2008 年 SNA 的建议,引入雇员股票期权概念,进行正确估值,计入劳动者报酬。

五、引入调整后已生索赔概念,修订非寿险服务计算方法

在 1993 年 SNA 中,非寿险服务产出等于实收保费,加上追加保费,减去实际赔付。在正常年度,用这种方法计算非寿险服务产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发生巨大灾难,产生巨额保险赔付的年度,用这种方法计算的非寿险服务产出会出现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值。因此 2008 年 SNA 对非寿险服务产出的计算方法作了改进,用调整后已生索赔代替实际赔付^②,其中,调整后已生索赔可以利用统计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平滑后得到。2008 年 SNA 还指出,从理论上讲也应该对追加保费做类似调整,但由于追加保费的波动要小于赔付,实践中这样的调整可能并不需要。但是,追加保费来源于保险公司的投资收入,在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的年度,投资收入的波动性会很大,因此也有进行调整的必要。许多国民经济核算专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联合国和欧洲中央银行在即将共同出版的《SNA 中的金融生产、流量与存量手册》中,将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在非寿险服务产出计算中,追加保费也像赔付那样根据历史数据做平滑调整。

我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关于非寿险服务产出的计算,采用的是 1993 年 SNA 的方法。国际组织关于非寿险服务产出计算方法的改进是合理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也应引入调整后已生索赔和调整后追加保费概念,修订非寿险服务产出的计算方法。

六、引入实物社会转移概念,开展实际最终消费核算

在 2008 年 SNA 中,有一类重要的转移,称为实物社会转移,指的是政府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住户的消费性货物和服务^③。这类货物和服务的支出由政府 and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承担,被住户所消费。

2008 年 SNA 设置了两类最终消费指标:一类是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住户部门、政府

①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 年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2013 年 8 月 16 日。

②见 2008 年 SNA,第 6 章,第 185 段。

③见 2008 年 SNA,第 8 章,第 141 段。

部门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一类是实际最终消费，包括住户部门、政府部门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的实际最终消费。这两类指标之间具有以下关系：

住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 = 住户部门最终消费支出 + 住户部门从政府部门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获得的实物社会转移

政府部门实际最终消费 = 政府部门最终消费支出 - 政府部门对住户部门的实物社会转移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实际最终消费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最终消费支出 -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对住户部门的实物社会转移

由上述可知，住户部门实际最终消费反映了居民获得的所有消费性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它不仅包括了住户部门自身承担支出所获得的消费性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还包括住户部门以实物社会转移的形式从政府部门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获得的消费性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例如政府部门为住户部门提供的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的价值，体现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而政府部门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以实物社会转移的形式向住户部门提供的个人消费性货物和服务，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体现了政府部门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在改善居民生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政府用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民生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例如，在教育方面，政府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教育水平逐步提高；在医疗卫生方面，政府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逐步提高。

我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设置了一类最终消费指标，即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①；没有设置实际最终消费指标，包括居民实际消费和政府实际消费。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我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和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需要引入实物社会转移概念，设置实际最终消费指标。目前，国家统计局正在开展居民实际消费和政府实际消费核算的方法研究和数据测算工作，核算方法和测算数据通过论证后，将正式开展实际最终消费，包括居民实际消费和政府实际消费的核算工作。

七、引入市场租金法，修订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

本文中的居民自有住房指的是，居民自己拥有、自己居住的住房，不包括居民自己拥有、出租给其他用户的住房。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居民自有住房需要计算住房服务价

^①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没有单独划分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所以，最终消费支出中不包括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消费支出。

值。从使用核算的角度，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属于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部分；从生产核算的角度，剔除维护修理费、物业管理费等中间投入费用之后，属于房地产业增加值的构成部分。由于居民自有住房并没有发生市场租赁行为，所以，自有住房服务价值只能采取虚拟计算的办法。虚拟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市场租金法，即按市场上相同类型、相同大小和相同质量的住房租金来估算。这种方法适用于存在规范的住房租赁市场的国家。二是成本法，即按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成本来估算。其中的成本一般包括居民自有住房的维护修理费、物业管理费和固定资产折旧等。这种方法适用于住房租赁市场不大规范的国家。目前，我国采用的是成本法，其中的固定资产折旧是利用住房建造成本与折旧率计算的。该方法是在 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确定的，由于当时住房租赁市场尚不发达，房租代表性不强，且住房市场价值与建造成本之间差距不大，因此，选取了适应当时情况，并且也是 SNA 推荐的一种方法，即成本法计算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城镇住房需求增长较快，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迅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现行的成本法就会低估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因为住房建造成本上涨的幅度远低于房价，从而会低估居民消费支出和房地产业增加值，进而影响到居民消费率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和房价迅速上涨，住房租金也不断上涨。同时，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已经逐步成熟，房租的代表性逐步增强。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核算方法进行改革，引进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市场租金法测算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从而有利于客观地反映居民消费支出和房地产业增加值，进而有利于客观地反映居民消费率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国家统计局已经利用住户调查取得的住房租金、住房面积等数据以及人口统计数据，试算了近年来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经过充分论证之后，新的计算方法和数据结果将被正式采用。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3.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解读中央一号文件》，《农民日报》，2013。
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 年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2013。
5.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World Bank, 2009: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 2008, New York.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智库的历史担当

卢中原

摘 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艰巨的转型期，中国智库要有历史的担当精神。一是应当敢于和善于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和短期变化；二是应当更加注重建设性和包容性；三是要有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志气和能力。

关键词：中国智库 中国经济 历史担当

作者简介：卢中原，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艰巨的转型期，许多领域正在或必将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各种各样的智库也日趋活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并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办好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需要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也需要深入分析中国智库存在的差距、不足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面临这样重大的历史关头，认识和把握一些带有趋势性、规律性的变化特征，对中国智库的定位和历史担当可能就会有些新的视角。中国智库要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或者叫做历史的担当精神。

第一个担当，中国智库应当敢于和善于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和短期变化

从经济上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特点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速度上

的趋势性放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把它叫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这里涉及许多经济理论分析和影响趋势分析。我个人将其概括为，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趋势性放缓”，这个判断不仅仅是最近两年来大家感受到中国经济实际增速的放慢，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决定中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态势的三大供给面因素，即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效率提高所带来的贡献会发生重大变化。要言之，劳动力增长会停止，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进而资本增长放慢，综合要素成本上升挤压利润空间，效率提高又受到技术原因、体制因素和发展阶段制约而成为慢变量，很难迅速而大幅度抵消经济增速放慢的态势。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因为这个变化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许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同时也会呈现出许多新的机遇。这样大的变革是我们许多方面并没有深刻认识到的，而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这个现实。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不仅仅是最近两年短期的经济增长放缓，未来中长期增长速度要逐步地下行，这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我们长期依赖的高投入、高增长带来高效益的增长模式、盈利模式不可持续，各个方面所习惯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依靠手段都要发生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以往的税收来源、效益来源、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等，都要在中长期经济增速放慢的前提下发生变化。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放慢的趋势，以往那种传统的刺激办法还能不能按照想象把经济增速托高，已经很不确定了，甚至是很难奏效了，即使做到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要提前做好应对。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在催生很多新的现象，有些是静悄悄的革命，例如服务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相当活跃，新的地区增长极正在形成等等，应该说是非常深刻而积极的变革。对这些积极变化以及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及时发现，或者缺乏深刻的梳理和挖掘。中国智库在这里要有担当，要敢于把这些积极的东西挖出来，告诉决策层、企业界和社会公众，顺应它的内在变革动力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因势利导。我们的智库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作为。

第二个担当，中国智库应当更加注重建设性和包容性

当今中国，舆论环境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互联网、新媒体、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等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中国传统的社会交往和信息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开放度、参与度、草根性和活跃程度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是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中国历史性变化的重大特征。正是在这种空前开放活跃的舆论环境下，中国社会充满了新的活力，同样它也带来很多新的不稳定，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压力和动力都在增强。我们的政府在行使公权力方面，在制定公共政

策、引导公共舆论、形成凝聚力等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空间和挑战。我们的社会在表达诉求、形成共识、共同参与、改善现状等方面，同样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空间和挑战。

中国处于如此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所产生的新矛盾层出不穷，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点一定会借助日新月异的信息传播条件，不断反映出来，相互碰撞，相互激荡。就像邓小平所讲的，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遇到的问题，会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因而，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应对机制已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智库应当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应当关注和研究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的智库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更加注重建设性，批判性地揭示问题和矛盾，建设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建设性的意见并不都是可操作的政策建议，而更应该是方向性的思路 and 理念，科学地挖掘现象背后的规律，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告诉决策当局现在的变与不变的特征是什么？现象和变化背后的依据是什么？未来的变化有几种可能的前景？如果我们老是追求告诉政府应该具体做什么，要加强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智库可能永远拼不过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智库恰恰要超越“屁股指挥脑袋”的狭隘部门利益、局部观点，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务性忙乱。批判性地揭示矛盾和问题，当然需要勇气和智慧；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思路 and 理念，可能更有利于提高智库的成果质量和影响力。

中国的智库还应当有一种互相包容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智库的种类和数量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领域的蓬勃发展局面，各有优缺点，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形成舆论环境大变革的重要动力源。各类智库彼此竞争同时又包容对方，既有利于发挥术业专攻的长处，也有利于加强多学科交叉的跨界综合优势，从而使建设性的思路、理念和建议具有更丰富的信息量，更明晰的针对性，更大的决策参考价值，也更容易被社会公众所接受。

第三个担当，中国智库要有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志气和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的认知与国内的认知发生了非常大的差距和脱节。这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中国经济份量比以往有所上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出口第一和进口总量第二，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变革进程，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更加活跃。外国政府、智库和国际组织纷纷对中国做出这样那样的评估，我个人感觉有的比较客观，有的不够客观，例如过高估计中国实力等。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和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但是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大国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从人均 GDP 水平和发展极

大不平衡的角度看，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话语权有所上升，但在世界上还比较弱。

中国要加大经济转型力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需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不仅应当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应当作出自己的贡献，起到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应当有效防范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中国的智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根本上依托于中国各方面综合实力的增强，直接地取决于我们各类智库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份量，或者说，取决于“思想产品”对“思想市场”的影响程度。总体上看，我们的智库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仍然是有明显差距的。缩小这方面的差距，一方面需要加强中国智库自身的机构建设、研究队伍培养，进一步完善运作机制等；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开拓国际视野，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更加主动地和世界交流。最近一些年来，中国注意加强思想产品的对外传播交流，一些重大规划和政策出台后，主动到国外进行交流和研讨。比如，2010 年我率领中国共产党友好代表团到欧盟、德国介绍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西方形成互动。中方了解到，欧盟到 2020 年的发展战略提出，实行“智慧型发展，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就业优先战略，绿色、可持续、低碳发展，突出环境约束，注重民生改善，得到对方高度认可，认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是一个“很酷的规划”，团队非常强大，理念非常先进，措施也很得力。这说明中国的很多东西可能缺乏国际交流和沟通，不断加强这些交流研讨，既可扩大中国正面影响，也要求我们的智库提供更多的高质量智力支持。

主动参与全球化，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些国际义务，做出国际承诺，但这是以坚守中国基本国情为底线的。以减少碳排放强度（而不是总量）为例：中国承诺到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要比 2005 年下降 40%—45%，“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即 5 年间单位 GDP 能耗和碳排放分别要下降 16% 和 17%，对于中西部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省份来说，如何实现有利于就业的包容性发展，会遇到新的挑战。我们的智库怎么样向国际说明中国承担了重大的国际义务，同时还要解决自己的生存发展问题，使几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首先解决自己的饭碗，再考虑扩大消费。简单地抨击中国依赖出口是不顾国情，也是于事无补的。中国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状况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着中国不得不稳定和拓展出口，否则无法解决几亿人的就业转型、城镇化和资源富集地区的生存问题。如何立足国情承担国际义务，是一个探索过程。我们的智库要立足于中国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基本国情，敏锐把握全球化和世界发展的趋势，研究中国如何逐步实现对国际的承诺。这也是中国智库的历史责任。

责任编辑：刘英奎

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研判

陈文玲

摘要：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增长速度稍低于上个 10 年，但发展质量将大大提高；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将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全球对外投资的大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甚或完成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等 10 大趋势。

关键词：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战略研究部部长、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从 1978 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向世界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从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尤其重要的是，在建国之后取得经济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了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变革令中国释放了巨大的潜能。过去 35 年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已远远超出世界预期，也超过自己的预期。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正走在实现中国共产党两个 100 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距离实现中国梦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国家，成为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越来越大的国家，成为使自己的人民越来越幸福的国家。那么，未来 10 年的中国将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一、中国将成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将稍低于上个 10 年，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将大大提高，并将拉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周期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传统经济强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从 2000 年占世界总量不足 4% 提高到 2012 年 11% 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确立了“十二五”时期（2011-2015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是，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速度年均增长 7%。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2010 年翻一番，按此目标计算，2010-2020 年年均经济增速为 7.1%，基本与“十二五”规划目标一致。按照 7% 的平均增长速度，届时 GDP 总量将达到 12.5 万亿美元^①。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到 2022 年，中国年均增速达到 7.4%，届时 GDP 总量达到 16 万亿美元^②。世界银行报告^③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 30 年内将逐渐走低，2011-2015 年年均增长速度为 8.6%，2016-2020 年年均增速降至 7.0%，到 2030 年，年均增速将降至 5% 左右。但即使如此，到 2030 年，中国经济总量也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渣打银行 2013 年 11 月研究预测，中国可能到 2022 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与世界一些国家经历过高速发展期后经济增速必然逐步下行一样，中国经济也将从持续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速度，转为中高速发展速度，但仍然是大国和重要经济体中增长速度高的国家。在一个越来越大的经济体量基础上，尽管速度回落，也终将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即使如此，中国人均收入仍将不到美国的 1/3。未来 10 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将更加关注人民生活，将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程度，而不仅仅是规模和速度。GDP 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标。2012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6094 美元，在世界排名为 84 位，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到 2020 年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番，也就是说，到 2020 年，中国人均 GDP 将超过 1 万美元^④，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国家

①按人民币汇率 1: 6.38 计算。

②2011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7.3 万亿美元。

③《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

④2011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5414 美元。

信息中心预测，到 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将达到 11517 美元^①。

二、中国将成为全球市场规模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带动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内消费需求将接过投资和出口的接力棒，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预期国内消费需求仍将加速增长，并接过投资和出口的接力棒，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消费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潜力将得到快速释放，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将位居世界前列。2012 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51.8%，六年来首次超过投资。中国将逐步形成具有持续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根据《2013 年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到 2012 年底，全国有 105 万人是千万富豪，6.45 万人是亿万富豪。世界银行报告^②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经济中投资占 GDP 比例由 2011 年的 42% 降至 38%，消费占 GDP 的比例由 56% 增至 60%。美国摩根士丹利报告^③指出，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将迎来国内消费需求井喷的黄金时期。2020 年中国的消费总量将达到美国的 2/3，占世界消费总量的 12%。中国的新增消费已于 2008 年超过美国，并在 2020 年达到世界新增消费的 20%。预计 2020 年中国新增消费大致为美国新增消费的两倍。

三、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成为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优质要素组合的平台，成为国际资本进入的重要载体，并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的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的 35 年，是中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并渐次融入国际市场的 35 年，也是我们抓住全球化特别是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机遇，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 35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35 年间，中国对外贸易连续登上新台阶：1988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1994 年突破 2000 亿美元，1997 年突破 3000 亿美元，2004 年突破 1 万亿美元，2012 年达到 38668 亿美元。

未来 10 年中国将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70 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在 5 年前，这个数字正是美国具有的贸易优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博鳌论坛上指出，未来 5 年中国进口增加 10 万亿美元。国家信息中心预测，考虑到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变化和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我国出口结构

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未来十年中美经济发展趋势判断与测算》，2012。

②世界银行：《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

③摩根士丹利：《2020 年前的中国经济》，2010。

变化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均升值 2% 左右等因素，2013-2022 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 9.4%，进口年均增长 10.0%；贸易顺差基本维持在 2500 亿美元左右的水平。

中国正在成为对外投资大国，1979-2012 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2761 亿美元，1984-2012 年，中国利用外资以年均 18% 的速度增长。2012 年末，中国海外投资存量达到 5319 亿美元，2013 年中国海外投资量井喷式增长，跃居世界第三大投资国，未来 5 年对外投资将增加 5000 亿美元。据美国亚洲研究中心与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联合发布报告预测，未来 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 1 万 -2 万亿美元^①。

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参加了 100 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 300 多个国际公约。中国也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实践者。迄今已同 163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已经签署和正在谈判的有 18 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 129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 96 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国正在与美国、欧盟进行对外投资协议谈判。未来 10 年，中国将与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建设自由贸易区，与周边国家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双向或多向投资无障碍区。中国重视和积极推动多哈贸易回合谈判，将继续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目前，中国与美国和欧盟启动投资协议谈判，从探索对外资审批采取负面清单管理开始，新一轮更高标准的对外开放又踏上新的征程。

四、中国将成为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储备的国家，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中国已成为具有创新储备能力和逐渐释放创新能力的重要国家。2012 年中国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 3850 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 109 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2012 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年度已超过 52 万件，超过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中国制定了面向 2020 年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科学和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等。按照这些规划，预计到 2020 年，中国人才资源总量将从现在的 1.14 亿人增加到 1.8 亿人，增长 58%；中国国民受教育平均年限将达到 10 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33%，人才贡献率达到 35%。可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优质劳动力，全社会研究开发

^①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敞开美国大门？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罗森和哈曼尼，2011。

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2.5% 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0% 以上。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中国正在努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

创新发展的基础是具有一流人才队伍，培养人才的根本路径是提高教育能力。到 2020，中国毛入学率将达到 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9.5 年提高到 11.2 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 2009 年翻一番。21 世纪是全球科技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走向科技创新强国的关键时期，中国将成为科技实力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国家。

五、中国将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在成为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位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甚或完成工业化进程

经过建国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努力，中国已迈向工业大国，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产业能力，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20.8% 升至 2012 年的 45.3%，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上升到 85%。目前我国已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和 525 个小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2012 年，工业增加值总值达到 23.52 万亿元。在中国 22 类工业制成品中，17 类位于世界第一位，225 种商品制造能力居于世界第一位，2011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比重达到 19.8%，美国下降到 19.4%，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将继续加快，未来 10 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是，提高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水平，提高创造国际知名品牌的能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使中国制造业综合竞争力走在世界前列。2013 年德勤有限公司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评价，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在第一位，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无论 2013 年还是 5 年后，中国仍将稳居全球第一位。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动力汽车等重点领域将有更快的发展。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到 201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 8% 左右。到 2020 年，预计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将达到 17%-18%^①。

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正在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 40 多个国家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占世界 1/7 的人口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好处。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完成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补课”，另一方面需要跨越发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形

^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2020 年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标志及战略研究》。

成崭新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业形态。到 2020 年，在人均 GDP 达到工业化国家要求的基础上，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50%，R&P 比重达到 2.5% 以上，与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实现工业化时的水平基本相当。根据中国《2000-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到 2020 年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全面融合，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显著提高。

六、中国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城市化的同时，大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水平，到 2020 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35 年前中国 8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现在一半以上的人口转移到了城市，中国用 30 多年走完了西方 100 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城镇化道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从 1978 年 1.91 亿的城市人口迅速发展到了 7 亿多人口，5 亿多农村人口陆续进入城市，成为中国迈向国际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人口红利”。2012 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52.57%，提前实现了“十二五”规划预期目标。按照这个速度，到 2022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在 60% 左右，城镇人口约 8.4 亿人；2030 年城市化率达到 68% 左右，城镇人口超过 9.5 亿人；预计到 2030 年，全国将有 3.9 亿农业人口需要市民化，其中存量约 1.9 亿人，增量超过 2 万人。到 2033 年之后，城市化率将超越 70% 的拐点，结束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进入放慢发展的后期阶段^①。世界银行报告^②预计，在未来不到 20 年时间里，中国 2/3 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里面，届时中国城市人口总和将超过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城市人口的总和。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大规模、最宏伟的城市化进程，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增长动力。根据联合国 2012 年 4 月发布的《世界城市化趋势》报告指出，从 2011 年到 2050 年，世界城镇人口将从目前 36.3 亿人增加到 62.5 亿人，城市化率将从 52.08% 提高到 67.13%，其中较发达地区将提高到 82.26%。据此预测，我国到此时将完成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比率将达到 70% 左右。

七、中国将成为金融制度更加市场化、国际化和规制化的重要国家，人民币将逐步成为在国际贸易结算、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储备中的重要国际货币之一

中国外汇储备 2006 年超过日本，已经连续 6 年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从

^①潘家华、魏后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②《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

1978 年的 1.67 亿美元跃升到 2012 年底的 33116 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努力创造必要条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从 2005 年 7 月 21 日开始，中国开始了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到 2013 年 10 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已经超过 40%。人民币已实现了贸易项下自由兑换，43 项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的比重超过了 70%。采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已超过中国贸易总量的 11%。中国已与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实行货币直兑，金额超过 2 万亿美元。香港成为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新加坡成为第二家人民币离岸中心，纽约、东京、法兰克福和中国台湾等地都将陆续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

上海将成为国内继香港之后的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最大的人民币结算中心，在亚洲金融交易中将占据主导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改革作出了部署，人民币在贷款利率放开的基础上，将逐步实现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毫无疑问，未来 10 年，中国将继续加快金融制度改革，使之更加市场化、国际化和规制化。货币互换规模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将首先实现周边化，进而实现国际化；首先成为结算货币，继而成为储备货币，为最终成为国际货币打下坚实基础。除了继续加快现有的金融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还将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建立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中国正在研究建立逆周期动态资本缓冲和预防性拨备制度，加强对流动性、杠杆率的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八、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油气资源“自西向东”的消费重地，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更为紧迫

目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2030 年之前亚太地区将成为第一大能源消费基地。中国 2012 年以前，进口原油的 90.5% 都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中国多年来能源构成的主体是化石能源，未来将逐步增加油气资源、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能源的比重，油气资源进口将在目前占比近 60% 的基础上继续增长。2012 年石油进口 70% 来自大西洋两岸，从全球化向区域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世界油气出口将形成两大中心：“俄罗斯－中亚－中东”和美洲；世界消费将从目前的两大中心转为三大中心：即从美国和欧洲两大中心转向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 年前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地，美国将在 2020 年前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

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石油产量大幅增长，非常规油气大规模开发，美国等国家推进能源独立，技术进步推动全球能源格局发生变化。美国页岩气技术突破及油砂、致密油、重质油等非常规资源的开发，日本大规模海底可燃冰的开发，使世界油气出口重心“自西向东”发展。据国际能源署预测，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2035 年将达到 85%，2020 年原油需求量将达到 6.7 亿吨，天然气 4000 亿立方米，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持续上升到 65% 和 40% 以上。

面对工业污染形势严峻的问题，中国将加大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力度。2012 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2117.6 万吨，其中工业源占近 90%，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2337.8 万吨，其中工业源占 70%，治理工业污染，实现制造业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和绿色发展方式，将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中之重。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将超过 3 万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将达到 6.5%-7.0%；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减少 40%-45%。

九、中国将把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满足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工作重点，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加快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中国年人均 GDP 已达到 6100 美元，2020 年将超过 1 万美元。未来 10 年，人口增长率将呈现下降趋势，到 2020 年人口数量不会超过 14 亿人，其中 15-64 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将出现负增长。有鉴于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将逐步改善这种状况。预计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提高 1 岁，达到 74.5 岁。

进入 21 世纪，中国致力于推动社会保障由城镇向农村、由工薪劳动者向全体社会成员拓展，在公平性、可及性和制度性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2012 年，我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 7.88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 13.4 亿人，同时建立了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未来 10 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政府财力增强，将建立更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的制度性安排，大大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稳定感和幸福感。

提高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是政府重视民生的重要方面。2011-2015 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将提高 13% 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 以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年均增长 10% 以上。到 2020 年，随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化发展，尤其是政府将新建设一大批城镇保障性住房，使此类住房覆盖面达到 20% 以上，将使社会需求结构更加稳定，逐步迈向成熟的

大众消费社会，并使贫富差距不断缩小。世界银行^①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城乡贫富差距将由 2010 年的 3.2 : 1 缩小至 2.4 : 1。

中国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城镇就业人数增加约 1300 万人，考虑到未来 10 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制造业结构不断升级等因素，预计未来 10 年就业弹性将逐步减少。由于中国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将下降，就业压力较小，城镇失业率将基本保持在现有水平。

十、中国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将面临着诸多压力和两难选择，只有走出中国特色的大国 崛起之路，才能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用世界 7.9% 的耕地和 6.5% 的淡水资源养活着世界近 20% 的人口。中国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生态环境的透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整体上较弱，在国际产业体系和贸易分工中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着诸多压力：通胀或通缩压力、资源环境压力、老龄化社会压力、贫困压力、产能过剩压力和经济下行压力等。按照联合国人均日消费水平不足 1 美元的标准，中国还有 1.5 亿贫困人口。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于 1999 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预计 2012 年前后，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②，在未来 10 年内，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重要转折点，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

今后 10 年，国际市场风险对中国经济影响进一步加大。例如铁矿石对国际市场依存度将超过 70%，石油对国际市场依存度将超过 75%，天然气缺口将达到 1500 亿立方米。在较长的时期，国际传统市场需求萎缩，加之发达经济体利用经济结盟，建立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阻滞中国出口市场拓展，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产能过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贸易价格等“传统比较优势丢失”开始显现。在外需萎缩的冲击下，可能将出现大量外需性产能过剩行业。外需型产能过剩行业既包括纺织、鞋帽、箱包等传统行业，也包括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中国还面临形成新“比较优势”的

^①《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

^②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网。

真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人口红利”递减，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尚未建立。

资源环境的挑战更为严峻，2/3 的城市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几乎 1/4 之一的地表水受到污染，3 亿多农村人口还不能喝到安全的水。特别严重的是空气污染，雾霾 PM2.5 成为影响大半个中国人生存、生命质量的心头之患。摩根斯坦利报告^①预计，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解决自身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高通胀率。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十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只有 6.5%。卡耐基基金会^②也指出，在悲观的情景下，中国在未来五年年均经济增速为 7.1%，后五年仅有 5.8%。

总体而言，导致中国未来经济减速的风险既来自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房地产市场的不振和投资能力萎缩、全球经济减速造成的出口下降等因素，也来自于中国经济内部结构问题和发展方式粗放带来的时滞效应。前者可以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解决，后者情况更为严峻和棘手，需要继续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升级，通过制度创新和变革，寻找或创造“新改革开放红利”、“新人口红利”和“新制度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否则，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③。

综上，中国未来 10 年既存在巨大机遇和有利条件，也面临巨大挑战和风险，但总的看，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几亿人进入城市将释放出巨大消费需求，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以比任何时候更加自信地迈向未来 10 年，也以比任何时候更加清醒地面对自身存在的种种挑战和问题。我们正行走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进一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更大范围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主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接受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机遇的考验，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抱负和胸怀。

责任编辑：刘英奎

①卡耐基和平基金会：《中国档案：2020 年前的中国经济》。

②卡耐基和平基金会：《中国经济前景 2006-2020》，2007。

③《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

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 特征及评价指标初探

宋 群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共同富裕的思想从毛泽东提出，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等几任领导人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并经过 60 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实践，已逐步成为新时期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与期盼。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及复杂性都很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需要多方面长期不断地深入研究，而目前我国的研究大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成熟实践经验。本文重点界定了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分析了共同富裕的特征，并对其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关键词：共同富裕 内涵 特征 指标体系

作者简介：宋 群，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际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

一、我国共同富裕的主要内涵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共同富裕论述之后，理论界对共同富裕内涵做了大量讨论研究，形成了社会现象说、集中体现说、协调发展说、道德原则说、价值取向说、多层含义说、四新认识说、系统目标说、本质要求说等众多观点。但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涵义、特征、理论体系和实现方式上，对共同富裕概念和内涵的理解，缺乏

系统性和整体性。纵观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首先提出共同富裕概念到目前的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丰富与升华共同富裕内涵，包括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共同富裕内涵以来的 30 多年，共同富裕的内涵已经演变成一个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或者说是“中国梦”。因此，应该从社会整体实践出发，从历史发展的轨迹出发，全面、系统地分析共同富裕的内涵，比较科学地揭示其内涵的主要定义。

共同富裕概念，一般来讲，“富裕”通常是反映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因此，共同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质。由此，共同富裕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占有的方式与程度水平的尺度。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社会财富要丰富得多，但在社会成员占有社会财富的方式上，绝对不会是“共同”，因而，共同富裕绝对不会成为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一种目标。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从各代领导人提出共同富裕的那一时刻起，此概念就包涵着我国特有的内容，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共同富裕是我国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的目标追求

纵观我国近代百年历史与现代六十多年的发展史，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在新形势下不断探索适应自身特点的快速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而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的核心就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而决定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是我国社会两个最本质的要求：

一是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国情决定必须加快实现由“穷国”向“富国”的转变。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近 100 多年里，我国一直处于贫穷落后、受外强欺凌、压迫与处处挨打的境地。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探索有效发展之路，曾涌现了以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理念与无数志士仁人，为实现中华民族“富国强民”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与牺牲，但都没有取得最终成功。而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二十八的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重要主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国际发展的新格局与新形势以及带来的压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我国的头等大事更加受到重视。几代领导人都致力于发展中国，强大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后，更是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将发展作为硬道理，后又升华为科学发展。十八大以来，更是提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由此可见，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社会财富积累的发展，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对处于落后但又需要快步迎头赶上的中国是多么重要。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加快经济发展，做大“蛋糕”也正体现了共同富裕概念中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富裕”的一面。

二是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决定必须要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我国共同富裕的提出一开始，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并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紧密相联的。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其本质要求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差别，消除贫困，主张公平与效率。不管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是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就必然决定财富的占有方式与分配方式是人民群众“共同”的，广大人民群众要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他们富起来。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就是率领全国人民，由温饱到小康社会，再到中等发达国家，最后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富裕的共同性，也正好体现了代表生产关系的“共同”的一面。

综上所述，共同富裕充分体现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与建设生产关系，并使两者有机统一的内涵。同时，社会主义本质又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与奋斗的目标。

（二）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高度综合协调的发展状态，其中社会经济物质、社会精神与文化为核心基础前提，民主政治与生态环境为必要保障

共同富裕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发展的一种高水平，体现着社会全面综合发展的一种高级状态。因此，共同富裕不是局限于社会某个方面的高度发展，而是代表社会全面高度发展水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五位一体高度综合协调的状态。其中，经济、社会与文化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基础前提，政治与生态建设是共同富裕的必要保障。也就是说，共同富裕体现了一是高度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发展积累。即经济、物质方面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二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高度成熟。即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三是社会文化的高度多样性和丰富性。即科技文化方面的高度发展。这三者构成了共同富裕的核心基础前提，并体现着三者发展水平的高度一致性。同时，政治与生态环境则是物质、精神与文化良好发展的必要保障。政治为社会物质、精神与文化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失去这种保障，上述三者的公平性及同步性将受到损害；生态环境则为物质、精神和文化提供生存环境与条件的保障，失去这种保障，上述三者的幸福感将大大降低。因而，共同富裕又体现着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随着社会的

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对美好物质生活向往的同时，人们对生活得有价值、有尊严、不断满足多方面需求和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的幸福指数中不仅包含有物质变量、精神变量、社会环境变量，还包括公正的社会制度、合理的价值体系等诸多制度机制变量。从某种程度上说，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构成了我国共同富裕的根本内涵。

党的十八大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已提出了基本要求：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三是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四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五是资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既是标志，也构成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基础状况和水平。

（三）共同富裕以“以人为本”为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以消除不合理差距为主要内容

与目前发达国家的以“中产阶级”占社会主体的共同富裕不同，我国共同富裕的“以人为本”最终要落实到 90% 以上的绝大多数人身上，这个面比发达国家要宽泛得多。同时，我国共同富裕的“以人为本”，不仅是从收入面来看的，而是从根本上消灭造成人与人除生理差别以外的生存条件与环境等带来的不平等差别。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是消灭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消灭由于外在环境条件带来的人生存条件与环境的差别，这些差别最主要的就是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人与人的差别（包括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以及由这些生存环境条件差别带来的人们在享受公共服务、受教育程度、就业与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不合理两级分化。我国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就是逐步通过发展，消除这些差别与防止两级分化，为社会的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公平合理的生存环境和条件。

目前，我国正处于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此阶段消除不合理差别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整社会收入分配关系。这主要反映社会财富占有与分配方式的公平性。要通过逐步建立合理的、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与机制，消除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政府、企业、个人间存在的社会财富占有与分配上的不合理及由此产生的不合理差别，为每个公民提供合理的占有社会财富的制度保障。二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协调化发展。这主要反映社会提供的总的基础发展能力与水平的公平性。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气及通讯等方面能力与服务水平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与水平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社会提供的各种扶贫帮困的能力与水平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要逐步增强社会总的综合实力，消除各地区间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及扶贫帮困能力与水平的差异，实现均等化协

调化发展，为每个公民提供更加良好统一高水平的社会服务环境。三是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就业、养老等机会。这主要反映社会满足个人发展需求及生存条件的能力与服务水平的公平性。要逐步提高全社会教育、提供就业及保障养老的能力与水平，消除公民在教育、就业及养老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待遇，实现机会均等。为每个公民提供合理公平的发展机会。

综上所述，从根本来看，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由目标层、保障层与核心层三个层次构成：目标层体现的是我国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的总体目标追求；保障层体现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高度协调发展；核心层体现着最本质的内容是消除城乡、地区及人与人的三大差别。这三个层次构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充分体现着我国共同富裕内涵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完整性。

二、我国共同富裕的主要特征

从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出发，共同富裕具有制度性、相对性、阶段性和发展性特征。而制度性决定了相对性、阶段性和发展性的具体内容的性质。

（一）制度性

共同富裕具有制度性。这种制度性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制度性意味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尽管当代有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也有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实现某种公平所做的努力，但由于其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同，其社会目标的“共同”总是受到制度的局限，其富裕的程度也是有限的。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也意味着共同富裕追求的不是单一的物质财富的极大发展，而且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全面综合发展。综合全面发展，已不仅仅是追求人们物质财富的增长，还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多方面需求的不断满足和全面提升。因此，共同富裕的制度性体现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质量和效益并举的发展，体现着从根本上消除不合理的差距，防止两级分化，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二是制度性也意味着我国的共同富裕也需要综合的健全制度保障，是在社会全面法治化的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制度与法律规则是实现公民合法权益、收入公平、行为言论自由的保障，以此消除腐败、“寻租”及各种违法等不良社会现象。

（二）相对性

共同富裕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包涵着两方面：一是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而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

这种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这是与平均主义相区别的，共同富裕是相对富裕；二是共同富裕不意味着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同等绝对富裕，而是要在遵守社会各项法律制度，并提供自身劳动基础上的相对富裕。共同富裕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之上的普遍富裕，但不是全体社会成员在财富占有上的绝对平均。由于社会成员因其素质的不同、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在财富占有的多寡上也必然不一样。只有承认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性、相对性，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才能为高层次的富裕提供示范。

（三）阶段性

共同富裕具有阶段性。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时期，需要有步骤地、分阶段地逐步加以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阶段性与社会发展的程度与水平相关，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渐进性。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文化、社会基础的阶段，是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生动地描绘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富裕过程，这是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进军图和宣言书。随着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到来，共同富裕将会在新的基础上逐步由低层次富裕向高层次富裕迈进。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步是要缓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二步是要缩小三大差距；第三步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由此，我国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到 2020 年。是由实现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成的。这主要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的阶段；第二阶段，2020-2030 年。是我国从小康社会向富裕水平过渡，并建立共同富裕基本框架的阶段。也就是说，到 2030 年，我国将基本初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三个阶段，2030-2050 年。将是我国全面进入共同富裕社会的阶段，并完成第二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与任务，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 2050 年^①，我国农业比重只有 2%-3%，工业比重下降到 20% 以下，服务业比重接近 80%，城市人口比重达 78% 以上，可再生能源比重超过 55%，煤炭消费比例降低到 25%-30%，全部清洁利用率很高，森林覆盖率达 26%，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届时，基尼系数在 0.2-0.3 左右，恩格尔系数 30% 以下，城乡居民收入比接近 1:1，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低于 30%；基本社会保险全覆盖。由此，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及衡量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将进一步趋同，

^①见胡鞍钢等：《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载于《农场经济管理》2012 年 3-4 期的观点。本文以此作为我国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描述。

我国将进入全面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

（四）发展性

共同富裕具有发展性。这种发展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纵向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积累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从贫穷到富裕再到高层次富裕的过程富裕。二是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横断面看，是部分局部富裕到整体全局的逐步富裕过程。这个过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帮助和带动更多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富裕起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由此，我们就没有理由把共同富裕看作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模式，没有理由在实现特定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后就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共同富裕蕴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人类追求富裕生活的无止境过程。在初步实现共同富裕后，可以说我们总是处在共同富裕社会中，又总是处在非共同富裕社会中。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就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揭示共同富裕所蕴含的新内容，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新富裕。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非同时富裕的发展过程，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的动态过程，共同富裕的动态发展性，也是由人类追求富裕生活的无止境性决定的。

三、我国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探索

目前，国内研究界已有一些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①，也有一些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的研究^②，但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对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本报告力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提出对我国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设置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1. 指导思想。以我国共同富裕的思想与内涵为指导，设计比较全面评价我国共同富裕实现程度与水平的指标体系，以更好地评价我国共同富裕的进展程度，并为有针对性地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依据。

2. 主要原则。设计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指标的全面性与综合性。由于共同富裕不是一个方面，而是社会综合发展的一种目标状态，因此，评价指标的设计也应是全面和综合的，不仅涉及到反映经济与社会

^①如国家统计局的对小康社会的评价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评价指标。

^②见国家发改委社会所的《基本服务均等化标准与阶段性目标》的研究。

方面的代表性指标，而且要涉及到反映文化、制度与生态环境方面的代表指标，要综合反映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程度。

二是指标的针对性。共同富裕的核心是消除不合理的各种差距，因此，与其他指标体系不同的是，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要着重反映影响我国共同富裕实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差距及这些差距不断消除的程度与水平。

三是可操作性。指标的设计要建立在可以获取的基础上，同时也要考虑借鉴其他相关联的评价指标，使指标体系简明易懂，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四是可比性。目前，我国社会的开放度已很高，因而共同富裕的进程与实现也是处于整体世界环境之中，一定程度上说，共同富裕不是处于封闭状态，而且要在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相比较中来体现的。因而，指标要有一定的可比性。

（二）指标体系

根据指导思想与原则，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基础指标，也就是反映我国发展总体水平的指标；二是核心指标，也就是反映差距存在与消除的指标；三是辅助指标，也就是反映与国际水平比较的指标。共由 23 个指标组成（见表 1）。

1. 基础指标：主要反映我国发展总体水平。基础指标主要由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制度等五个方面的 15 个指标组成。

（1）经济发展指标（4 个）。

——人均 GDP：是全国 GDP 总和与人口之比，主要通过收入反映国家总体发展水平。2012 年，我国人均 GDP 已达 6100 美元。2020 年将达到 1 万美元，到 2030 年将达到 4 万美元。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主要反映国家科技投入能力与水平，从而反映国家科技实力。2012 年，这一比重为 1.97%，2020 年将达到 2.5%，2030 年将达到 5%。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比重越高表明现代化程度越高。2012 年这一比重为 44.6%，到 2020 年将超过 50%，2030 年将超过 60%。

——城镇人口比重：反映城市化率水平。2012 年我国城市化率 52.6%，2020 年将达到 60%，2030 年将突破 70%。

（2）社会发展指标（5 个）。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居民总体收入水平。2010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046 元（2000 年不变价），2020 年将达到 15000 元，2030 年将突破 2 万元。

——平均受教育年限：国民总体平均受教育水平。2010 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 8.64 年，2020 年将达到 10.5 年，2030 年将达到 11 年。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反映居民总体的居住水平。2010 年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达到 27 平方米，2020 年将达到 40 平方米，2030 年将超过 50 平方米。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反映社会对儿童的保障程度。2010 年我国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16.4%，2020 年下降到 15%，2030 年这一比率将继续降低为 10%。

——平均预期寿命：反映社会成员总体生活水平。2010 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3.5 岁，2020 年将大于 75 岁，2030 年将大于 79 岁。

（3）文化发展指标（2 个）。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反映文化发展程度。2010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 2.75%，2020 年将达到 5%，2030 年将超过 10%。

——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反映居民的文化娱乐程度。2010 年我国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为 10.22%，2020 年这一比重将达到 16%，2030 年将提高到 30%。

（4）生态环境指标（2 个）。

——单位 GDP 能耗：反映总体能源消费水平。2010 年单位 GDP 能耗已下降至 1.21 吨标准煤 / 万元（2000 年不变价），2020 年将低于 0.84 吨标准煤 / 万元，2030 年将低于 0.6 吨标准煤 / 万元。

——环境质量指数：综合反映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境、地质环境、噪声等环境要素优劣的水平。2010 年从空气、水、绿化等方面综合计算的环境质量指数达到 76.7%，2020 年将达到 80% 以上，2030 年将达到 90%。

（5）人民民主指标（2 个）。

——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综合反映公民对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满意程度。2010 年我国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达到 82%，2020 年将达到 90%，2030 年将达到 95%。

——社会安全指数：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安全的几个主要方面（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生产安全等）的总体变化情况。2010 年我国社会安全指数实现程度达 95.6%，2020-2030 年这一指数将达到 100。

2. 核心指标：反映差距存在与消除程度水平。核心指标主要由反映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与社会保障等三方面 6 个指标组成。

（1）收入消费指标（3 个）。

——基尼系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因此，其最大为

“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 100% 的收入被一个人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每个人的收入完全相同。一般情况下，基尼系数处于 0-1 之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比较平均；0.3-0.4 表示相对合理；0.4-0.5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2012 年我国基尼系数 0.474，2020 年将下降至 0.3-0.4 之间，2030 年将在 0.3 左右。

——恩格尔系数：指居民的消费支出之中，食品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它所代表的含义，一般是用来反映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恩格尔系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会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 60% 以上为贫困，50%-59% 为温饱，40%-49% 为小康，30%-39% 为富裕，30% 以下为最富裕。从国外来看，美国自 1980 年以来，恩格尔系数平均为 16.45%，日本 1990 年以来平均为 24.12%。2012 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36.2% 和 39.3%，2020 年这一系数将小于 40%，2030 年将下降到 30% 左右。

——城乡居民收入比：反映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程度。2012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3.1:1，2020 年这一比率将下降到 2.8:1，到 2030 年将继续下降到 1.8:1。

（2）区域差异指标（2 个）。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反映的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情况，其值越大，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程度越大，反之亦然。2010 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为 50.95%，由于这几年地区发展差异有所拉大，2020 年将继续保持低于 60% 的水平，到 2030 年地区经济差异系数将下降到 50% 以下。

——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①差异系数：设定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平均水平为均等化标准，从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计算各地区的基本服务均等化差异系数，以此来衡量各地区与国家水平的差异程度，从而衡量地区公共服务差距消除程度。据测算，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最高的与最低的地区相差 2.68 倍^②，到 2020 年应缩小这种差距到 2 倍以下，到 2030 年应进一步缩小到 1 倍以下。

①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包括：一是通过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二是通过提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人的基本健康权；三是通过提供公共教育、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促进人的自我发展权。见国家发改委社会所《基本服务均等化标准与阶段性目标》的研究。

②见国家发改委社会所《基本服务均等化标准与阶段性目标》的研究。

（3）社会保障指标（1个）。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反映社会基本保障的程度与水平。是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人口占政策规定应参加人口的比重。基本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五项。2010年我国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达到65.6%，2020年将不低于90%，2030年将不低于95%。

3. 辅助指标：反映与国际水平的比较。辅助指标主要由可用于目前与世界上通行的发展水平与人感受，由2个指标组成。

——人类发展指数：又称为人文发展指数（HDI），由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赫布卜·乌·哈格（Mahbub ul Haq）和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Sen）于1990年创造。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值是“预期寿命”、“教育年限”和“生活水平”三个分指标的几何平均数。1990年5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首次公布了人文发展指数（HDI），将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相结合，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之后每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会在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各个国家人类发展水平。2001年世界人文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挪威，其人文发展指数为0.939。2001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为0.718，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居中等人文发展水平，排名第101位。

——幸福指数：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2012年，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其它北欧国家亦高踞前列位置。美国排在第11名，台湾地区排名第46位，在亚洲地区居第3，仅次于新加坡（33）和日本（44），韩国排名第56，中国香港第67，中国内地则排名第112。

表 1 我国共同富裕评价指标数据预计

序列	指标名称	2010 年	2012 年	2020 年	2030 年
一	基础指标				
(一)	经济发展				
1.	人均 GDP(美元)		6100	10000	40000
2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1.97	2.5	5
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44.6	50	60
4	城镇人口比重(%)		52.6	60	70
(二)	社会发展				
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0046(2000 年不变价)		15000 (同前)	20000 (同前)
6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8.64		10.5	11
7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平方米)	27		40	50
8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16.4		15	10
9	平均预期寿命(岁)	73.5		大于 75	大于 79
(三)	文化发展				
10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2.75		5	10
11	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10.22		16	30
(四)	生态环境				
12	单位 GDP 能耗(吨标准煤 / 万元)	1.21(2000 年不变价)		低于 0.84	低于 0.6
13	环境质量指数(%)	76.7		80 以上	90
(五)	人民民主				
14	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	82		90	95
15	社会安全指数(%)	95.6		100	100
二	核心指标				
(一)	收入消费				
1	基尼系数		0.474	0.3-0.4	0.3
2	恩格尔系数(%)		36-39	小于 40	30
3	城乡居民收入比		3.1:1	2.8:1	1.8:1

序列	指标名称	2010 年	2012 年	2020 年	2030 年
(二)	区域差异				
4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	50.9		60 以下	50 以下
5	地区基本服务均等化差异系数(倍)	2.68		2 以下	1 以下
(三)	社会保障				
6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65.6		90	95
三	辅助指标				
1	人类发展指数		2011 年排名第 101 位	排名提前	排名提前
2	幸福指数		中国内地排名第 112	排名提前	排名提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8 年 6 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2012 年统计公报。胡鞍钢等《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载于《农场经济管理》2012 年 3-4 期。黑体数字是作者预估的。

在设置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做出合理的评价。这需要建立模型而且是个比较复杂的课题。本课题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还需设立专项课题进行研究。但这里可提出思路。就是建立中国的共同富裕指数。一方面对中国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状况与程度进行总体评价；另一方面也可逐步作的一种国际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横向比较。

参考文献：

1. 党的十八大报告。
2. 国家统计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2012 年统计公报》，2008 年 6 月。
3. 胡鞍钢等：《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农场经济管理》2012 年第 3-4 期。
4. 国家发改委社会所：《基本服务均等化标准与阶段性目标》。
5. 网上对于共同富裕的论述。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

罗伯特·普森

摘要：本文讨论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管理分散、缺少前期投入和投资收益率低等问题与挑战，分析了造成这些挑战的原因，重点关注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下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养老保险体系 人口结构 挑战

作者简介：罗伯特·普森，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金融报告顾问委员会主席。

一、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的挑战

过去 15 年，中国在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1997 年以前，国企为职工提供的是所谓的历史遗留养老保险，并不需要定期缴费。1997 年后，中国建立了养老保险缴费体系，2011 年覆盖了超过 2.8 亿城镇居民^①。近年来，中国为农村人口建立了养老保险体系。截至 2012 年底，农村养老保险体系覆盖的人口达到近 4.6 亿人^②。按照目前的设置，“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实际上由四个主要子系统组成：城镇企业职工基

①《2012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3 年 5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http://www.gov.cn/gzdt/2013-05/28/content_2412954.htm。

②2013 年全国人大吴邦国讲话，<http://news.hexun.com/2013-03-08/151876321.html>。

本养老保险体系（UEPS），覆盖的是城镇职工，主要是大型民企和国企职工；近年来建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允许农民自愿向个人账户缴费，并由地方和中央政府给予补贴；新建立且规模较小的城镇非就业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结构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结构相似，这个系统有时被看作是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组成部分；公务员养老保险体系，覆盖了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大部分职工，他们不需要缴费。

但是，这些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着艰巨和紧迫的挑战。有些挑战是中国深层次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造成的结果；另一些挑战来自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设计，尤其是管理分散的问题。从长期来看，目前的安排是不可持续的。

（一）人口结构的不利因素

中国过去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即就业人口庞大，退休人员相对较少。人口红利使中国可以用目前的养老保险缴费来支持养老保险支出，但这一有利条件很快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逆转。

截止 2013 年，中国 13.9 亿人口中有 68.1% 属于劳动年龄人口（定义是 15-59 岁）^①。相比之下，德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 59.8%，美国占 60.7%，日本占 54.6%。2013 年，中国 60 岁以上（含 60 岁）的人口仅占 13.9%。相比之下，美国 60 岁以上（含 60 岁）的人口占 19.7%，德国占 27.1%，日本占 32.3%。2013 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 1:4.9，这个比例很容易用目前的养老保险缴费来支撑养老保险支出。

但很遗憾，这一有利的人口结构因素将快速恶化。根据中国 2010 年最新人口普查结果，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正在加快。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 2010 年达到峰值，2012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值减少了 345 万。根据目前预测，中国 65 岁以上（含 65 岁）的人口在 21 世纪 30 年代初将翻一番^②。到 2050 年，如果政策没有大的调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低于 1.6:1。

人口结构压力对政府管理的养老保险体系以及对退休人员的家庭养老支持会带来巨大负担，即子女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也就是 4-2-1 问题：即一个孩子必须照顾两位父母和四位祖父母。随着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持续改善，中国人将更加长寿，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

①“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s,” 201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 Section, accessed at http://esa.un.org/unpd/wpp/Documentation/pdf/WPP2012_%20KEY%20FINDINGS.pdf.

②“Peak Toil,” The Economist, January 26, 2013, accessed a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70750-first-two-articles-about-impact-chinas-one-child-policy-we-look-shrinking>.

人口结构的变化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事实上，与中国相比，2050 年欧盟、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劳动年龄人口与退休人口的预测比例更低。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发生得太快，远远快于其它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人均收入远低于其它发达国家的时候，就必须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将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人口结构压力对政府管理的养老保险体系和对退休人员的家庭养老支持带来巨大负担。因此，中国必须尽快应对养老保险体系的挑战，原因是这些挑战将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并拖累经济增长。

（二）管理过于分散

按非公务员职工的养老保险支出计算，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最大的是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主要覆盖大企业的城镇职工，包括外企、民企和国企。近年来，中央政府又建立了两个自愿缴费的养老保险体系，一个针对农民，另一个针对城镇非就业居民。即便是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管理也非常分散。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由省、市政府出资和管理，基本规定常常大相径庭。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管理分散和缴费期长（至少缴费 15 年）的问题是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根据中央政府最新的指导意见，当个人从一个城市移居到另一个城市，在理论上可以获得其个人累积的养老保险福利。但现实情况是，将累积的养老保险福利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有很多行政上的障碍。例如，没有一个集中的记录保管系统，而且每个地区对于是否符合条件都有自己的规定。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个人移居新城市后其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将很有可能面临极大障碍。首先，个人通常必须被迫放弃一部分累积的养老保险福利。其次，新城市可能有不同的规定或对同一规定有不同的解释。最后，移居可能会重新设置领取养老保险的时间，也就是说个人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才可以领取承诺的养老金。所有这些后果都可能让个人放弃到另一个城市寻找更好就业的机会。

养老保险体系和户口制度的相互作用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任何中国人要在一个地区永久居住并获得领取社会福利的权利，都必须有当地户口。因此，拥有农村户口的人没有权利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领取社会福利，包括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给予的福利。由于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当地城市户口的人就很难永久地移居到可以提供更好工作机会的城市。

此外，目前分散的系统是不公平的。在城镇居民中，中央政府或政府部门的职工可以享受公务员养老保险体系所提供的丰厚的养老金，而且还不需要缴费。甚至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下，较富裕城市的居民每月也比其它地区的居民享受更高的养

老金，原因是各地的平均生活成本不同。

总体而言，公务员养老保险或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覆盖了中国成年人中不到一半的人口。其他人要么没有养老保险，要么只有近年来建立的自愿缴费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或城镇非就业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009 年末推出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增长迅速，但城镇非就业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面要窄得多。尽管如此，由于参加这些自愿体系的人缴费金额很少，即使加上政府的补贴，养老金也很低。

（三）资金不足

在大多数城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来自单位缴费（称为“社会统筹”缴费）和职工缴费。单位的缴费比例是职工工资的 20%，个人缴费的比例是工资的 8%。单位缴纳的部分被地方政府纳入统筹资金，用以支付目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换句话说，单位缴纳的部分被明确用于现收现付的固定收益计划。相反，职工缴纳的部分被存入个人账户。退休后，职工每月有权利领取该账户中一定的比例，基于 139 个月的年金系数。

但是，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发现社会统筹的缴费不足以支付目前的养老金，包括 1997 年引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以前的历史遗留养老保险。这些地方政府的应对方法是从个人账户“借款”，以支付承诺给目前退休人员提供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大部分缴费实际上都被挪做他用。预测表明，个人账户的资金缺口高达 90%。这就是普遍的“空账户”问题。

因此，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目前主要是现收现付的模式。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中国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将倒逼政府注资并投资养老保险资金，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挑战。更严重的是，“空账户”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损害了中国职工对养老保险体系的信任。虽然地方政府会对这些个人账户付予利息，但许多职工怀疑最终能否领取个人账户里的本金，更不用说政府承诺的本金加利息。

（四）投资选择有限

即使个人账户的资金实际上被用于投资，而不是被用来支付目前的养老金，这些资金也只能购买中国国债或存入银行，而且两者的利率都很低。回报很低是因为这些“安全”投资的利率在过去 10 年由于各种政策原因被政府压得很低。由于投资回报低和中国工资快速上涨的问题，预计养老金替代率相对较低。也就是说，退休后养老金与工作期间平均收入之比相对较低。例如，个人账户每年的利率大多是 2%，但银行存款目前的利率是每年 3% 左右。因此，个人账户每年 4% 的回报可以使目前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收入几乎

翻一倍，但这些回报仍然赶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为了补充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支付给职工的养老金收入，中国政府又引进了另一个储蓄工具“企业年金”。这是一个有全额资金保障的职工福利个人账户，相当于美国的 401（K）账户。支持企业年金的单位必须向这些个人账户缴费，职工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缴费。退休以后，职工可以从账户中提取这些资金，可以一次性提取，也可以一年提取一次。

不幸的是，企业年金在中国并不流行。2012 年共有 1847 万个账户，仅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人数的 6%。参与比例低可能是由于单位和职工向企业年金缴费的税收激励不足造成的。例如，虽然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免税，但许多类型的投资收益在基础所得税体系下已经免税，包括中国证券交易所转让上市股票的资本利得和国债利息。因此，企业年金的额外税收补贴，即投资收益免税，对大多数人来说吸引力相对较小。

此外，企业年金的投资选择受到严格监管：建立企业年金的单位不能将资产的 30% 以上用于投资股票，这一规定直到近期才有所松动；另外，至少要将资产的 20% 用于投资货币市场工具。这些限制降低了投资的潜在收益和职工潜在的养老金收入。

二、导致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陷入困境的因素

包括人口结构在内的多个因素造成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目前的困境。

（一）人口结构因素

中国预期的人口结构挑战是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 70 年代政府推行的政策所导致的。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由于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 45 岁提高到 60 岁，其结果是中国人口的大幅上升。之后，中国的生育率从 60 年代末的 6 胎下降到 70 年代中期的 4 胎。此后，生育率逐渐下降至 2013 年的 1.6 胎，远低于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认为种群更替所需的 2.1 胎^①。

上世纪 70 年代初，中央政府开始推行“晚、息、少”政策。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和宣传项目，政府鼓励人们晚婚晚育、间隔生育和少生育。现在看来，“晚、息、少”政策在缩减家庭规模方面比较成功。

1979 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制定了广为人知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政策下，部分居民（主要是城镇居民）被正式限制只能生育一胎。这一政策也有例外，尤其是许多农村家庭可以生育二胎；即使是在城市，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也可以生育二胎。与其它因素相比，计划生育政策的准确效果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根据某些估算，这一政策导致少生了 4 亿人，而另一些估算则认为，这一政策仅导致少

^①与斯图亚特·莱基的访谈，2013 年 7 月。

生了 1 亿人。

（二）管理因素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分散既是政策有意选择的结果，也具有历史偶然性。养老保险体系分为几个子系统（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和城镇非就业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是合理的政策选择造成的。在上世纪 90 年代，无论是从经济还是行政的角度，要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农村是非常困难的。例如，28%的强制缴费对农民来说是完全无法承担的。

相反，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分散管理，即各省市自己管理养老保险，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在 1997 年改革以前，大多数养老保险是国企在地方管理的。在很大程度上，1997 年底的养老保险改革旨在覆盖这些国企职工，包括下岗职工和在被民营化企业工作的职工。因此，把养老保险统筹放在地方，对中央政府来说，是影响和负担最小的决定。

但是，当上世纪 90 年代初建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时候，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趋势才刚刚开始加速。因此，当时对省际和省内人口流动的影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如何，中央政府已经决定加快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但由于没有决定进行户籍改革，这加剧了分散的养老保险体系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

（三）资金因素

根据 1997 年以前的养老保险体系，国企职工不用缴纳任何费用就可以领取养老金。这种养老保险是所谓“铁饭碗”的组成部分，在这一体制下，国企职工可以享受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福利。1997 年的改革进行了新老划断，当时已经退休的人员可以按原计划领取养老金；1997 年以后退休的人员可获得一部分原来的养老金，但其余的部分要按新计划领取。

1997 年的改革把这些“历史遗留的养老保险”纳入了新建立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管理养老保险的地方政府必须用目前单位缴纳的费用（社会统筹缴费）来支付历史遗留的养老金（以及任何其它的应付养老金）。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职工太少，单位的缴费无法完全覆盖现有的历史遗留养老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面临各个方面的财政压力。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决定将个人账户里的职工缴费用来支付目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虽然这在政治上是个权宜之计，但地方政府的这一决策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对许多单位和职工失去了吸引力。单位和职工要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缴纳工资的 28%，而这些缴费的大部分都被用于支付历史遗留的养老金。作为交换条件，地方政府未来承诺的养老金数额相

对较低，而这根本没有资金保障。实际上，目前的单位和职工要为两个养老保险缴费：他们自己的养老保险和历史遗留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

因此，许多职工和单位都试图通过低报工资等方式来逃避或减少参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这一行为在小企业或个体户中尤为明显，原因是它们的收入有限。但是，这一行为会造成恶性循环：参与率低会让支付目前的养老金更加困难，从而需要更多地从个人账户中挪用资金，而这会进一步降低目前职工对养老保险体系的信任，导致更多的人不愿参与。

（四）投资因素

虽然中国经历了增长奇迹和现代化，但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属于欠发达状态。因此，中国老百姓的投资选择非常有限，尤其是考虑到对养老保险资金投资海外的限制。银行存款的利率很低，而且通常赶不上通胀的速度，导致实际回报率为负，这也造成中国国债的低利率。中国的股市波动性太大，让很多中国养老保险计划的参与者望而却步，而中国的养老保险计划又不能投资国际股市。造成中国股市剧烈波动的部分原因是大多数中国投资者的短线交易心态，以及他们对中国股市更多是靠政策传闻而不是经济基本面推动的观点。大多数中国股市的投资者都比较短视：他们希望通过快速交易股票来赚快钱，这会破坏股价和公司深层价值的联系，使市场难以有效分配资金。总之，2007 年至 2009 年期间，股市的大幅波动和随后的大幅下跌，使得长期为养老而进行储蓄的老百姓对中国股市退避三舍。

由于股市波动性大，银行存款利率低，中国为养老而储蓄的老百姓缺乏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选择。有些手头有大量闲钱的人决定通过购买城市住宅来获取更高的回报，而近年来这一有形资产看起来也确实在升值。但中国一般不允许将房产作为养老保险投资的资产类别。其他的富裕阶层则转向银行和“影子”借贷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是流动性相对较好的短期工具，利率相对较高，但抵押的多半是流动性较差的长期资产，例如房地产或商业贷款。由于期限的错配，这类产品风险很大，而且通常不允许养老保险资金投资。

三、改进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议

改进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需要多项改革齐头并进。

政策组合一：增加中国的劳动人口

首先，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中国需要采取前瞻性改革，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人口。

1. 修改计划生育政策。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晚、息、少”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官员对人口爆炸灾难的担忧是合理的，原因是 1980 年中国的人口已经接近 10 亿。当时的某些研究显示，中国的资源只能支持 7 亿人，因此控制人口显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但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在推动政策的层面，这些担忧已经明显过时了：中国完全有财力支持现有的人口。此外，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加剧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养老保险也不足以提供给大多数中国老百姓。

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可能会重新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机构，最近已被并入卫生部。2012 年 11 月离任的胡锦涛主席在向中国共产党第 18 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删除了“保持低生育率”的文字。然而，即使中央政府不愿意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至少应该考虑采取改革，扩大政策例外的情况。例如，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他们通常可以生二胎。这一实际的例外可以扩展为只要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更加激进的做法是让所有中国家庭都可以生二胎。

尽管如此，修改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总数的影响很可能是有限的。首先，计划生育政策让核心家庭成为文化习惯。其次，整个东亚地区的生育率都很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都在 1.4 以下（含 1.4）。即使是在人均 GDP 与中国相似的泰国，生育率也仅有 1.6。因此，即使中国现在就放开生二胎的政策，生育率也很可能会低于种群更替所需的 2.1。

这一预测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政策变化对人口总数的影响相对较小，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在政治上会更加具有可行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政策变化实际上效果不大，则即使进行改革，中国的人口结构挑战也将继续对养老保险体系带来压力。换句话说，仅仅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解决中国严重的养老保险问题是不够的。

2. 推迟退休年龄。增加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另一个办法是推迟退休年龄。目前，城镇职工的退休年龄男性是 60 岁；女性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是 55 岁，其他女性是 50 岁。这些退休年龄是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行的，而当时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 45 岁。但是，此后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已达到 73.5 岁，如此低的退休年龄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中国的退休年龄比国际标准还低。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平均退休年龄是男性 64 岁，女性 63 岁。中国女性的退休年龄几乎比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都低。

因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逐步将女性的退休年龄推迟到 60 岁，与男性相等，只要目前超过 45 岁的女性不受这一政策变化影响就行。由于女性是中国劳动力队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应该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平等化。除了推迟最初的退休

年龄，政府还可以考虑逐步将退休年龄的延长（男女都适用）与预期寿命的延长挂钩。一种考虑是预期寿命每延长一年，退休年龄就延长两个月。推迟正常退休年龄既可以改善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财务状况，也可以通过提高中国城市相对较低的劳动参与率，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政策组合二：集中管理养老保险

1. 回收地方政府的养老保险管理权。最近，一些令人欣慰的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正在关注劳动力流动和养老保险分散管理之间的关系。2009 年，国务院颁布了指导意见，明确表示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职工在移居其它城市后，有权转移养老保险的两个部分，即大多数社会统筹部分累积的资金以及个人账户累积的资金。但是，前面也提到，这些职工在目前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分散的结构下，由于行政障碍，很难转移累积的养老保险。此外，有些地方政府还允许单位将向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的缴费降至 20% 以下。

因此，审慎的做法是，中央政府把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控制权收回，并将缴费标准化。中央政府有资源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城镇职工数据库。这是建立全国性养老保险体系关键的第一步。然后，按照政策组合三的建议，中央政府才能逐步转向前期资金较为充足的养老保险体系。

当然，地方政府可能会反对丧失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控制权。但是，中央政府也会接收该体系的所有债务，包括在“铁饭碗”时代承诺支付的历史遗留养老金。这一交换是合理的，原因是目前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债务比资产多。这样做还可以防止地方政府挪用资金。如果中央政府接管历史遗留的养老保险，就应该可以把现在的缴费用于投资，以支付未来的福利。如下所述，农村和城镇非就业居民的配套养老保险计划也将逐渐纳入全国性的养老保险体系。

2. 统一各类养老保险计划。从长远来看，养老保险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和城镇非就业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应当统一。领取养老保险的条件和福利水平应当尽可能保持一致，包括法律解释和全国政策的执行标准。但是，现实是各种养老保险计划福利水平的真正均等化还需要几十年。因此，在真正均等化之前，中央政府应当允许福利水平根据各省市的平均生活水平而有所差异。养老保险的统一将铲除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大部分障碍。降低养老保险计划的差异对中国大量的农民工尤其重要。根据目前的统计，农民工人数在 1.5 亿至 2.6 亿之间，大多数人由于是农村户口，不能参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更广义地说，中国政府应当重新考虑养老保险体系和户口制度的关系。

政策组合三：转向有前期资金保障的养老保险体系

如上所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目前是基于现交现付的原则：社会统筹部分肯定是现收现付的，而个人账户部分为了支付目前的养老金也被大量挪用。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现收现付体系将很快变得不可持续。如果中央政府接管历史遗留的养老保险，就应该可以把现在的缴费用于投资，以支付未来的福利。因此，中央政府应该考虑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转变为部分资金有保障的体系，分为以下三类：

1. 对于在划断日期后至“十三五”计划（2016-2020）结束前参加工作的职工，以2017年为例，他们的养老保险应该是有全额资金保障的。尤其是单位缴费（社会统筹）应当预留并用于投资，而且投资回报应当足以支付未来承诺的福利。

2. 现有职工的养老保险应该有一部分是有资金保障的：在某个划断日期前累积的福利，以2017年为例，在职工退休的时候用未来的收入支付。但是，从2017年开始，单位缴费的社会统筹部分应当预留并用于投资，以支付在2017年以后累积的福利。

3. 中央政府应当制定一项新的法律，明确规定201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和现有职工，向个人账户缴纳的费用不得借用或使用。中央政府应当继续在13个省完成现有个人账户资金的落实工作。

这三个建议将产生巨大的转型成本。目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用目前的养老保险缴费支付的，今后需要寻找其它资金来源。当2017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退休的时候，仅有一部分养老保险是有前期资金支持的，其余的部分也必须寻找其它资金来源。虽然没有精确计算这些转型成本，但很可能需要几万亿美元。当然，随着目前这一代人的退休，这些成本可以分摊为很多年来支付。

当然，养老保险的这些转型成本必须放在中国其它重要财政目标的背景下考虑。好消息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不错：2013年4月，中央政府报告的外汇储备大致是3.4万亿美元，2012年中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46%。虽然在政治上不太容易，但中央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养老保险体系。例如，政府可以将国企首次公开上市筹集资金的较大比例用于支持养老保险。更广义地说，中央政府必须容忍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以及外汇储备的下降。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建议的改革实际上并不会增加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总债务——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实际上，1997年以前退休人员的历史遗留养老金债务只是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使其可以更高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对1997年以后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债务现在也存在，只不过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或正式的记录。这些建议将使目前隐性的养老保险债务显性化。

当养老保险债务显性化后，中国的政府官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为何这一问题必须在近期加以解决。与此同时，政府官员应当意识到，如果正确实

施，这些建议可以基本消除 2017 年以后累积的没有前期资金支持的所有养老保险债务。那些养老保险的前期资金将大部分由单位和职工缴费所支持。这些资金将放在单独的统筹账户，由专家来投资。

政策组合四：建立更好的长期投资工具

虽然中国是一个储蓄大国，但老百姓缺乏多样化的投资工具。改革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1. 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应当投资养老保险资产。由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如果不提高缴费水平，就很难提供足够的养老金收入。因此，在 2017 年以后，中国政府可以把所有养老保险缴费在国家层面放入两个不同的统筹账户，一个是单位缴费账户，一个是职工缴费账户，并指定社保基金作为这两个统筹账户的主要投资人，在承担审慎风险的基础上，获得高于银行存款的回报。

社保基金已经拥有一支有经验的专业投资团队，而且可以投资海外证券。例如，社保基金最近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开始使用广东省个人账户的 1000 亿元（160 亿美元）进行投资。

具体而言，社保基金应当建立一个平衡的基金，其中一半资产用于投资多元化的优质中国债券组合，包括民营部门和政府债券，而另一半则广泛投资全球股票组合，包括相当比例的中国股票。这一平衡的基金在承担合理风险的基础上，应当提供高于银行存款的回报。与此同时，社保基金用养老保险账户的资金投资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可以加速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这也许会为建立一个更加理性而不是以短线投资为主的中国股市创造条件。

2. 扩大对企业年金的税收补贴。中国还必须建立养老保险储蓄的第二支柱：即个人通过单位提供的养老保险计划，进行有税收补贴的储蓄。前面也提到过，单位可以代表员工设立一个投资工具，即企业年金。但是，目前采纳这种计划的单位非常少，主要原因是税收补贴不足。

为了鼓励更多的职工参加企业年金，中国政府应当增加相关的税收激励。例如，单位缴费可以用于抵扣税收，而职工缴费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等退休后再征税。这些税收激励应当是有条件的，即账户里的资金必须长期投资，例如 10-20 年。此外，政府官员应当重新考虑对企业年金计划严格的投资限制。

虽然税收激励会带来一定的财政成本，但这是鼓励单位为职工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企业年金计划所必需的。企业年金的参与率提高不仅可以增加补充的养老储蓄，而且可以培养一批长期投资者，从而帮助中国股市从交易型转为投资型。

责任编辑：刘英奎

2014 年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王绍辉

摘要：2013 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但也出现了不少亮点。展望 2014 年，发达国家经济前景总体乐观，同时，隐含的一些风险不容忽视。新兴经济体活力依旧，但正遭遇顶头风。如果用一句话预测一下 2014 年的国际经济形势，似乎可以说：困难还很多，希望也很大，经济全面复苏的基础更加稳固。

关键词：世界经济 复苏与风险

作者简介：王绍辉，国家统计局博士。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2013 年的国际经济形势，可以说，困难没有结束，复苏依然乏力。但世界经济也不是一团漆黑，美国经济增速的逐步提升和欧元区在二季度走出衰退成为两大亮点。那么，在经历了连续数年的徘徊之后，2014 年国际经济会呈现出什么态势，企稳复苏的势头是否会持续？对此进行了一些分析。

一、美国：前景乐观，风险犹存

2013 年前三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折年率分别增长 1.1%、2.5% 和 4.1%，增速逐步提升，三季度 4.1% 的增速还是 2011 年四季度以来的最高。目前，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比金融危机前的顶峰时期大约增长了 5%。在其他发达国家中，也只有德国比危机前增长了 2%，法国回到了起点，其他国家仍然不及五年前的规模。美国工业产出稳定增长，产能

利用率超过 78%，创 2008 年 7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居民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95% 下降到 79%，接近长期趋势水平，家庭债务负担有明显下降，去杠杆化即将完成。房地产市场已经触底反弹，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房价平均下跌 30%，从 2012 年 2 月份开始逐步回升，一年多来新房开工量、房屋销售量和房价都上升了 10% 以上，目前的房价已相当于 2004 年 11 月份的水平。失业率已逐步下降到 7% 左右。房价上涨和股市飙升也帮助美国人弥补了在经济衰退期间的财富损失，到 2013 年三季度末，美国居民和非盈利机构的资产净值达到 77.3 万亿美元，增长了 2.6%。工业产出的增长、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复苏、失业率的持续下降、私人财富的积累，都显示出美国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已比较稳固，美国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中率先实现复苏的国家。

但是，制约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些长期因素依然存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充满不确定性，隐含的其他风险不容忽视，并可能对美国的全面复苏构成拖累。这些制约因素和风险包括：

1. 美联储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2013 年 12 月 18 日，美联储宣布月度资产购买规模减少 100 亿美元，QE 规模维持在每月 750 亿美元。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的日益稳固，QE 退出过程可能持续整个 2014 年，而且后期的缩减规模可能更大。从总体上看，美联储逐步、有序地退出 QE，也是为了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准备的时间，不至于引起巨大的波动。实际上，从 2013 年初以来，由于美联储已不断释放退出 QE 的信号，强化了市场预期，特别是短期投机资金早已做出了反应，从 5、6 月份开始大量资金已经从发展中国家回流，证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反复震荡和黄金价格的大跌也说明市场主体已经在调整其资产配置。可以说，投资者早已为美联储退出 QE 这一天的到来做好了准备，而且美联储缩减的力度也不大，对市场的冲击有限。所以，从美联储宣布退出后的几天看，市场上并没有发生恐慌，笼罩国际经济大半年的威胁和不确定总算是暂时消除了。但是，随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性。一是大量资金回流可能推高美元汇率，影响美国出口。过去几年里，由于美联储大量印发货币，压低美元汇率，美元一直呈贬值态势，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出口，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复苏。经合组织（OECD）估算，美国的实际汇率大约低估了 15%。世界是一个整体，美元汇率低估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存在一定的汇率高估。随着美联储逐步退出 QE，大量资金回流美国，美元低估、其他国家汇率高估的情况可能会发生逆转。有机构预测，2014 年将是美元牛市的一年。那么，美元升值将降低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更快复苏。二是美联储逐步退出 QE 并不意味着把过去五年发出的大量货币收回来，目前只是减少了印发货币的数量，大量资金还是在国际经济机体中循环流动。如果这些资金在市场上肆意投机，可能会扭曲其他市场价格。例如，美联储宣布退出 QE 后，股票市场原本应该大跌或者至少是下行，但反而成了利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美

国道琼斯指数当天大涨 293 点，创出历史新高，国际油价也上涨到 100 美元 / 桶。这说明，大量资金投机于股票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市场，扭曲了价格，市场大幅振荡可能会成为常态，难以真实反映市场的需求，也会扰乱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秩序。

2. 奥巴马新医改法案可能成为影响 2014 年美国政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府预算和债务上限之争，可以说贯穿整个 2013 年，并一度导致美国政府关门 16 天。美国国会虽然在 2013 年底达成了 2014 和 2015 年的预算协议，避免了政府在 2014 年开年就关门的风险。但是根据 2013 年 10 月达成的法案，在债务上限方面仅允许政府借款到 2014 年 2 月 7 日。按照目前的发债速度，美债将在 2014 年 2 月底或 3 月初迎来违约大限，两党就如何提高债务上限的斗争可能还将持续。现在，共和党放弃了在以前谈判中所采取的极端方式，正在重新筹划发起新的攻势，而目前实施中出现问题的新医保法案将成为目标。奥巴马把通过新医保法案作为其总统任内最大的政治成就。该法案的核心是让美国民众尤其是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人享受全面的医疗保险，均衡民众的医保待遇。奥巴马设计了一个由企业支付、个人强制购买、政府医疗补助计划共同支撑的体系，以确保顺利实施，但却出现了意外的问题。一是因为担心可能给企业增加负担，并引发失业，企业支付部分被延期一年执行。二是个人在强制购买保险时，却发现自己负担的费用大幅度上涨，产生了严重的抵触和反感。有研究显示，在分析了 49 个州的数据后，医疗保险的费用平均上涨 41%。新医保法案可以为民众提供一个更高级的医疗照顾，可是，这种未经当事人同意的“医保升级”让很多民众难以接受。新医保法案实施的第一个月，只有约 10 万人参加新医保，比例非常低。奥巴马希望通过政府提供医疗救助来平息民众的愤怒，可是有资格享受政府补贴的人数只占全美人口的 13%，大部分人享受不到政府补贴。到 2014 年 3 月 31 日新医保参保报名结束前，有多少人参保将成为检验新医保法案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如果参保人数比例不高，将直接威胁到民众对民主党的支持。2013 年底，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仅有 41%，远低于年初的 55%，与前任小布什总统并列倒数第一。大幅下降的原因是包括医保在内的一连串事件激发了人们对奥巴马的不满。2014 年 11 月将进行国会中期选举，面临改选的席位大部分是民主党的。现在似乎已经不是民主党要力争夺回众议院主导权的问题，而是能否保住参议院的席位问题了。如果因医保法案影响到民主党选情，失去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那么共和党将直接控制参众两院，奥巴马政府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政府也将很难再出台什么有效地促进经济复苏的措施，美国经济的复苏势头可能因此而受挫。

3. 美国投资增长依然缓慢。两党的斗争实际上还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才是最紧迫的。2013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财政自动减支，将在未来 10 年减少 1 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导致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购买力下降。2013 年底，美国公共投

资规模已经创下二战后军人大批复员以来的最低值，占 GDP 的比重已降到 3.5% 左右，低于战后 60 多年 5% 的平均水平。政府核心职能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预算支出规模和自由度，而财政减支以及共和党的有效阻挠，制约了政府在基础设施、科技以及教育领域的支出计划。很多企业明确表示，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目前在大规模投资方面没有什么信心，更多只能是一些小规模、保守的投资。2013 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被向上修订为 4.1%，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有益于库存的过快增加，私人库存增加贡献了 1.67 个百分点，投资的拉动作用依然很小。而企业积累了大量库存后，在投资没有显著增长、消费增长通常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在未来一、两个季度库存增长很难对经济再有明显拉动。美国 2013 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明显低于三季度。

4. 创造财富的劳动人口正在减少。一方面，失业率持续降低反映了市场的活力正在恢复；但另一方面，努力寻找工作的人数正迅速减少，也就是分子和分母同时小了，也会导致失业率下降。到 2013 年 9 月，有 9061 万 16 岁以上的美国人决定不再去寻找工作，退出劳动力人口。而在 2009 年 1 月奥巴马总统上任时，退出劳动力人口的规模为 8051 万人。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任内已有 1000 万人退出，还有超过 400 万美国人已失业 6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劳动力人口减少，相应地享受政府救济和保障的人口增加，必将影响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

5. 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日渐缓慢。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是引发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没有房地产市场的真正复苏，就很难有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在国外购房者大批涌入和低利率政策刺激下，房价、销量出现了一年多的快速增长。但目前，恢复的动能正在减弱。美国 30 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在 2013 年 6 月出现跳升后，已经达到 4.5% 左右。利率上升使借贷成本提高，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快速复苏。二手房销量已经从 2013 年 9 月开始，出现了连续的回落。在美联储宣布逐步退出 QE 后，虽然承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超低利率政策，短期利率不会马上大幅上升，不会对房价构成下行的压力，但利率上升的预期是明确的，可能会拖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步伐。

尽管美国经济的复苏具有了一定的微观基础，但复苏的势头还称不上强劲，最多只能算是平稳。制约长期增长的因素还很多，危机以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014 年出现全面快速复苏的可能性不大。近期，多家机构也预测了美国 2014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大约为 2.7% 左右。

二、欧元区：复苏脆弱，通缩压力加大

在 2013 年二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 0.3%，结束了成立以来历时最长的经济衰退。目前，欧元区复苏的范围比较广泛，除核心的德国、法国外，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

三季度环比增长 0.1%，终于实现了增长。一些外围国家如葡萄牙、爱尔兰等也加入增长的行列。特别是爱尔兰政府在 2013 年 12 月 15 日宣布，彻底退出为期三年的国际救助计划，成为欧元区首个摆脱国际救助、走出债务危机的国家。但欧元区三季度仅环比增长 0.1%，可以说刚刚出现的复苏又陷入了停滞，显示出目前复苏的脆弱性，也使人们对欧元区经济的乐观预期被冬日的阴冷所取代。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对欧元区的复苏持“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欧盟委员会预计，2013 年欧元区经济萎缩 0.4%，2014 年或许能实现 1% 左右的正增长。

1. 欧元区经济政治一体化进展缓慢。2013 年，欧元区的一体化进程进展缓慢，直到 9 月份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政党赢得大选胜利后，才又开始有所推进。2013 年 10 月欧盟财长会议正式批准欧洲央行成为欧元区单一银行监管机构，从 2014 年 11 月开始监管欧元区内的主要银行，推动银行业联盟迈进了一步，这将切断欧元区内一些国家存在的银行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2013 年 12 月，欧洲各国同意建立一个共同的救助基金处置濒临倒闭的银行，为倒闭银行的清算机制规划了蓝图，但由于清算程序漫长复杂、不能直接动用欧洲稳定机制（ESM），也引发了很多不满和批评。尽管在经济一体化上有了一些进展，但只有当欧元区各国在政治联盟上达成一致，欧元的生存才能获得最有效的保障。2013 年 10 月的欧盟峰会原本希望为建立欧元区共同政府创造一些条件，但成员国在共同支出和借款、共同为银行和借款人提供支持等方面难以取得一致。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分歧较大，2014 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一些欧元区国家认为德国是阻碍一体化的反面角色，但希腊等国家出现问题，并不是因为德国奔驰和宝马公司生产了好车。经济危机、相互指责、过度紧缩，长期身处纷争中的人们已经逐渐失去了追逐欧洲一体化的信心和热情。

2. 通货紧缩的阴云正在欧元区上空聚集。欧元区 2013 年 10 月 CPI 为 0.7%，远低于 2% 的通胀目标，为 2010 年 2 月以来首次降至 1% 以下。一些欧元区外围国家已经出现通货紧缩，法国、比利时等通胀率也接近于 0。通货紧缩会打击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偿还债务的能力，并可能导致消费陷入停滞。过去 20 年日本的情况也表明，通货紧缩可能是影响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欧洲央行已紧急降息，把再融资利率从 0.5% 下调到 0.25%，以应对通缩的风险。2013 年 11 月通胀率略微回升到 0.9%，降息效果并不明显。欧洲央行表示，也可能会进一步降为负利率，但实行负利率未必就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丹麦为例，在实行负利率后存款流失，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加，不得不用更高的利率放贷以保持盈利，企业和个人贷款负担加重，更加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借贷，背离了负利率的初衷。而且，若降为负利率后，除了一些非常规的措施如向商业银行在欧洲央行的存款征税外，货币政策空间就几乎没有了，欧洲央行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现在，需要欧元

区各国迅速行动起来，否则很有可能会陷入经济长期低迷的困难局面。

3. 主权债务和私人债务依然庞大。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规模依然庞大，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欧元区 2013 年二季度主权债务总规模升至 GDP 的 93.4%，比年初又提高了 6 个百分点。更要看到，欧元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沉重的私人债务，即家庭和非金融企业以贷款和债务证券形式背负的债务。如果把私人债务占 GDP 的比重达到 200% 作为警戒线，那么，在 17 个成员国中，有 8 个国家私人负债过重，十分脆弱。负债过高使企业不愿意开展新的投资活动，个人的消费能力也会受到抑制，银行也无一例外地不愿多放贷，贷款规模萎缩。欧洲央行的报告显示，2013 年 10 月欧元区货币供应 M3 同比增长只有 1.4%，为两年内最低，远低于欧洲央行 4.5% 的目标。其中，家庭信贷仅增长 0.1%，企业信贷负增长 3.7%。如果个人、企业的资产质量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将对欧元区能否走上持续的经济复苏产生深远的影响。

4. 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影响一代人。欧元区 2013 年 10 月份失业率达到 12.1%，而年轻人的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24.4%。我们常说，年轻人是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兴。可现在，欧元区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一些人已经失去了就业的希望，丧失了竞争的能力，那么，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欧元区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尽管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IMF 三架马车在处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上付出了巨大努力，欧洲也在一体化进程中艰难前行，但欧元区目前的复苏还非常脆弱，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加以巩固。欧元区需要有真正的银行业联盟，共同监管、共同清算机制，还需要有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中央银行不仅要关注通胀，还需要关注增长和就业。欧洲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欧元也是重要的国际货币，完全有条件实现全面的复苏，完全有能力推进一体化进程。欧元区各国应立即行动起来，与时间赛跑，真正推动经济实现复苏。

三、日本：增长缓慢，难以走出泥潭

日本在“安倍经济学”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手笔的财政刺激下，投资和消费等见到了一些成效，2013 年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 0.9%，三季度增长 0.3%。但 IMF 评价日本为 2013 年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日本的问题不在于流动性，而是面临着人口严重老龄化、内需不足、出口下滑、政府债务庞大等结构性的困难。日本政府在结构性改革方面进展缓慢，经济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

由于日本央行大量购买本国国债，国债余额与 GDP 之比达到 244%，并使国债价格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只有 0.6% 左右，为全球最低。大型金融机构也逐

渐缩减了国债规模，减少了日常的交易量。有分析称，日本国债市场已宣告死亡，只有央行成为国债价格的唯一驱动者。大量资金在本国找不到盈利机会，必然投资到其他国家。一方面，政府开动印钞机将大量资金注入经济；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私人资本退出本国经济循环而溢出到国外。可见，这样的刺激政策很难取得明显的效果，无法解决更多实质性的问题，也难以持续下去。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又与政府控制国债规模、控制赤字的目标相矛盾。日本经济的缓慢增长可能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四、新兴经济体：活力依旧，但正遭遇顶头风

过去 10 多年，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和自身工业化、城镇化大潮中迅速崛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济充满活力。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凭借及时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以及大量廉价国际资金的涌入，经济增长强劲。2000-2012 年，新兴经济体 GDP 年均增长 6.2%，经济规模已经占到全球的一半，而同期美国年均仅增长 1.9%。但从 2013 年 5、6 月份开始，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开始遭遇比较猛烈的顶头风。虽然新兴经济体种类较多、规模不一、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但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难，2014 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一些，略低于过去 10 多年的平均水平。

1. 全球流动性收紧带来一定的风险和冲击。美联储持续五年的 QE，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新兴市场国家。有机构统计，这 5 年间美国共向市场投放了 5 万亿美元，其中约 80% 即 4 万亿美元流入了新兴市场国家。而 QE 退出的资本反向运作会导致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消费、投资、信贷等都会在流动性大潮退去时受到冲击，给经济带来剧烈波动。2013 年中，在美联储可能会提前退出 QE 的骚动下，大量资金迅速撤离，印度、印尼、泰国等严重依赖外资流入的国家汇率大幅贬值，通胀压力加大，经济剧烈波动，并一度传出可能再次发生类似于 1997 年的金融危机。但是，这种超前的调整实际上起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冲作用，在 2013 年 12 月美联储正式宣布逐步退出 QE 后，新兴国家的市场没有再次出现剧烈的波动，亚太股市甚至是小幅度的连涨。而且从另一方面看，美联储退出 QE 意味着美国经济全面复苏的官方证明。因为美联储退出 QE 的前提是，经济复苏更稳定、失业率下降并接近 6.5% 时。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也会拉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而且如前所述，美联储退出 QE 后，美元会逐步升值而其他国家货币会贬值，这也更有利于新兴国家的出口增长。可以说，退出 QE 所带来的波动是暂时的，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趋势仍将是投资环境和盈利前景，所以，从长期看新兴经济体仍将依靠自身活力和发展潜力吸引资金流入，并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健康发展。2013 年，虽然经历了年中几个月的大幅波动，但新兴市场美元债券的发行规模达到 4500 亿美元，再创新高，这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新兴市场对国际资本依然具有一定的投资吸引力。

2. 一些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增速会放缓。在工业化进程的前期，比较容易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但进入中后期时，很多国家面临产能过剩、技术升级缓慢、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制约等问题。巴西、印度等经济体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力争朝着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转型。但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可能会放缓一些。

3. 过去大量廉价资金的流入催生了一些泡沫，要平稳消除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如巴西，自 2008 年以来房价上涨了 200%，有分析认为，巴西似乎正在步欧美等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后尘。2013 年三季度巴西经济环比负增长 0.5%，是自 2009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下滑。在全球流动性收紧的预期下，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较大，有一定的下行风险，那些依靠能源、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盈余可能会缩小，国民收入增长将放缓。对于依靠提供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由于目前初级产品的价格较高，抑制了需求，初级产品生产过剩，出口压力加大，贸易条件可能会逐渐恶化。

4.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走势强劲，但也需依靠调整经济结构以实现持续的增长。近些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依靠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农业增产以及石油和采矿业的的增长，经济增长保持强劲，这也带动了整个非洲的经济发展。2000 年以来非洲 GDP 年均增长 5.1%，非洲出口已经翻了两番，达到 6000 亿美元。现在，这些国家在自然资源、农产品、劳动力成本等领域依然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还将保持较快的速度，更有能力应对外部冲击。但也必须在教育、消除不平等、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增加力度，实现包容性更强、更可持续的增长。

新兴经济体在经过了 10 多年的快速发展后，需要对经济实施更全面的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在研发等方面的投入，以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9.8%，而世界经济年均增长 2.8%。2008-2012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 20%。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一系列改革举措将陆续推出，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必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

总的看，世界经济，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还处在转型调整的过程中，谁转型得好，谁调整得快，谁就能在未来抢占先机。如果用一句话预测一下 2014 年的国际经济形势，似乎可以说，困难还很多，希望也很大，前景总体乐观，经济复苏的基础更加稳固。

责任编辑：刘英奎

2014 年世界经济将加快增长

——全球主要机构预测综述

刘仕国

摘要：以私人消费为首，连同固定资本形成和贸易等，将带领 2014 年的世界经济加快增长。其中，受金融市场进一步好转、货币政策整体仍然宽松和财政整顿放缓的积极影响，发达经济体比其他经济体更快增长，后者主要受累于经济结构性问题。不过，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日政府债务压力加大，欧洲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深入调整，新兴经济体结构性问题突出，将挑战世界经济治理。

关键词：世界经济 增长 风险治理

作者简介：刘仕国，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在 2012-2013 年的低迷后，世界经济 2014 年回暖力度将加大，主要动力来自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仍将在低位震荡。主要基于全球主要机构可获得的最新报告（见下页注①），本文得到了上述结论。这些机构包括主要国际组织、主要国家的政府、著名投行和学术机构。

一、2014 年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强于 2013 年

世界经济将加快增长。按全球主流机构的预计，2014 年全球 GDP 将增长 3.6%，比

2013 年快 0.7 个百分点^②。此外，世界 GDP 实际增速将超过潜在 GDP 增速，这同 2012—2013 年的情况相反^③。

经济回暖的动力主要来自消费，投资难以显著改善，以最终消费品为主力的国际贸易加快回暖。

私人消费加快回暖，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消费将增长 2.5%，比 2013 年

①预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 GDP 增速的机构分别有 36 家、29 家和 21 家，其中部分机构（随后标注下划线者）同时预测了美、欧、日的经济趋势。其一，预测美国增速的机构如下：Action Economics, American Int'l Group, Bank of America - Merrill, Barclays Capital, CBO (2013 年 2 月), Citigroup, Credit Suisse, Dupont, Eaton Corporation, EIU, Fannie Mae, First Trust Advisors, Ford Motor, General Motor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HSBC, IHS Global Insight, IMF (2013 年 10 月), Inforum - Univ of Maryland, JP Morgan, Moody's Analytics, Morgan Stanley, Nat Assn of Home Builders, Northern Trust, OECD (2013 年 11 月), OMB (2013 年 7 月), Oxford Economics, PNC Financial Services, RDQ Economics, Standard & Poors, Swiss Re, The Conference Board, UBS, Univ of Michigan-RSQE, Wells Capital Mgmt, Wells Fargo。

其二，预测欧元区增速的机构如下：Allianz, Bank Julius Baer, Bank of America-Merrill, BBVA, BNP Paribas, Commerzbank, Credit Agricole, Credit Suisse, ECB-midpoint (2013 年 6 月), EIU; ETLA,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年 11 月), European Forecast Network, Goldman Sachs, Grupo Santander, HSBC, IHS Global Insight, IMF (2013 年 10 月), ING, Intesa Sanpaolo, JP Morgan, Matixis, Moody's Analytics, Morgan Stanley, Nomura, OECD (2013 年 11 月), Oxford Economics, Societe Generate, UBS, UniCredit。

其三，预测日本增速的机构如下：Bank of Toyko - Mitsubishi UFJ, Citigroup Japan, Credit Suisse, Dalwa Institute of Research, Deutsche Securities, EIU, Goldman Sachs, HIS Global Insight, HSBC, IMF (2013 年 10 月), ITOCHU Institute, Japan Ctr for Econ Research, JP Morgan-Japan, Merrill Lynch - Japan,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Mizuho Securities, Nippon Steel & Sumikin Research, NLI Research Institute, OECD (2013 年 11 月), Toyko Motor Corporation, UBS。

②该增速按购买力平价 (PPP) 对各国 GDP 数据加权后计算而来。如果改按当期市场汇率计算，该增速将为 3%，仍比 2013 年快 0.7 个百分点。IMF (2013 年 10 月) 和 World Bank (2013 年 6 月) 的相应数字分别为 3% 和 0.8 个百分点，同 IMF 预测的趋势一致。IMF (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ransitions and Tensions, October 2013. Washington, DC, USA. World Bank (2013).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less volatile, but slower growth.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no.7.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une 2013。

③World Bank (2013).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less volatile, but slower growth.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no.7.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une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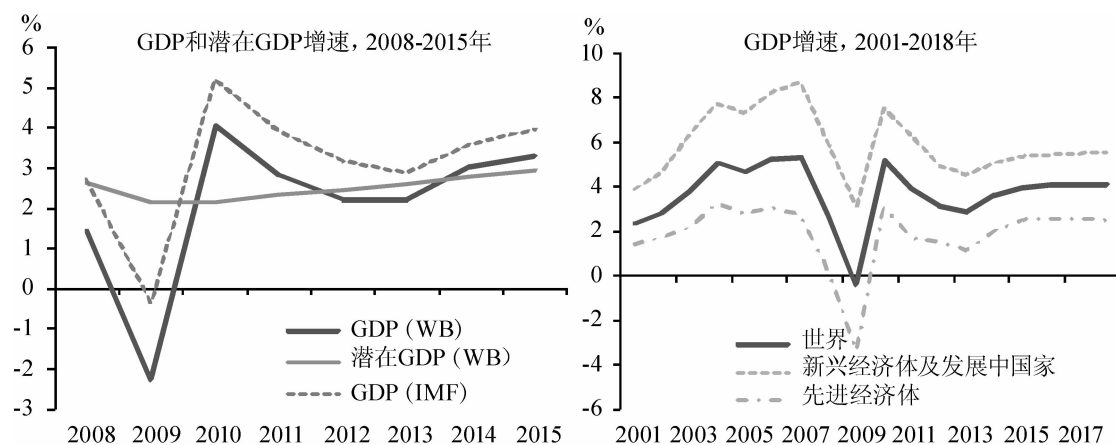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经济增长, 2001-2018 年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2013)、IMF (2013); CEIC 数据库;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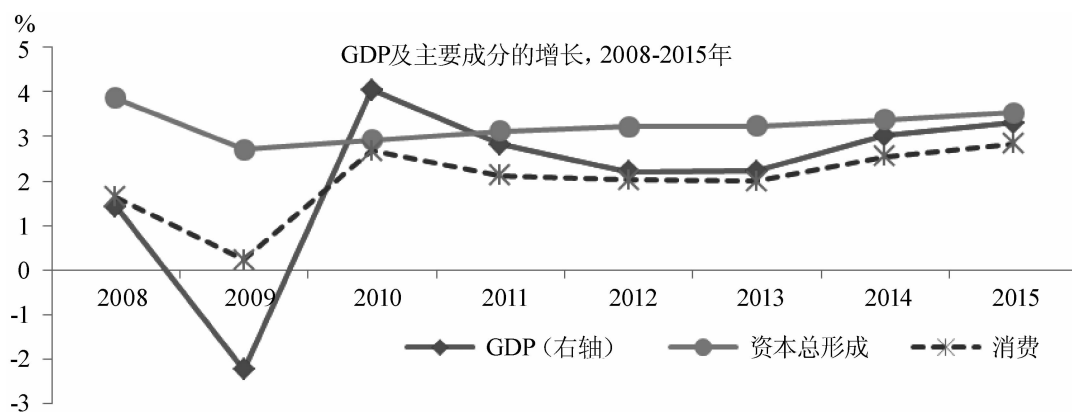


图2 世界经济增长, 按支出项: 2008-2015 年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2013); CEIC 数据库;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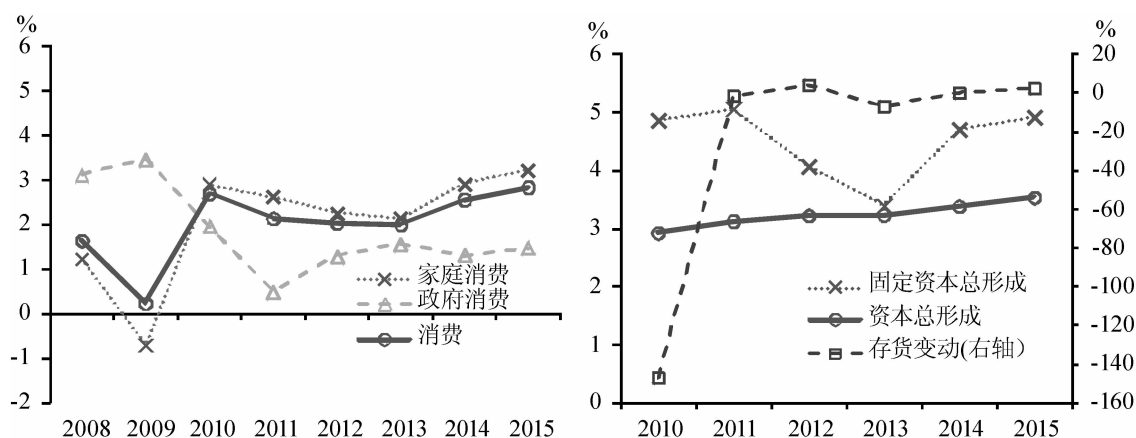


图3 世界消费与投资增长, 按明细项: 2008-2015 年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2013); CEIC 数据库;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快 0.5 个百分点，超过 2011-2013 年年均 2%-2.1% 的低迷状态。消费增长的主力来自家庭部门：家庭消费加快增长 0.8%-2.9%，而政府消费放缓增长 0.2%-1.3%。

投资温和回暖。资本总形成 2014 年将增长 3.4%，比 2013 年快 0.2 个百分点，较 2011-2013 年的 3.1%-3.2% 仅略有改善。其中，固定资本形成增长 4.7%，比 2013 年加快 1.3 个百分点；调减存货的步伐明显放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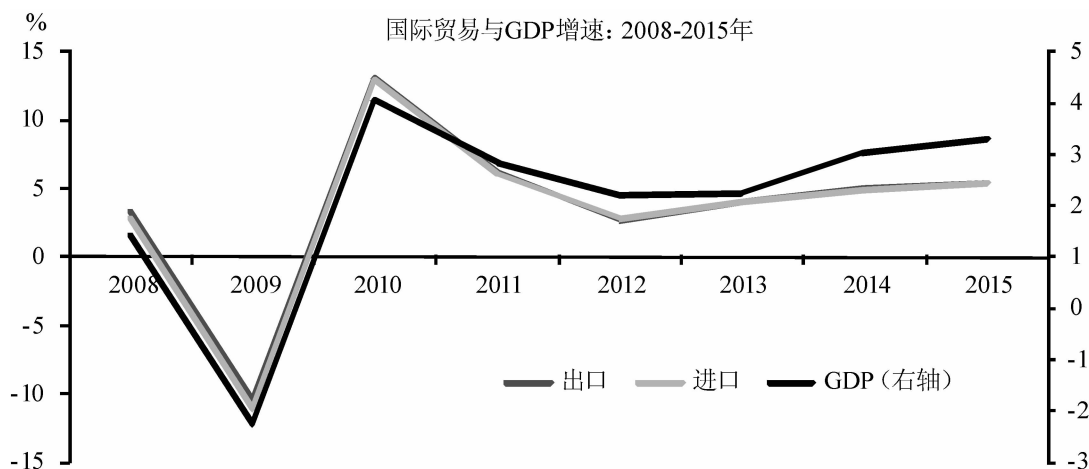


图 4 世界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增速：2008-2015 年

资料来源：World Bank (2013)；CEIC 数据库；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全球贸易继续温和复苏，但步伐略有加快。出口将增长 5%，进口将增长 4.9%，比 2013 年略有加快。

二、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强于新兴经济体

同 2013 年相比，2014 年发达国家 GDP 增长加快 0.8 个百分点至 2%，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加快 0.6 个百分点至 5.1%^①。在发达国家中，仅日本略有放缓。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仅巴西放缓。

(一) 美国经济增长大步加快

预计 2014 年美国 GDP 增长 2.6%（概率达 75%），比 2013 年快 1 个百分点。其中，私人消费加快 0.5%-2.4%；私人投资加快 2.3%-5%，几近翻番。市场主流预计美国 2014 年

^①IMF (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ransitions and Tensions, October 2013. Washington, DC, USA.

的 GDP 增速分布在 2.3%-3% 之间，均高于 2013 年的数值。

支撑美国经济加快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其一，劳动力市场继续复苏，加上资产价格上涨和债务杠杆率下降。其二，银行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改善，对私人企业的信贷条件将趋于宽松，加上企业自身充足的现金流，推动企业投资继续增加。其三，往昔的减税到期，以及财政支出的削减，将使财政预算状况得到改善，财政收紧额 /GDP 从 2013 年的 2.5% 缩窄至 0.75%，推动 GDP 增速升 1 个百分点。其四，货币政策仍支持增长。随着实体经济内生向上动力的大幅增强，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开始退出，且退出力度逐步加大，但常规宽松政策不会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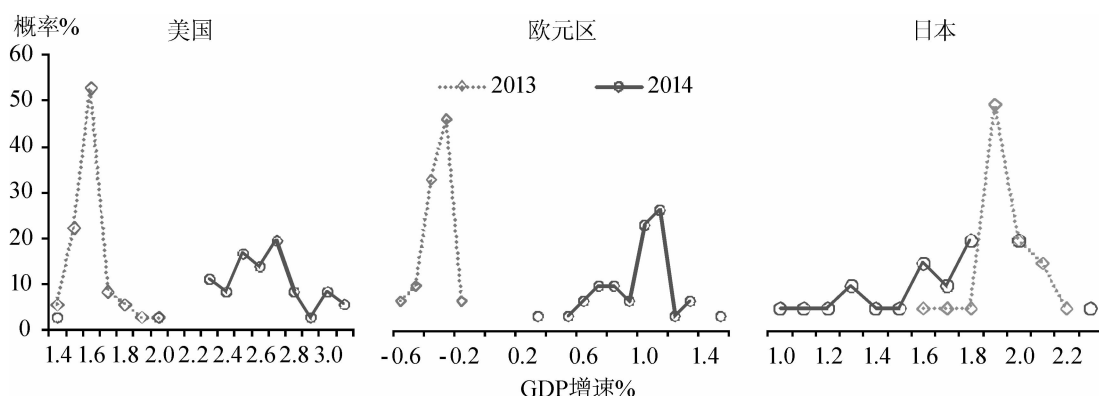


图 5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 GDP 预期增速的概率分布：2013 年和 2014 年^①

（二）欧洲经济明显回暖

欧元区 GDP 增速将从 2013 年的 -0.3% 跃升 1.2 个百分点至 2014 年的 0.9%（概率达 68%）。其中，私人消费从 -0.6% 升 1.1 个百分点至 0.5%，政府消费从 0.1% 升至 0.2%，固定资本总形成从 -3.6% 升近 5 个百分点至 1.3%。对 2014 欧元区 GDP 增速的预计主要集中在 0.6%-1.4% 之间，均超过 2013 的数值。

支持欧元区经济回暖的主要理由如下。其一，金融市场继续改善，带动资产价格上涨，相应的财富增长效应使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企业信心均趋于稳定，推动投资大幅跃升，私人消费继续回暖。其二，美国、日本和中国的进口需求继续回暖，继续拉动欧元区的出口加快增长。其三，财政减赤步伐大大放缓，减赤规模 /GDP 缩减 0.5 个百分点至 0.5%。其四，货币政策空间较为宽松。10 月，通胀率仅为 0.7%，远低于 2% 的政策目标。自 2013 年 11 月降低政策利率以来，欧央行认为，如果复苏信号衰减或通缩压力增

^①数据来源参见第 68 页注 1。

大，可能会考虑进一步的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如果需要，欧央行仍可要求银行继续充实资本金或者重组，以及进一步加强银行业联盟建设（推进共同监管、共同的危机解决方案和共同的财政支持）。其五，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为经济与就业的增长提供必要的支持。但是，房地产价格继续下跌，引起进一步相关市场主体（含银行）进一步去杠杆化，信贷依然从紧（尤其是外围国家），以及高失业和大量过剩产能缓慢改善，将拖累经济复苏强度。

分国别看，德、英、法经济继续快速回暖，主权重债国家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其中，德国 GDP 增速从 0.5% 跃升至 1.7%。低利率、实际工资上涨和高就业，推动私人消费增速从 1% 升至 1.4%；低利率和欧元区信心回升，促进投资稳定上升（设备投资增加，但房地产增长放缓）；欧元区、美国、日本、中国等增长加快，推动德国出口加速增长，但设备投资推动进口强劲增长，致使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回落。杠杆率的降低，将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放贷的信心。简化国内企业的创业程序，放松对专业服务的监管，放宽对女性从业的限制，进一步开放高等教育，将增强国内经济的动力。

法国 GDP 增速从 0.1% 升至 0.8%。其中，外部需求加速回暖，国内改革增强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共同推动出口加快增长；低通胀同高失业和增税相互冲抵，致家庭消费温和增长，增速从 0.2% 升至 0.5%；财政整顿放缓（但仍削减无效且非优先的支出项），银行放款条件放宽，推动企业信心逐步改善，但企业盈利前景未明显改善，私人投资只是略微加快。结构性改革对就业和竞争力的促进效应虽加快显现，但仍需在广泛的范围内继续推进。

英国 GDP 增速从 1.4% 升至 2.2%。通胀低迷，消费者信心继续上升，推动家庭消费稳步增长，增速从 1.7% 升至 1.9%。企业信心上升，信贷供应持续改善（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助力私人投资尤其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回升。在这个过程中，家庭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改善。国内外需求增长双双加快，使进口和出口规模同时上升。英格兰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包括低利率和非常规宽松措施），有利于经济持续复苏；银行部门加快增资步伐，有助于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加快将降低财政赤字率，但仍需坚持财政整顿计划，以增强中长期内财政的可持续性。应优先消除相关障碍，促进住房供给，有助于抑制房产价格过快上涨。

意大利 GDP 增速从 -1.7% 跃升至 0.5%。家庭消费增速从 -2.5% 升至 0。单一监管机制推动银行继续调整资产负债表，加上金融市场继续稳固，促使银行逐步放松信贷条件，有利于企业投资回暖。外部需求尤其是欧盟以外需求加快回升，将带动出口增速从 0.1%

升至 3.6%，并进一步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增加企业设备投资，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 -5.2% 跃升至 2.7%。内部需求回升，使进口快速反弹，增速从 -3.6% 回升至 3.6%。由于公债率过高，财政紧缩仍将持续，推进结构改革（包括降低工资税）。不过，内部需求向好，首先表现为提高现有雇员劳动时间，而非增加就业，因此高失业率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

西班牙经济增速从 -1.3% 升至 0.5%。衰退即将结束的信号越来越多。外部市场回暖，结构改革增加了出口品的竞争力，有利于出口继续高位增长，拉动固定资本总形成从 -6.6% 升至 -1.5%，但建筑业投资可能继续大幅收缩。劳动力市场改善，带动家庭消费增速从 -2.7% 升至 0。财政整顿略有放缓，但信贷依然从紧，将拖累复苏步伐。为巩固市场信心，政府应继续坚持财政整顿和结构改革，包括同雇主一起增加各种培训，提升劳动力技能，促进劳动力跨部门流动。银行部门重组和增资取得明显进展，但房地产价格继续下跌致不良贷款增加；欧央行力推的下一轮压力测试即将开始，迫使商业银行提高对中小企业新增贷款的利率（事实上信贷需求仍然疲弱）。

葡萄牙经济将转暖，GDP 增速从 -1.9% 升至 0.1%。这主要是因为外部环境继续提升，国内需求开始恢复。劳动市场积极改进，失业率持续缓慢下降，有助于国内需求的恢复。财政整顿取得成功，带动私人部门恢复信心。为提高潜在产出，政府应继续推进结构改革，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改善司法体系，重组国有企业。因为企业不良贷款仍在增加，银行将继续去杠杆化（包括增资）。EFSM 和 EFSF 救助款延期，大大降低财政融资压力。

希腊经济增速有望转正。这主要是外需改善和国内投资增加所致。私人可支配收入低迷使私人消费难以明显改善，但产品市场等领域的结构改革和旅游业复苏，带动投资和出口回升。高债务压力之下，财政整顿仅略微放缓。银行资产负债表有待继续调整，税收改革仍需推进。

（三）日本经济小幅回落

日本 GDP 增速将从 1.9% 放缓至 1.7%（概率为 52%）。这主要是因为财政整顿将加强。为降低结构性财政赤字（核心赤字率从 2013 年的 9% 逐步降至 2015 年的 5%），日本将提升消费税 3 个百分点至 8%（2014 年）和 10%（2015 年），并减少财政刺激和重建支出，势必压制 GDP 增长势头，但会提振市场对中长期公共债务的信心。

为冲抵该放缓效应，日本拟另推“一揽子刺激”举措，有力托举经济增速。此外，日本将维持“定性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直至通胀率升至 2%。外需将继续走强，因为美国、欧洲和中国市场回暖，且日元继续处于低位。

（四）新兴经济体温和回暖

预计新兴经济体的低失业率将使消费保持坚挺；货币政策仍然宽松，继续助推国内投资；受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趋强的拉动，出口上升。但是，国际资本流入放缓甚至净流出，对国内增长形成负面冲击。

中国继续推进增长方式转型，增速将维持在 7.5% 左右。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都将加快，但前者仍低于后者。对经济放缓增长的担忧，促使财政支出略有增加。受外部需求加快复苏的带动，出口增长提速。结构性改革将继续推进，包括金融自由化、劳动力流动和“营改增”等。

印度经济增长从 3.8% 加快至 5%。主要原因有二：卢比贬值和外需增强推动出口增长加快，基础设施投资将加快。不利因素在于供给不足和卢布贬值导致通胀高企。高通胀一方面迫使货币政策从紧和财政减支，而这却将限制供给的改善；另一方面又要求财政增加价格补贴，最终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陷于一定程度的两难尴尬之中。政府或将进行如下平衡：在不得不支出的财政补贴中，减少能源补贴，增加价格补贴；改善基础设施；改革劳动市场，提高潜在产出。

俄罗斯 GDP 增长从 1.5% 升至 2.3%。这主要是受基础设施、能源和矿业投资增加以及出口上升等的影响；低失业推动工资进而私人消费稳定增长。为提高潜在产出，政府有必要优先改善投资氛围，包括降低油气市场准入障碍，提高劳动技能，加大创新支持力度。

在拉美，资本市场动荡可能仅仅是短期现象；汇率贬值刺激出口的效应可能被金融从紧效应抵消。在巴西，尽管本币贬值刺激出口，消费回升，但受通胀高企的影响，GDP 增长将从 2.5% 放缓至 2.2%。通胀高企迫使央行提高政策利率，阻碍投资增长。外汇市场波动增大，也将降低市场信心。

南非 GDP 增速从 2.1% 升至 2.9%。高失业导致市场信心低迷，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消费不振，但世界贸易复苏势头增强带动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兰特趋弱，流入矿业的外资增加，带动矿产出口增长加快。

沙特 GDP 增速从 4.1% 升至 4.6%。这主要是因为油价回升促使石油生产温和增加，而且国内财政支出依然保持高位。

三、主要风险与可能应对

第一，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QE）政策，致使全球流动性收紧，新兴经济体金

融市场因此加大波动、资产质量降低和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美联储很可能执行 QE 政策的“相机退出”——摸着石头过河，边退边看：逐步减少债券购买规模，使长期债券收益率温和而非快速上升，确保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尽量低。

第二，围绕美国债务上限调整的政治争端，将冲击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其一，如果国债上限不能上调，将迫使美国联邦政府调整支出结构，压缩其他开支（包括消费支出），以支付利息。这势必加大美国财政整顿力度。其二，恶化金融市场信心，引发金融动荡，包括全球股价大幅下跌。OECD《经济展望》（11月19日）的实证模拟显示，上述现象将导致全球GDP增速放缓1.3至2.3个百分点，全球贸易增速放缓3至5.2个百分点。

第三，欧元区的风险包括银行资产负债表仍不健全，公共融资不可持续，部分国家政局仍存不确定性。这可能引起金融市场动荡。欧元区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比如继续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联盟的透明度），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包括应对效率）。由于经济有限回暖、通胀压力增大且面临美国退出QE的冲击，欧央行将维持现有低利率政策甚至继续加大宽松力度；主权重债国家继续放缓财政整顿步伐，但将着力改善调整的质量，包括扩大税基。

第四，日本的风险包括私人消费后续乏力和国债中长期内难以持续。由于工资未能与物价协同上涨，家庭消费信心弱化，私人消费后续乏力。公债率超过230%，降低了市场对日本政府的信心。为此，政府需制定详细可靠的中长期战略，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增长。此外，日本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为增长提供必要动力。

第五，受周期性特征和结构问题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难以显著改观。最显著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带动大宗商品量价回落。部分新兴经济体通胀高企，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空间。鉴此，新兴经济体将继续主推结构性改革。

责任编辑：刘英奎

· 产业经济 ·

电子信息产业：稳增长前景可期

罗仲伟

摘要：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以经济转型为表现形式的新经济变革时期，基于信息化、数据化的科技和工具的出现以及深入应用，意味着新一波电子信息产业浪潮正在跨越产业边界或临界点，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经济转型迈进新一轮技术周期和商业周期。云计算、移动化、社交化、大数据和集成一体化正在成为企业信息化发展的五大热点，将为企业业务转型和信息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将为我国电子信息行业注入新的增长活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应当坚定信心，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快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电子信息产业 稳增长 信息化

作者简介：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与传统制造业不同，电子信息产业是一个国际化程度更高、技术进步更迅速、产业周期变化更频繁、知识与资本更密集、产业带动能力更强大的产业。近年来，尤其是自 2011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困难增多，同时受到产业周期变化的影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速度呈总体放缓的态势。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指引下，经过全行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2012 年电子信息产业缓中趋稳，生产增速小幅攀升，效益状况趋于好转，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产业整体发展的方向变动。电子信息产业继续为推动信息化发展、促进两化深度融合和带动

其他产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201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总体来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仍具备较好的基本面，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但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仍较为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相互叠加，长期问题与短期困难相互交织，形势仍不容乐观。电子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需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围绕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按照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保障产业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一、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前景

电子信息产业以其产品增值空间大、市场拓展范围宽、产业带动能力强、转型提升作用好、提供就业机会多、创新关联程度广等特点，为工业发达国家共同关注，市场呈现高增长态势。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伴随着电子信息科学和技术的不断突破，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就一直是工业发达国家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的重要战略，由此如潮水般一波一波展开的产业增长和企业竞争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改善人类生活条件最活跃、最重要的力量。

自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令全球经济受到波及，世界三大经济体均处于不景气状态，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欧债危机继续蔓延扩大，全球进入一个经济低迷期。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产业内部也受到技术周期和市场周期的影响，增长步伐被迫放缓。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以经济转型为表现的某种新经济变革时期，产业格局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孕育的生产方式变革、所促成的生活方式变革刚刚崭露头角，以个性化、体验化、服务化、互联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商业模式、新服务方式、新生产关系正在从价值理念、产业范式到社会运转、生活应用的各个层面颠覆人们原有的观念。可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嵌入在技术、组织、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变革，而且正在改变整个生产和消费的生态，以致需要重新定义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关系，进而深刻地影响人在经济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伴随着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的同时推动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这场经济变革与物联网、社交、移动、大数据以及云计算密切相关，或者说是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为基础。正因为这些科学技术和应用

工具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工业革命和新经济变革时期的到来。这些基于信息化、数据化的科技和工具的出现以及深入应用,既是电子信息产业自身实现突破性进展的体现,也是电子信息产业借以恢复增长、重振雄风的利器,意味着新一波电子信息产业浪潮正在跨越产业边界或临界点,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经济转型迈进新一轮技术周期和商业周期。值得强调的是,新经济变革时期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于,这一轮经济转型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紧密互动,人们难以分清究竟是经济转型催生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经济转型期的到来。

(一) 新的国家战略出台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会倒逼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格外重视通过产业振兴经济。2009 年年底,美国出台“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的国家战略,其中涉及 6 大产业;欧洲 2010 年 3 月出台“2020 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日本也出台了“日本 2020 新增长战略”。这些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认为,在这些产业和领域逼近到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可能存在新一轮发展机遇。政府应当在战略层面上予以重视,并积极采取适当的支持措施,以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进而带动经济走出低谷,步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几大主要经济体的选择来看,源自上世纪末的信息技术革命还在延续,信息化是带动产业全球复苏的主要手段和动力,电子信息产业仍然是本国或本地区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如欧洲“2020 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欧洲数字化议程”,旨在构建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2011 年 311 大地震后的日本选择把信息通讯技术作为重建日本的引擎之一。美国“回归制造业”的核心产业支撑之一也是电子信息。

2012 年 3 月,美国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推出“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该计划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等 6 个联邦政府部门,承诺将投资两亿多美元,大力推动和改善与大数据相关的收集、组织和分析工具及技术,以推进从大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中获取知识和洞见的能力。美国政府宣布投资大数据领域,是大数据从企业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战略选择的分水岭,表明大数据正式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开始受到重视,成为美国电子信息产业新一轮增长的突破口之一。

(二) 技术进步进程加快

工业革命是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和包括国家战略与政策安排在内的内生组织动力共同驱动、协同作用的结果。种种迹象表明,信息技术革命并没有结束,短暂沉寂之后,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进步显示出步伐加快、创新密集的生动局面。在新一代

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和信息技术、智能终端传感器等众多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令人瞩目的技术和应用突破。电子信息产业技术进步仍然是引领和推动整个产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力量。2012 年全球 PCT 专利申请排名前 20 位的企业中，有 14 家是 ICT 企业。目前，集成电路进入纳米时代，多核 CPU 成为竞争制高点，异构多核 SOC 平台得到广泛应用；在通信领域，泛在网、物联网、传感网正在形成新兴战略产业，LTE、LTE-Advanced、HSPA 已成为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发展的主流方向；高性能计算机取得突破性发展，云计算、普适终端加快推进，基于三网融合的数字智能终端产品开始面世。

另一方面，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表现出更加开放、协同的特点，是激发其他各行业创新的最有活力的催化剂，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与其他领域的技术交叉融合，不断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正是电子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进行融合，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的重大突破，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数字制造、网络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正在加快制造业的发展。信息网络技术与能源技术的深度融合，使分布式发电和大规模并网技术实现突破。信息网络技术与材料技术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使材料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事实上，当代多数行业的大爆炸式创新往往是由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与行业本身创新结合的产物。

（三）产业竞争方式转变

面对电子信息产业新的技术周期和商业周期，全球信息技术企业巨头们似乎都在凭借雄厚的技术基础、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力图在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的过程中，率先谋求产业发展思路的调整和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以覆盖和满足更大范围市场需求为起点，以探寻技术融合与互动新规律为依据，改变企业战略诉求和运营方式，从而引领产业竞争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甚至在改写产业游戏规则，企业必须具备新的特殊能力，拥有“富有弹性的坚定”。

1. 以“理念先行+技术落地”战略推动新模式、探索新体验、创造新理念，为技术进步可能引致的巨大潜在市场，确立先入者的领导地位。如在云计算服务与云计算解决方案提供领域，IBM“智慧地球”的战略意图寓意深远，而谷歌和亚马逊以新理念启蒙市场的战略行为同样引人注目。

2. 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系统构建”和“整合集成”上，通过融合、集成来自市场的各种技术模块和自研发关键技术，搭建系统的全面解决方案。系统构建的软件硬件技术平台和应用开发环境，软硬件技术平台封闭，立足内部实现自我扩展，应用开发环境开放，借助外部形成集成增值，苹果创造的神奇令其他企业望尘莫及。联想战略转变的当

务之急，正是如何把自己在 PC 领域的实力转化为体系化、组合化的终端竞争力。

3. 以系统的方式垂直整合关联领域，以更大化和更优化的方式释放可能为客户提供的价值。软件与硬件紧密结合已成为打破常规的趋势。2012 年软件巨擘微软宣布转型，定位为设备与服务提供商。除了游戏机、鼠标等周边外设，一直以来微软不涉足整机硬件制造，尤其是在核心业务领域。但是世道变了，在移动互联时代的移动消费终端领域，软硬件紧密结合，能够大幅度提高产品性能，创造更丰富的用户体验，来自苹果等对手的成功迫使微软重新思考软件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事实上用户需要的是系统、是体验，而非软件。这样的定律同样适用于企业级市场。甲骨文推出统一架构下的软硬一体机，效率的提升超乎寻常，其“数据库一体机”是原来“数据库+通用 IT 平台”效率的 70 倍。这样的倍增效应和体验效应是传统“先硬件后软件”、“软硬件分工”时代无法达到的。

4. 服务方式、应用方式变得日益重要，核心技术和主导产品将越来越多地依托服务来提供。价值的转换将获得巨大收益，“服务化”时代已经来临。支撑谷歌成功的背后正是其独到的服务方式。甲骨文实施 SaaS（软件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和 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全覆盖的云战略，最完整、最全面地诠释了云产品和服务。事实上，阿尔卡特、汤姆逊甩掉了自己的终端业务，标志着跨国公司开始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的转移。2010 年 IBM 营业收入（998 亿美元）较过去并未有明显的增长，但净利润则达到 154 亿美元，比转型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在 IBM 的营业收入中，56% 为高技术服务，20% 为软件收入，15% 硬件收入，其它为投资收益。惠普加快从打印成像、PC 业务转向以信息技术服务为主的平台化模式，2008 年以 139 亿美元收购了软件服务商 EDS，2009 年又用 27 亿美元收购了网络设备企业 3Com，2010 年花 12 亿美元收购了通讯终端公司 PALM，至 2011 年，惠普软件和服务业占 49%，计算与外设占 51%。传统 PC 企业戴尔的转型也具有明显的 IBM 特征，虽然 PC 仍是它的主业，但数据中心、服务软件、服务器等已成为其新的产业领域，2009 年戴尔存储与 IT 服务的利润已占总量的一半^①。

5. 培育更加强大的市场创造性和满足客户需求的独特方式，使之与产品、服务进行融合，在传统市场上形成全新进入方式，迅速改变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实现“大爆炸式颠覆”。亚马逊已经在这样的跨界竞争中，由一个业务综合体蜕变成一个可扩展、可实验的市场开发服务平台。依托于快速成熟、普遍存在的技术平台，在高频率、低成本的马拉松式试错创新实验中诞生的跨界竞争成功案例越来越多。

无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处在一个转型的窗口期，无论是企业战略诉求变动还是运

^①《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建设自主可控产业体系》，《中国电子报》2012 年 3 月 6 日。

营方式转型，一切都刚刚开始。充分把握产业变革机遇，在转型期占位或抢占先机，需要有更大胆的思路，更宽广的视野，更敏锐的洞察力，更敏捷的反应，通过建立创新趋势的研究体系和预判机制，主动思考如何超越传统规划和战略，运用大数据、移动、社交商务、云计算、物联网等科技和工具，经过大量尝试、试错积累，创造颠覆式的行业和业务创新。尤其要指出的是，广大中小企业将面对更多转型跨越的良机。

（四）市场整体缓慢复苏

电子信息产业的市场整体情况在逐步缓慢恢复。在下游需求缓慢回升的背景下，高速增长电子消费品相关产业链盈利和成长将会脱颖而出，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超级本、智能电视等新兴消费电子产品链相关投资机会将会备受关注，如触摸屏、连接器、精密器件、声电器件、高清面板、低碳 / 节能型元器件等子行业市场看好。液晶面板行业受新兴产品增长带动复苏明显。根据相关机构预测，预计 2013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8.65 亿台，同比增长 32%；平板电脑 2013 年出货 1.72 亿部，同比增长 141%，新兴产品 2013 年依然保持较快速度增长。三星发布新旗舰智能机，升级 8 核，5 寸屏和 1300 万像素摄像头，中大屏以及摄像头领域的机会被继续看好。从细分领域来看，触摸屏受益于智能设备大屏化趋势，2013 年产能或将存在缺口。LED 照明市场在经历业绩和政策的双底之后，将逐步回暖。在云计算方面，有专家预计，近 3 年云计算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 91.5%。另外，定位为工作 + 娱乐的超极本（Ultrabook），将轻薄外观与高性能、快速响应能力、高度安全性完美结合，填补了台式机 / 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之间的空白。随着 Win8 系统推出、触控功能改善、整体性能和续航时间提升、借助英特尔下一代 Haswell 处理器功耗大幅降低，以及产品价格下降，超极本出货量将在 2013 年快速增长。iSuppli 预测 2012-2015 年其出货量将从 1260 万台增长至 9635 万台，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90%，占笔记本出货量的份额从 7% 增长至 47%。此外，国际预测机构一致看好今后两年全球半导体增长前景。根据 WSTS 的预测，2013、2014 年全球半导体营业收入有望实现较快的增长，同比增速有望分别达到 4.5%、5.2%。

电子信息产业的市场特征之一是产品间的快速替代。在电子信息产业，任何一种产品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都是短暂的。如即将商业化应用的移动通信 4G，一方面意味着诞生一个巨大的替代性新市场，另一方面必将带动整个移动通信装备产业链的快速重新洗牌。

二、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稳增长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取得长足发展，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廉价的劳

动力、资源和环境，但随着产业总量不断扩大，劳动力、土地、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成本低廉程度从 2008 年第 4 位跌至 2009 年第 6 位^①。低劳动力成本、高投资增速等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既有竞争优势正日渐消退。此外，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国际市场低迷将成为常态，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的约束刚性化，导致企业的低成本优势不断衰减。按汇率、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原材料成本、库存成本、固定设备成本、税收等综合计算，我国制造成为我国出口市场受到影响，继而对国内需求带来的连锁反应。我国很难再寄望全球体系继续为自己的高增长提供稳定的需求。出口主导型的产业需要转型，但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当主要工业化国家忙于应付自己国内困境时，也给我提供了—个加快发展方式转型的机遇期。云计算、移动化、社交化、大数据和集成一体化正在成为企业信息化发展的五大热点，这些新兴领域将为企业业务转型和信息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将为我国电子信息行业注入新的增长活力。

从去年的产业运行数据来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经过两年的盘整之后开始进入缓慢回升期，盈利势头趋于好转。从终端消费品出货量来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兴消费产品实现了较快的增长。2010 年，我国云计算的市场规模为 167.31 亿元，2013 年将达 1174.12 亿元^②。云技术将逐渐成为大多数企业加快变革的核心动力，许多企业因为可见性和可控性的考虑，对云计算多种交付模式的需求会与日俱增。2013 年我国开始 4G 建设，将促进通信装备制造行业重新进入景气周期。纵观目前形势，两化融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新增长点时有涌现，新兴消费产品仍维持较快的增长，运行数据逐步好转增强了人们的信心，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与全球的产业情况—样，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

在这一转型时期，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具备稳增长的基础。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我国重点发展的 7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主要载体，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提升和支撑作用。各级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高性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关键电子元器件和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十二五”规划中的各项重点项目及工程也将逐步得以落实，—定程度上加速推动产业发展。第二，电子信息产业整体景气度回升，企业订单逐步增加，推高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使得企业对前景预期转好，从而增加资本开支，进行设备改良和工艺升级，驱动产品性能提升和成本降低，提高产品盈利能力。第三，作为市场宠儿的新产品陆续问世，通过丰厚盈利给企业输送新鲜血液。新产品问世可以带动整条产业链—起成长，积极提升性

①赵奕：《中国制造成本攀高 低廉程度全球排行跌至第六》，《第一财经日报》2010 年 2 月 9 日。

②汤浔芳：《2013 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将达 1174 亿》，《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 年 12 月 31 日。

能、优化产品，从而赢得更广泛的客户认可，最终提升客户满意度。如 LED 产业正处在产业孵化期，短期产能过剩情况将会随着需求的崛起而反转。政府政策扶植，市政工程招标释放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生存压力，确保行业健康发展，利好行业中长期发展。从价格上来看，现在单位流明的价格已然接近通用照明启动促发价格，如果价格继续下降，通用照明市场可能随即打开。第四，产业技术进步的重大突破无疑可以带来革命性的发展机会，引发产业蓬勃发展。如 AMOLED 作为下一代显示技术，凭借优良的性能优势，已经在中小尺寸方面崭露头角。未来随技术进步成熟，成本下降，中大尺寸市场也将随之爆发，从而带动显示产业革命。再如在云计算的支撑和大数据的需求下，软硬件集成一体化将会得到更多用户的认可和需要。现在的一体机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用户针对信息系统进行整合与优化，简单方便地构建云计算平台。第五，创新盈利模式开创企业未来，企业的基础创新是依托技术开发新产品撬动市场。如果能够将技术产品和工程应用结合，用一种新的盈利模式去开创国际市场，那么企业将能实现质的跨越，大幅提升企业价值。第六，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产品结构不断优化调整，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化经营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已经成为我国本土电子信息企业的主导力量，引领着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方向。第七，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我国加快战略基础设施智能化转型。建设清洁能源、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利用信息技术在水利治理、防洪减灾等领域的应用，为我国科学利用水资源提供了保障。不停车收费系统等智能交通的普及，为缓解交通拥堵做出重要贡献。信息技术在土地、森林等资源保护和气象监测等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智能电网无疑将给信息技术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与之相关的传感器、电力设备制造、网络通信、计算机、芯片、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池等产业都将被带动。

三、电子信息产业稳增长的路径和措施

（一）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稳增长的路径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应当坚定信心，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快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电子信息产业转变产业发展方式，保持稳增长的路径为：转变观念，从过去 30 年产业发展主要以规模和速度为主向提升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转变；通过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做强优势领域；技术、产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从价值链中下游向中上游渗透，形成全价值链覆盖；从以加工制造为主向硬件、软件、服务、网络有机融合转变。同时加速进口替代，通过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产品制造和推广应用，支持其他一般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电子信息企业的层面看，应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积累独特技术能力，夯实创新基础，积极参与国家重点专项，不断健全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瞄准物联网、云计算、数字家庭、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等产业新兴领域，抢占战略制高点。要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方式创新，积极参与建设设计、制造、服务融合互动机制，围绕核心价值环节促进产业链整合。产品由低端向高端、由硬件向技术服务发展，市场从单一化向多元化拓展，模式从产品、资本国际化向知识产权、品牌价值国际化转变，电子百强企业逐步取得与一流跨国公司同场竞技的资格。

（二）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稳增长的措施

1.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除数量有限的关键性产业技术由政府集中配置资源予以重点突破外，政府不再在微观层面直接从事配置产业资源的活动，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产业秩序、改善市场环境上来，通过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商业周期，使企业得以保持良好的发展信心和长远的决策预期，逐步摆脱对产业政策的过分依赖，根据自身对产业规律的把握和市场趋势的判断确定战略方向和战术对策。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产业管理体制，统一政府部门产业管理主体，从制定规划、标准、政策到指导产业发展，政出一门，实施有力，保证产业有序、可持续发展。

2. 促进产业结构有序调整。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已有明显优势和潜在优势的领域，一是通过优化各种产业要素发展环境，促成一批面向中高端市场的产业集群、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二是鼓励和支持产业组织创新，在科研和产业化方面，进一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形成一批高端技术创新联盟、产业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和制造中心；三是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建立若干重点应用示范区，快速促进电子信息新领域的市场扩散和电子信息新产品的普及应用，拉动消费与投资。

3.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首先，要确认企业在产业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企业的自主发展权、控制权、选择权；其次，企业要把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基本途径，解决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多头分散、各自为战、不容失败等问题；第三，营造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一是建立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化、模块化等共享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二是切实支持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进行技术积累，提高整体素质，在工艺稳定性、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技术及产品方面实现突破，三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建立高端研发集成平台等手段，攻克一批电子信息产业重大核心技术。

4. 提高企业的产业视野和行动力。企业要密切关注国际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新动向、新进展，着力把握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技术、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的理念，对产业规律和市场趋势的变化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对领先企业、竞争对手的战略行为保持高度的警

惕性，适时改变自己的战略诉求、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骨干大企业通过大胆试验、持续创新，攻守兼备、整合资源，确立理念、恰当转型等策略，数量众多的小企业通过机动灵活、柔性适配、积累资源、接力开发、适度跨界等策略，来适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产业和市场变化。

5.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培养、引进、用好四类人才：掌握科技前沿、能从事顶层设计的高水平技术带头人；具有战略眼光、全球视野和国际化大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经济的复合型人才；擅长于国际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建立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科研人才专家库，建立健全电子信息产业科技人才激励机制，优化创新人才成长环境，建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电子信息产业科技人才选聘机制。以电子信息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产业基地等为依托，通过互派访问学者、博士后联合培养、项目团队合作等方式，引进和培养能够承担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重大项目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

6. 推进自主标准和品牌战略。按照“国际标准和自主知识产权标准相结合”的原则，优先研究和制订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标准和安全标准，初步建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业标准体系。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参与国际各方面标准的制订，为推进电子信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奠定基础。在品牌战略带动下，企业应将产品质量视为发展的根本，加大生产监督力度，从源头抓质量，才能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意识。

参考文献：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012年电子产业统计公报》2013年2月5日。
2. 李佳师：《用新思路做软件》，《中国电子报》2013年5月14日。
3. 潘少海：《企业信息化呈现五大热点》，《中国电子报》2013年5月14日。
4. 成卓：《低水平产能盲目扩张 新兴产业亟待有序发展》，《中国电子报》2013年3月5日。

责任编辑：李蕊

中国流通现代化发展现状、 思路及政策建议*

周凌云 顾为东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流通业得到长足发展，在引导生产，扩大消费，增加就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发达国家流通业相比，我国流通业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存在流通业集中化程度低，流通效率较低，流通成本高，流通主体竞争力不强，业态发展不够均衡等问题。面对流通业国际化竞争新格局，我国流通产业必须在新形势下做出战略性的调整，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逐步提升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流通业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流通现代化 问题 发展战略 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周凌云，江苏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博士后；
顾为东，江苏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流通需求急剧增长，流通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更加凸显，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柱性产业。发展现代流通业，对于促进生产、开拓市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当前，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2-2013 年度基金课题“加快流通领域现代化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我国流通业发展处在成长阶段，与流通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发展水平较低，尚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要求。纵观美、日等发达国家流通业现代化发展历程，其发展模式、变革调整措施及政策等有许多具有借鉴与启发意义。本文在分析发达国家流通产业发展总体特点及经验基础上，根据我国流通业发展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流通业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思路及政策建议。

一、发达国家流通现代化发展特点及政策取向

（一）居民平均消费率高，流通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

在消费需求的拉动下，发达国家流通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交易规模持续扩大。有数据显示，世界居民消费率均值 70%，发达国家居民平均消费率在 80% 左右，其中美国多年来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一般为 20% 和 80%。发达国家强大消费有力促进流通业快速发展，使其较早确立了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地位。特别是内贸消费需求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当前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流通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较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 20% 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为 15%-20%。

（二）流通业集中度高，流通企业全球化扩张迅速

随着流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流通业集中度应该是随之不断提高。以零售业为例，欧美发达国家零售业的零散度为 40% 左右，日本为 50%。从连锁经营所占比重看，欧美发达国家商业流通业已进入连锁经营时代，目前连锁经营销售额约占全部销售额 60% 以上，美国已达 80%。欧美大型流通大多通过参股、控股乃至收购等资源整合手段，以资本为纽带，把大量上游供应商、中小服务企业纳入自己的协作范围，以一个大公司为核心，组建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形成以流通企业为主导的稳定供应链，进而迅速在全球范围拓展销售网点，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的大流通企业集团，如沃尔玛、家乐福、好市多、大润发、麦德龙、TESCO 乐购等流通企业迅速扩张，许多进入了世界 500 强企业的前列。

（三）流通速度和效率高，社会物流成本较低

由于流通网络健全，流通渠道畅通，技术装备先进，使得发达国家流通速度较快，流通效率较高，流通成本较低。2012 年，美国、德国、日本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库存占当年销售额的 1.14%-1.29%；发达国家年商业流动资本周转次数为 15-18 次；年物流总成本占 GDP 的比率为 10% 左右，其中日本是 11%，美国 8%，欧盟只有 7%。

（四）注重流通业态创新，推广现代流通方式

连锁经营、电子商务、跨国经营、统一配送等是发达国家流通企业经营创新的主要内容。在连锁经营方面，国外流通企业大多采用连锁方式来拓展经营网络，扩大企业规模。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商业流通业已进入连锁经营时代，连锁经营销售额约占全部销售额 60% 以上，美国已达 80%，位列世界前 20 名的零售企业也全部是连锁企业。在电子商务发展方面，其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方式、新的流通渠道和流通组织，在发达国家得到迅速推广，已经延伸到多个经济领域。其中，美国是世界最早发展电子商务的国家，同时也是电子商务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一直引领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全球电子商务的成熟发达地区；欧盟电子商务的发展起步较美国晚，但发展速度快，成为全球电子商务较为领先的地区。在现代物流方面，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第三方物流，储、运输和配送等环节已经成为各国物流外包的重点。在欧洲，第三方物流所占市场份额，德国为 23%，法国为 27%，英国为 34%。

（五）改革创新流通体制，推动流通管理合理化

通过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有力地推动了发达国家“流通革命”，优化了流通管理体系。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在传统流通业向现代流通业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相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流通产业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只作必要的干预，干预主要是在“市场失灵”时采取；德国、瑞典、瑞士等部分欧洲国家流通产业的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模式，既严格遵守市场经济竞争原则，保护市场机制，又重视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日本等亚太地区新兴工业国家流通业发展实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即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国家通过产业政策、计划调节、行政指导等手段对流通资源配置方式、决策结构与过程乃至流通产业运行方向等进行较强程度干预。

（六）高度重视立法，流通法律体系比较健全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流通立法，有关流通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健全，既有针对所有产业与企业进行竞争规制的法律，也有针对流通产业、中小企业的专项法律，这些法律法规对发达国家流通业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如日本制定了《百货店法》、《大店法》、《大型店铺选址法》，《商调法》、《中小零售商业振兴法》、《仓储法》、《禁止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以保护和促进流通业发展；韩国制定了《流通产业发展法》、《中小企业结构调整与搞活零售市场的特别措施法》等法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支持流通业发展的财政税收制度；美国是最早制定竞争法、实行竞争政策的国家，制定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公平贸易法》、《小企业法》，《小企业经

济政策法》、《小企业技术创新开发法》等法律法规，对流通产业自由竞争起到决定作用。

二、我国流通现代化发展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

经过建国以来 60 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改革和调整，我国流通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发展道路。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及流通领域改革的深化，我国流通业呈现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流通主体多元化、经营业态多样化、技术和品牌升级化、现代流通方式普及化的趋势特点。然而相比发达国家流通业的发展，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传统经营方式和业态占主导地位，流通产业分布较为分散，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明显低，流通技术和管理手段较为落后，这些严重制约了生产、消费及整个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居民消费率低，总体消费需求不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和流通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消费决定流通，流通带动消费。在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消费在稳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尤其重要。从内外部条件变化来看，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将成为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和根本着力点。2012 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7167 亿元，对整个经济的贡献为 51.8%。消费规模仍然居世界第三，比上年名义增长 14.3%，发展速度非常快。但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低、消费能力弱的特点明显，消费率多数年份徘徊在 60%左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远低于世界水平，还不到美国同期水平的 1/7。

（二）流通渠道衔接不畅，流通效率低下

当前，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滞后，流通基础设施网络布局不尽合理，流通业发展进程不平衡。加之政策歧视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内外部市场分割、地区分割、部门市场分割、城乡分割、行业垄断等现象严重，流通资源未能有效整合，流通渠道衔接不畅，严重制约城乡间工业品、农产品有效流通的主要“瓶颈”。流通渠道不畅，使得流通环节增多，流通效率低下，流通成本较高。从资金周转情况来看，近几年我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流动资产的年周转次数是 3 次，发达国家流通资金年周转可达 10-15 次，而日本非制造企业，包括批发业、零售业，流动资产的年周转次数是 15-18 次。从货物损耗来看，商品损耗率较高，特别是农副产品在采摘、运输、储存等物流环节上的损失率在 25%-30%，最高的果蔬类已经达到 30%，最低的肉类也有 12%。从物流成本来看，2012 年我国

物流总成本占当年 GDP 比重为 18%，一直居高不下。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国情，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的流通体系、网络建设还滞后。

（三）流通技术装备落后，流通信息化水平较低

我国流通体系中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水平与发展现代农业、商业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我国冷链物流发展滞后，尚处于起步阶段，预冷、分级、包装、运输等重点流通环节及产地批发市场等重点流通节点的基础设施与装备落后，“农超对接”、“农社对接”、电子商务等新兴流通业态的配套设施装备有待完善。此外，我国流通业信息化投入不足，现代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目前，我国流通企业用于信息技术和装备方面的投资仅占总资产的 0.3%，仍有超过 38% 的流通企业未实现信息化，具备行业信息管理系统的企业数量只占到 21%。

（四）流通结构性矛盾突出，业态发展不均衡

我国流通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结构性矛盾突出。首先，市场网络体系布局不尽合理。一些地区的大型商业网点建设结构失衡、比例失调、功能雷同的同时，现代批发交易中心、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和仓储建设等发展缓慢。其次，零售业态发展不均衡。百货业、超市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快于连锁、专卖、特许加盟等流通形式，生产厂商选择产品供货形式单一，造成目前大卖场和供货商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第三，业态发展不协调。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国外引进的超市、折扣店、大卖场等新型业态主要集中在少数行业和东部沿海大中城市，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远期交易、期货交易、代理经营、信用交易、网上交易、租赁经营，以及多种现代流通科技发展还很不够。第四，现代物流起步晚、水平低。第三方物流发展缓慢，物流业集中度低，功能单一，散、小、差现象严重，多式联运水平低，物流效率不高。目前，我国的第三方物流在物流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仅为 10%，还没有太多大型专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五）流通产业集中度低，组织化程度不高

我国流通业组织结构不合理，流通产业集中度低，组织化程度不高，呈现小、散、乱、弱的状态。以零售业为例，我国零售业的零散度高达 90%，而欧美国家只有 40% 左右，日本为 50%。特别是美国百强企业零售额占全美零售总额的比重一直稳定在 40% 左右，韩国三大百货企业的销售额占全韩百货销售总量的 80% 左右，而我国排名前五的百货企业的销售额合计仅占行业销售总额的 6%。我国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零售额仅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 17%，连锁经营和集中配送比例较低，网络扩张速度进展较慢。此外，流通企业之间关联性差，组织结构松散，也影响了流通产业集中度的提升。

（六）流通主体竞争力不强，综合竞争力不强

流通企业缺乏特色和合理的分工，“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普遍存在，制造、批发、零售、物流企业各自为阵，很难走向联合。在我国商贸流通行业中，中小型经营主体的数量比重超过 99.99%，这其中包括了中型、小型和微型三类法人企业，也包括了几千万属于自然人的个体商户。我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2012 我国连锁百强”榜单显示，苏宁云商以 1240 亿元的销售规模位居我国连锁百强榜首，百联集团、国美电器、华润万家分别以 1220 亿元、1175 亿元、941 亿元的销售业绩排名第二至第四位，尚没有一家企业能够进入世界 500 强的行列。2012 年美国零售业排行榜第一的沃尔玛集团销售额为 4661 亿美元，而我国排名第一为苏宁云商集团，年销售额为仅占沃尔玛年销售额的 4.34%。

此外，商业自有品牌的比重甚低，也影响了流通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培育。我国本土零售企业拥有商业自有品牌的比重过低，平均不超过全部销售额的 2%，大型零售企业平均不超过 5%，而发达国家的零售企业无论是百货店还是超市商业自有品牌商品占销售额的平均比重约为 30%-40%，其中沃尔玛达到 40%，TESCO 乐购达到 50%，美国西尔斯甚至高达 70%。

（七）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中高级专业人才缺乏

我国传统的流通业完全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现代流通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偏低，严重制约商贸流通业人才的成长，与流通现代化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具体表现为：流通业从业人员整体学历层次偏低，业务水平及技术熟练程度不高；流通人才结构不合理，中高级管理人员与技术骨干人员匮乏，掌握现代流通理论、技术、业务及管理的职业经理人缺乏；流通企业人才培养培训相对滞后，职业资格认证模式尚未得到普及；学历教育地区发展不平衡，学历教育培养方式与实践结合不够。这些制约了流通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影响了流通现代化进程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滞后，不适应流通业发展需要

近年来，我国流通领域法规和标准建设得到加强，先后出台《反垄断法》、《拍卖法》、《直销管理条例》、《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等 44 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累计发布国家标准 209 项、行业标准 591 项，标准实施力度加大，应用水平提高。这些法律法规和行政性规章规范了市场主体的行为和市场秩序，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流通现代化进程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缺乏对流通业重要性和战略意义的充分理解和认识，缺乏对流通业国内外竞争激烈程度的认真思考和应有重视，造成了我国流通业立法滞后的现实。

由于很多方面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如没有《流通产业发展法》、《流通竞争法》、《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法》、《电子商务法》、《大店法》以及流通业行业协会管理条例、商业网点管理条例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流通现代化发展和流通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当前流通领域秩序混乱的原因之一。此外,已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使其可操作性大大降低,不利于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效力。

三、推进我国流通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思路

(一) 总体思路

以提升流通业国际竞争力、打造流通强国为目标,以转变流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一体化推进、信息化提升、资本化扩张、网络化运作、国际化拓展、低碳化转型为路径,大力推广现代流通方式,集中力量提升流通渠道网络和品牌形象,构筑切合我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流通体系,加速提升流通业发展的质量、能级和品位,大幅提升流通业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1. 全面发展、突出重点。以扩大就业、满足生产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为流通产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造提升传统流通业,大力发展现代流通业,重点发展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新兴业态。

2.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顺应市场需求变化,坚持内外贸结合、双轮驱动,深入推进流通领域改革。稳步推进流通业对外开放,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在全球获取流通业发展资源的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

3. 转型升级、优化结构。从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快推进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整体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全面提升流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发挥流通产业对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4. 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科学规划流通业发展布局,加强与其他规划的配套,优化流通业空间布局,打造城乡协调发展、设施完善、业态多元、市场繁荣的现代化流通体系,促进城乡流通一体化发展格局形成。结合城市发展功能布局和地方经济发展特点,推动各具特色的流通业集聚集约发展,强化产业链配套协作与专业分工。

5. 创新驱动、提升效率。围绕商业模式、技术手段和服务理念创新,加快推行新型流通业态,大力发展新商业组织形态,努力抢占流通业发展制高点。大力拓展现代流通渠道和方式,切实提高流通规模和效率,有效降低流通成本。

(二) 发展战略

1. “创新驱动”战略。引导流通产业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和

商业模式创新，逐步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大全社会对商业研发投入，加快流通领域中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努力抢占流通业发展制高点。

2. “双向开放”战略。在更高水平上引进来、走出去，促进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培育扶持一批商贸流通企业跨区域发展，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国际化道路。

3. “品牌带动”战略。塑造品牌形象，建设一批辐射国内外的专业商品交易市场和电子商务平台，扶持和培育一批国内领先的知名流通企业，形成流通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持久的优势。

4. “产业联动”战略。充分发挥流通引导生产、促进消费的作用，强化流通嵌入制造环节，强化流通业与制造业、房地产业、农业、旅游、金融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联动效应，实现流通业与相关产业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5. “制度创新”战略。继续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监管法规规章，推行在线监管、溯源监管、信用监管等现代监管模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和管理规范准则，以制度创新不断引导流通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

四、加快推进我国流通现代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流通产业仍处于发展成长阶段，流通体系尚不完善，整体落后于经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我国流通产业发展面临多重困难，但在新经济成长阶段下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流通业现代化发展经验，在大国经济和大国流通新背景下制定流通业现代化发展规划，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转变流通业发展方式，推动流通业转型升级与现代化进程，提升流通效率，增强流通业国际竞争力。

（一）加快流通领域体制改革是推进流通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朝着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迈进，我国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流通体制改革也朝着大流通、大市场、大贸易的方向发展，开放型现代流通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与 WTO 接轨的流通管理体制已见雏形。今后一段时期，要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采取新思路、新举措，实现流通体制改革和流通企业改革的新突破。要建立分工明确、权责统一、协调高效的流通管理组织架构，改变原有的纵向化、条块分割、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促进内外贸一体化。要进一步健全经贸、工商、卫生、计量、公安、农业、质监、环保、物价、城市执法等部门协作机制，强化政策制定、执行与监督相互衔接，提高管理效能。

（二）加强现代流通网络建设是推进流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构建方式先进、层次清晰、组织化程度较高、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流通网

络，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的现代商品市场体系，是实现流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要进一步整合城乡社会商业网络，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生产资料现代流通体系、工业消费品流通体系、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建设；要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和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依托交通枢纽、生产基地、中心城市和大型商品集散地，统筹规划全国骨干流通网络，建成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商贸中心、专业市场以及全国性和区域性配送中心，同时要注重对现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重新配置，防止重复建设，进而形成流通体系的“成本收敛－流量扩张”效应；要继续鼓励流通网络向农村拓展，形成省、市、县（区）、乡（镇）多层次，国内外市场相互贯通的现代流通网络格局；要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积极搭建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推进“一网多用”，推动不同行业、地区、领域的流通渠道对接，发展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

（三）调整优化流通产业结构是推进流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流通产业结构是随着生产、消费、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流通领域的变化反映着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流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推动着生产、消费、技术与社会经济的演变。经济持续高增长、收入水平提高、城市化推进、人民币升值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居民对未来预期看好，成为支撑我国流通业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流通产业“多渠道、多业态”已形成，但尚处于小型化、分散化的阶段，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推进整合与创新。主要措施有：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强消费引导，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在农村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推动交易方式、服务功能、管理制度、经营技术的创新，开拓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合理、有序推动城市化，提升居民收入，增强居民购买力，扩大城市消费，进一步提高城市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发展新型消费模式，降低消费成本，从而拉动消费需求，实现消费促进和空间扩大；鼓励便利店、折扣商店、超市、大型超市、货仓式商店、仓储会员店、百货店、专业店、专卖店、自动售货、直销、邮购商店以及网络商店等业态创新发展，满足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发展商业“大渠道”，引导小零售、小批发、小集市、封闭型、传统式向大连锁超市、大配送、大市场、开放型、现代式转变，从而实现流通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适应现代化、国际化大生产、大流通的形势要求；要从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视角制定商业网点布局战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广域化的商业网点，从而在更广空间、更深层次上促进消费。

（四）实施现代流通方式是推进流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流通方式反映了促使生产转化为消费的流通行为的基本方式，与所在社会的经济、

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复杂的关系。现代流通方式直接影响着流通效率，是实现流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目前，国外的现代流通方式归结起来主要有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等类型。我国要加强现代流通理论、流通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研究与运用，推动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提高流通现代化水平，实现流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重点推进连锁经营，在搞好日用品、食品零售和餐饮连锁经营的同时，加快向生产资料、文化用品和家政服务等行业拓展；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统筹推进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建设，推进商贸流通领域电子商务创新发展，支持外贸电子商务、农产品电子商务、社区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企业对企业（B2B）、企业对消费者（B2C）、传统企业网络直销（M2C）、商贸和外贸企业线上线下一体化（O2O）协调发展；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以“完善网络，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提升能力、联动发展、节能环保、惠及民生”为着力点，以体制机制和政策优化为保障，推进企业物流社会化改造与运作，提升第三方物流市场份额，实现物流业由大变强的根本性转变；积极推广并优化供应链管理，鼓励流通企业拓展设计、展示、配送、分销、回收等业务。

（五）培养流通主体是推进流通现代化的微观基础

流通产业要振兴、要实现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打造微观基础，实现功能升级、产业集群转型与新型产业组织生成。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扶持流通企业发展的经验，促进流通产业重组与融合、培育流通大集团与世界级企业生成，激发微观“流通细胞”的活力。重点要打破行政区域、行业、部门和所有制限制，以资本为纽带，实行流通领域资源重组，支持有实力的流通企业兼并重组，提升流通主体业态创新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流通主体的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程度，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大型制造商、大批发商和大零售商；鼓励扶持中小流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健全中小流通企业服务体系，扶持发展一批专业服务机构；鼓励流通企业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开展包括资本合作、品牌共享、技术交流、管理创新、网络互通等灵活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六）大力培养流通人才是推进流通现代化的必要支撑

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现代流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现代流通人才缺乏，尤其是中高级现代流通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一大瓶颈。应加强现代流通业各类人才培养、培训，把流通专业人才的培养作为我国流通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来抓。通过完善高等院校、社会职业教育、企业培训等多层次的流通人才培育体系，建立一支具备现代流通理念和国际视野、熟悉现代流通规则、精通现代流通管理和掌握现代流通技术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发挥各类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运用行规

行约等富有特色的方式,开展商贸职业经理、连锁经营、贸易、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服务、会展、相关信息业等方面的流通人才的培训,全面推行流通业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提高流通行业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与职业道德水准。

(七) 完善流通法律法规与产业政策是推进流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我国流通领域很多方面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流通现代化发展和流通业竞争力的提升。结合我国国情,加快推动我国流通立法,尽快完善规范流通活动、市场秩序、市场行为、市场调控和管理等法律法规,逐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流通法律体系。如制定《流通产业发展法》、《流通竞争法》、《电子商务法》、《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法》、《大店法》以及流通业行业协会管理条例、商业网点管理条例等,保护市场竞争,抑制垄断和图谋垄断、对贸易的非法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了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健康发展,要进一步完善流通产业政策,在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完善市场竞争规则、规范企业竞争行为、鼓励企业资产重组、培育流通主体、推行现代流通技术应用、减少流通企业税收负担以及鼓励引进各种新型流通方式、流通业态、先进管理经验、资本等方面出台具体方案和实施细则。

参考文献:

1. 张志刚:《加快推进我国流通现代化》,《中国商贸》2010年第7期。
2. 陈文玲:《现代流通与内外贸一体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3. 孙敬水、章迪平:《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国际经验及启示》,《中国流通经济》2010年第4期。
4. 尹虹:《发达国家发展流通业的经验及启示》,《中国商贸》2007年第10期。
5. 刘天祥:《发达国家推进流通现代化的特点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江苏商论》2005年第3期。
6. 闫星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角下的流通创新》,《产业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7. 荆林波、王雪峰:《我国流通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2期。
8. 祝合良、李晓慧:《扩大内需与我国流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12期。

责任编辑:晨 乔

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选择与效率研究^{*}

方 虹 姚 鹏 方 惠 何 琦

摘要：环保产业上升为国家重点培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后，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然而，由于投资周期长、收效慢、科技含量、环境要求高等特点，环保产业的投融资问题成为产业发展和企业成长的瓶颈问题。本文对我国目前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进行了讨论，通过对其模式选择与效率问题的分析研究，以期建立开放完善的投融资体系，解决环保产业资金总量问题。

关键词：环保产业 投融资模式

作者简介：方 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 惠，中国地质大学人文经管学院教师；

姚 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

何 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

进入 21 世纪，全球环保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逐渐成为支撑产业经济效益增长的重要力量，并正在成为许多国家革新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目标和关键。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环保产业成为全球环保市场的主要力量，并建立了完善的环保产业体系。与美国、日本相比，我国的环保产业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是，随

^{*} 本文是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007，71273022，71241028）、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AAA12007）、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GB061）的研究成果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投资越来越多，近日国家发改委批复 10 个环保投资项目，由于产业投融资机制不健全，发展资金短缺，产业发展显现出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状态。因此，寻求建立高效完善的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是解决我国环保产业现实之困的有效切入点，也是保障“十二五”时期环保产业快速良好发展的必备要件。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对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各类投融资模式的融资效率，以期寻求建立高效完善的环保产业投融资体系，解决我国环保产业发展资金短缺问题。

一、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现状透视

“十五”、“十一五”时期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成绩斐然，国家已经将环保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时期环保产业也将继续保持良好发展的势头。同时，我国环保产业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产业投融资体系不完善和投融资效率低是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1. 环保产业发展迅速。得益于产业投融资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国家及各级政府投资力度的增加，近年来我国环保产业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见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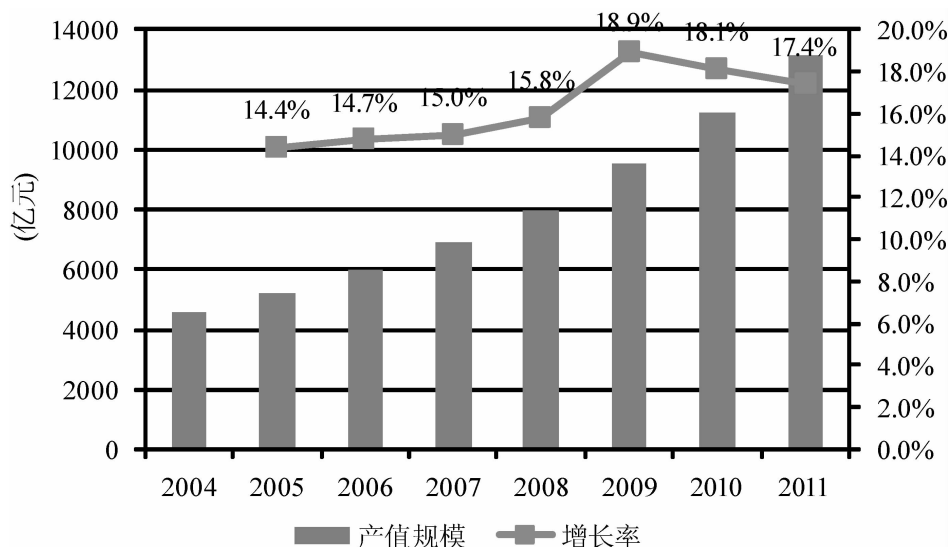


图 1 2004-2011 年中国环保产业产值规模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与并购战略研究》（2012）。

2004-2011 年，我国环保产业年均增长率达到 16.3%，产业规模迅速扩大。2010 年环保产业产值较上年增长 18.1%，产业规模首次突破 1 万亿元，2011 年产值规模达到 13170

亿元，较上年增长 17.4%，是 2004 年的 2.9 倍。“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黄金期，环保产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会改变，预计增长率将保持在 15%-20%之间。

2. 产业投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环保产业起始于“七五”时期，此后环保产业投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也持续增加。“十五”时期以来，环保产业年投资增长率都在 15% 以上；“十一五”时期环保产业投资总额为 1.375 万亿，较“十五”时期增加 96.4%；“十二五”时期环保产业投资额将达到 3.4 万亿，较“十一五”时期投资额增加一倍多，占 GDP 比重为 1.5%（见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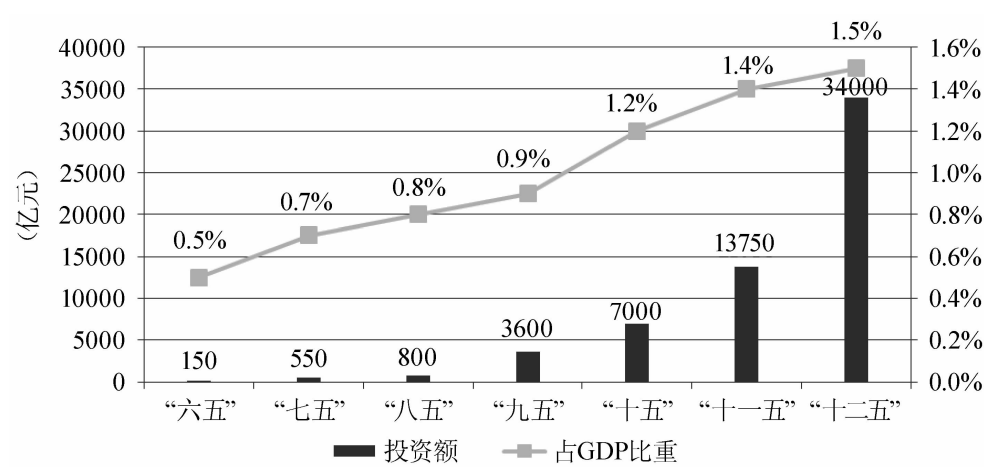


图 2 “六五”至“十二五”时期中国环保产业投资额及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与并购战略研究》（2012）。

3. 地区差异性明显。我国环保产业初步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沿海发展带”和四川、重庆、湖南等省份为轴线的“沿江发展带”，西北地区发展相当滞缓，呈现东——中——西阶梯发展形态，地区差异性明显（见图 3 所示）。其中，长三角地区环保产业发展最为良好，产业集群程度最高，现已初步形成了以宜兴、常州、苏州、南京、上海等为核心城市的产业集群。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技术禀赋优势突出，北京、天津是环保科技产业基地，山东、辽宁在环保装备、资源利用方面的优势明显。四川、重庆、湖北等沿江省份环保产业发展空间广阔，是“十二五”时期产业发展的主战场。

4. 环保产业投融资发展进入黄金期。“十二五”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保产业支持政策，从产业定位、发展规划、支持办法等方面引导环保产业快速良好发展，为产业投融资机制的完善和投融资效率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性环境（见表 1 所示）。

“十五”、“十一五”时期我国环保企业股权融资成果显著，股权融资渠道有 VC/PE、战略投资、IPO 三种方式。2001-2011 年，共有 37 家企业通过 VC/PE 和战略投资方式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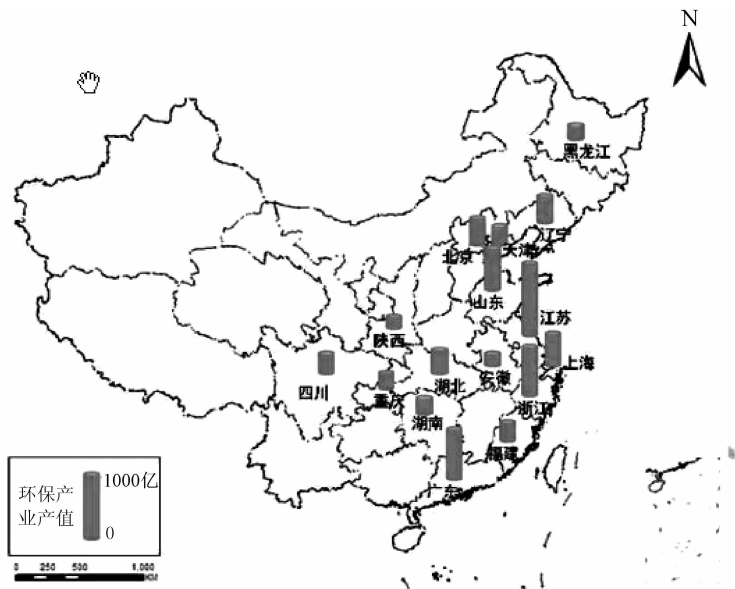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环保产业产值分布

表 1 “十二五”时期中国环保产业相关支持政策

部门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明确提出将节能环保产业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予以重点培育发展。
环保部	《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污水厂应对污泥(含初沉污泥、剩余污泥和混合污泥)承担处理责任。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废弃物监管工作的意见》	到 2015 年,摸清全国重点危险废弃物产生单位以及利用、处置单位情况,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产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达到 90%;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达到 95%;大、中城市医疗废物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
	《关于环保系统进一步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十二五”期间,要将污水处理厂脱氨除磷等升级改造和中小城镇污水处理,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重金属污染防治,大型城市垃圾焚烧处理,污染场地与生态修复,环境监测与预警等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着重发展环境服务总包、专业化运营服务、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等环境服务业。
住建部等 15 部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	2015 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 80%以上;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达到 30%,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达到 50%;进一步加强餐饮业和单位餐厨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建立餐厨垃圾排放登记制度。
发改委 财政部	《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按新增总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核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并下拨 50%作为启动资金。地方政府若在 5 年内达到设定目标 90%以上,提出考核和余款拨付申请。若考核合格,财政部、发改委拨付剩余资金,不合格则停止拨付并收回已拨付的 80%;3 年内无实质进展的,将已拨付部分扣回。

资料来源：根据出台的政策文件整理。

行融资，其中，VC/PE 为 41 例，战略投资为 5 例，融资金额总计为 7.17 亿美元。2000-2011 年，环保企业 IPO 总计 38 例，上市地点包括内地（24 例）、香港（6 例）、美国（4 例）、新加坡（2 例）、英国（1 例）、日本（1 例），融资总额为 338.9 亿元人民币（见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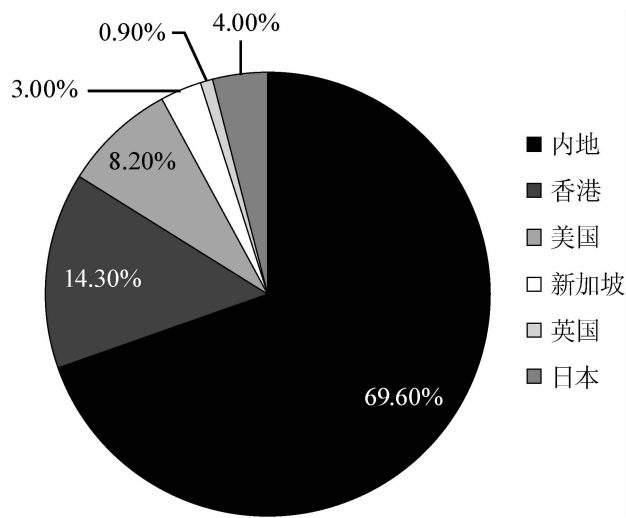


图 4 2000-2011 年环保企业 IPO 金额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与并购战略研究》（2012）。

近年来各类环保产业基金相继建立，这些环保产业基金按资本构成可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或国有企业为主体出资成立的环保产业基金；二是社会产业资本为主体出资成立的环保产业基金。国家支持社保基金和各类保险资金投资环保产业基金，鼓励外资以环保产业基金的形式投资环保产业，各地政府或国有企业发起成立的环保基金还包括 PE、VC 以及一些信托资金等。环保产业基金投融资模式的形成以及资本构成的多元化，增强了环保产业投资资金供给的额度，创建了环保企业投融资新平台，提高了融资效率。

表 2 近年中国成立的主要环保产业基金

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资金规模	投资方向
宜兴中科环保产业基金	2012 年 2 月	50 亿元	环保产业领域优质项目
中日节能环保投资基金	2011 年 12 月	10 亿元	为节能环保相关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绿色环保产业基金	2011 年 11 月	10 亿元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绿色地产、绿色金融、污染防治等
中能绿色基金	2011 年 7 月	20 亿元	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环境保护
建银城投环保基金	2010 年 7 月	200 亿元	节能减排项目
广东绿色产业投资基金	2010 年 2 月	50 亿元	环保项目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与并购战略研究》（2012）。

5. 投融资体系不完善和投融资效率低是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我国环保产业发展中资金短缺是造成产业发展滞缓的主因，现有的投融资体系存在诸多缺陷。首先，投融资渠道依然狭窄，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环保产业起步较晚，90% 以上企业是中小企业，企业发展地域性特点明显，与国外环保企业相比，无论在资金规模、业务规模还是技术上均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足够的资金储备是我国环保企业拓展规模、提升技术的前提条件。但是，现有投融资模式所构建的产业融资渠道依然狭窄，不能有效解决中小环保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一是财政转移支付投融资模式侧重于市场参与不足或未参与的环保领域，对于中小环保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二是银行贷款、债券与股权融资、国际融资、环保产业基金等投融资模式，对环保企业经营规模、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投资项目等要求很高，限制了中小环保企业筹集资金的可行性。

其次，财政金融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效率低下。我国财政金融体制建设相对滞后，财政与金融两大融资体制不能有机融合和有效对接，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不能顺利进入环保产业领域，环保企业对财政拨款和银行信贷资金依赖过高，直接融资比重太小，间接融资中又以银行贷款所占比重最大，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效率低下。第三，环保企业融资环境差，投资吸引能力不强。中小企业是我国环保企业的主体，这类企业普遍缺少能够进行贷款的抵押品；同时我国财政与金融体系没有为中小环保企业建立抵押贷款担保机制，导致环保企业融资环境差，企业吸引投资的能力不强。

二、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评析

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渠道相较初始发展阶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初始发展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贷款为主的投融资模式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迄今为止，除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贷款之外运用比较成熟的投融资模式还包括 BOT 融资模式、股权与债券融资模式、环保基金融资模式、国际融资模式、ABS 融资模式等。多元化投融资模式的形成，增强了地方政府及环保企业获取资金的可行性，为环保产业的良好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撑（见表 3 所示）。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初期，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贷款，资金主要运用于重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现今这两种投融资模式的融资额度占环保产业融资总额的权重已有所下降，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投资于市场参与不足或未参与的领域如生态保护、重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开发等，银行贷款已经基本脱离了政策性投融资范式，形成了市场化运作模式。环保企业债券与股权融资和环保产业基金投融资在“十五”、“十一五”时期发展迅速，投融资模式成熟，涵盖面广泛，涉及新能源、新材料、节能减排、技术开发、设备制造、工程建设、污染防治、技术咨询及服务等领域。BOT、TOT、ABS 模

表 3 我国环保产业主要的投融资模式

投融资模式	投融资过程	模式评析	典型事例
财政转移支付	国家财政直接投资建设环保项目或以补贴、税收减免等形式鼓励企业投资环保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是税收收入、国债、环保税、排污费等。	财政转移支付是我国重大环保项目融资的重要来源，模式成熟。不足之处是投资面窄，投资力度受财政收支的制约。	2008 年浙江省为保护境内八大水系干流，提出“谁保护，谁得益”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银行贷款	企业以贷款的形式从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获得环保项目投资资金。	银行贷款是企业获得环保项目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运用广泛，模式成熟。由于环保项目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银行对环保项目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2006 年国家开发银行向武汉都市环保公司承建的秸秆发电厂、天澄环保公司的过滤膜开发技术、华丽环保公司的可塑淀粉生物降解材料项目提供贷款。
股权、债权	企业通过资市场发行股票、债券募集发展资金。	股权与债券投融资模具有低融资成本，分散投资风险的优点。不足之处是股权、债券融资对企业规模、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投资项目等方面的要求很高。	2001-2011 年，我国共有 37 家环保企业总计 46 次获得股权融资。2000-2011 年，我国环保企业 IPO 数量为 24 家，实现融资 235.8 亿元。
国际融资	政府或企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筹集环保项目投资资金，融资方式有国际债券融资、国际股票融资、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国际项目融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等。	国际融资具有降低融资成本，分散投资风险，拓展融资渠道的优点。不足之处是国际融资对投资项目、企业规模、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投资项目等方面的要求很高。	2008 年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附属公司 Mid American 总计 18 亿港币的认股投资。
环保产业基金	环保产业基金投资主体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基金以贷款、风险投资、认购企业股票及债券等方式向企业提供发展资金。	环保产业基金具有投资额度大，投资风险低，模式成熟等优点。不足之处是环保产业基金对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率等方面要求很高。	2010 年广东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建立，其由政府 5000 万元引导基金和 49.5 亿元社会资金共同组成。基金的投资方向主要是运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节能减排项目投资。

续表

投融资模式	投融资过程	模式评析	典型事例
BOT 模式	投资环保项目的企业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拥有融资、建设和经营某一项目的专营权,企业或个人在收回项目投资成本,并在获得一定投资收益后将项目的所有权转让给政府或其指定的机构。BOT 模式运行过程可分为特许、建设、运营和移交四个阶段。	BOT 模式有利于分散和转移项目风险、减少政府财政负担,投融资模式成熟,广泛运用于大型环保设施建设。不足之处是 BOT 模式在运营的各个阶段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较高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竞争性风险、工程建设风险、运营维护风险和环境风险。	2005 年重庆同兴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建成投产,该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以 BOT 模式运作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TOT 模式	TOT 投融资模式指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将建设好的项目的一定期限的产权或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投资人,由其进行运营管理。投资人在约定的期限内通过经营收回全部投资并得到合理的回报,双方合约期满之后,投资人再将该项目交还政府部门或原企业的一种融资方式。	TOT 模式优点有:融资风险低、成功率高、降低财政负担、吸引社会资本注等。TOT 模式缺点有:项目建设初期资金负担重、转让存在资产价值流失风险、存在委托代理风险。	2003 年深圳市龙岗区横岗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该项目采用 TOT 模式运作,项目签定的合同转让价格为 1.2 亿元,企业特许经营权年限为 20 年,投资回报率为 9.08%。
ABS 模式	ABS 模式是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即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	ABS 模式具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的优点。不足之处是 ABS 模式要求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收益率,项目信用评级需达到 3A 级,融资程序复杂。	1997 年恒源电厂有限公司采用 ABS 融资模式通过在美国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式是三类重要的项目融资模式,国内外运用经验丰富,模式成熟,实用性强,依然是我国环保产业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

三、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选择

环保产业具有投资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收效慢、技术要求高、产业向高端化方向

发展的特点，因而资金供给与需求能否良好衔接就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灵活、合理运用环保产业各类投融资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具体涉及到环保产业不同发展时期投融资模式的选择、各类投融资模式投资方向的选择两个方面。

1. 环保产业不同发展时期投融资模式的选择。中美两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的选择是不同的。从美国环保产业投融资发展历史来看，环保产业投融资选择具有时期的变迁性（见图 5 所示）。美国环保产业发展初期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市政债券是产业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比如在污水处理方面，美国建立了“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1987-2001 年，这个基金共向 10900 个清洁水项目提供了 343 亿美元低息贷款。环保产业发展中期，美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实现了向市场融资的转变，企业自筹、公私合营、排污许可证交易、BOT、TOT、环保基金、股权与债券等投融资模式相继发展起来。依托发达的金融与资本市场，美国现已建立了多元化、高效性、政府与市场有效结合的环保产业投融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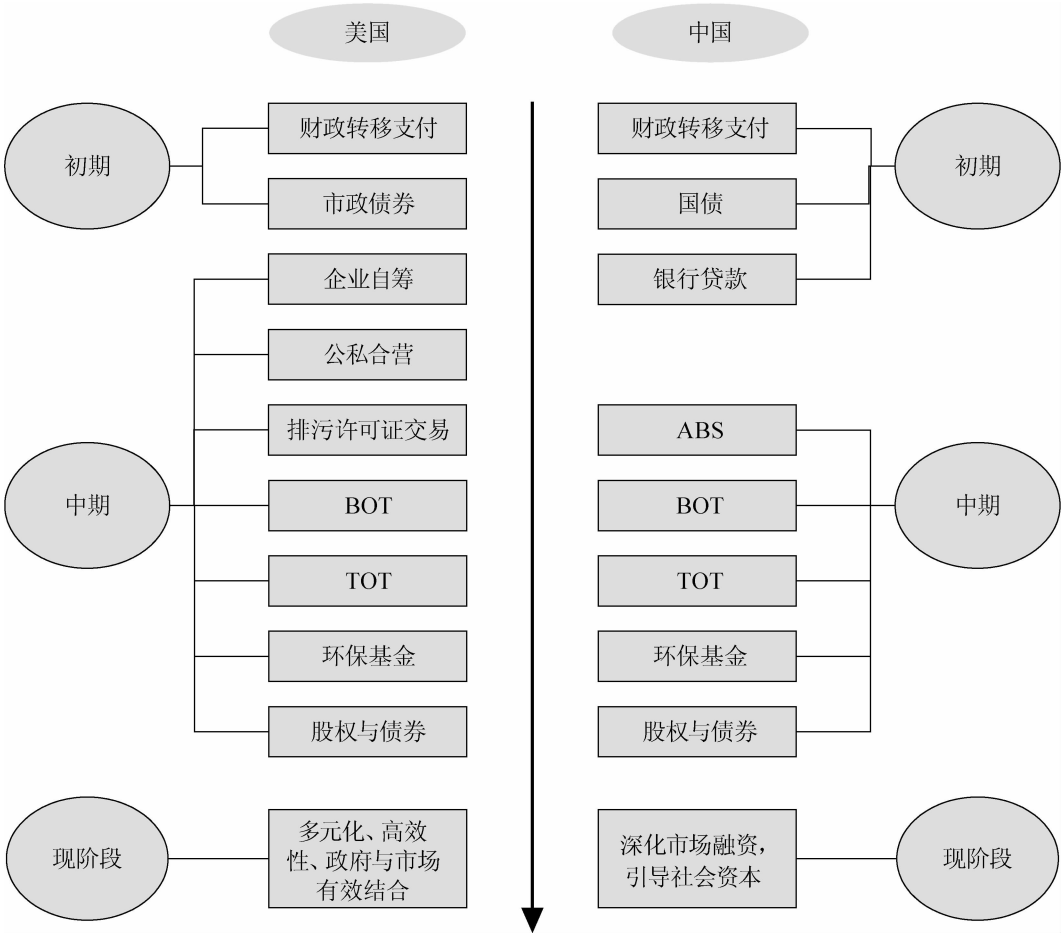


图 5 中美不同发展时期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的选择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选择的时期变迁性在我国已经有所体现。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初期财政转移支付、国债、银行贷款是三种基本的产业投融资模式，支撑了许多重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三种投融资模式的选择与当时经济体制密切关联，银行贷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点。1990 至今，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投融资模式进入了改革发展期，市场融资开始形成并且逐步成为环保产业投融资的主体，BOT、TOT、ABS、股权与债券、环保产业基金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形成了政府与市场、财政与市场资本相结合的投融资体系。

“十二五”时期，深化市场融资将是产业投融资模式发展的主方向，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环保产业投融资，建立中小环保企业投融资财政担保机制，将是激发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潜力的主要投融资模式。

2. 各类投融资模式投资方向的选择。我国现已建立的各类投融资模式在投资规模、投融资效率、投资项目、投融资门槛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就存在模式选择与投融资项目的合理匹配问题，非合理的匹配选择将造成融资成本高、融资困难、融资效率低等问题。分析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体系发展方向和各类投融资模式的融资特点，“十二五”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模式与投融资项目相匹配的选择（见表 4 所示）：

表 4 主要投融资模式投资方向的选择

投融资模式	投资方向
财政转移支付	公益性项目、市场参与不足的领域。投资项目：重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环境污染治理、新能源开发等。
银行贷款	经营状况良好的环保企业、盈利性良好的环保项目。投资项目：技术开发、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污染防治、环境保护等。
股权、债权	一定规模且经营状况良好的环保企业。投资项目：技术开发、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
国际融资	公益性项目、高盈利性项目。投资项目：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环境污染治理、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开发等。
环保产业基金	规模较大且经营状况良好的环保企业、高盈利性环保项目。投资项目：技术开发、设备制造、节能减排、污染防治、新能源、新材料、环境保护等。
BOT 模式	公共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TOT 模式	公共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ABS 模式	高盈利率项目。投资项目：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制造、技术开发、新材料、新能源等。

四、解决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瓶颈”的建议

建立高效完善的环保产业投融资体系是解决我国环保产业现实之困的有效切入点，对此我国应该从拓展投融资渠道、完善及用活现有投融资模式和创建良好融资环境几方

面入手。

1. 建立民间资本参与的投融资模式。我国环保产业发展迅速，融资需求量巨大，目前政府主导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市场主导下的债券、股权、环保产业基金等模式，难以满足环保产业资金需求，同时我国民间资本储量巨大，积极引导、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环保产业投资，是对现有投融资模式的有效补充。对此需要从如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国家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给予民间资本投资环保产业优惠的利润空间，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通过吸引更多民间资本，从根本上解决环保产业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二是对准备进入或已经投资环保产业、生产环保产品的民间企业，给予最大幅度的政策支持，如行业准入、税收调节等。

2. 完善债权与股权融资模式。2000-2010 年，我国环保企业通过债券和股权融资数量激增，但是这种融资模式对企业规模、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投资项目等方面要求很高，限制了中小环保企业通过债券和股权渠道获取发展资金，而中小环保企业占我国环保企业比重达到 90%以上。因此，我国急需完善现有的债券与股权融资模式，增强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可行性。对此需要从如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推动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降低融资门槛；二是深化发展创业板市场，降低市场进入门槛，让更多的企业通过创业板市场募集发展资金。

3. 灵活运用 BOT 项目融资模式和 TOT 项目融资模式。BOT 模式在我国环保产业发展中运用的最为广泛，模式成熟，有利于降低财政负担，分散投资风险。相对 BOT 模式来说，TOT 模式在我国环保产业发展中运用的较少，然而 TOT 模式优点明显。一是 TOT 融资模式只涉及已建基础项目经营权的转让，不存在产权、股权的让渡，投资风险小；二是减少政府财政压力；三是 TOT 融资的风险比其他融资模式的小，融资资金的成功率比其他融资模式要高；四是制约 TOT 融资模式的体制因素较少，有利于民间资本和外资投资环保产业。

4. 建立环保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银行贷款融资需要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抵押物，而中小环保企业资产规模和交易规模很小，难以提供足值的抵押物品。建立环保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助于解决这种问题，同时有助于提升商业性贷款机构对环保企业贷款融资的积极性。组建环保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采取两种模式：一是环保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以政府出资为主、市场出资为辅，发挥财政政策对环保产业的支撑作用；二是环保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由政府和其他商业担保公司共同出资，并且吸收其他市场主体投资资金，先由政府按照政策标准和市场原则推荐担保对象，然后由商业担保公司按市场化要求进行担保。总之，我国应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导向、信用保障、金融支持、多渠道多形式参与和风险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环保企业信用担保机制。

5. 增强各类投融资模式的融资互补性。投融资模式应用针对性不强以及融资项目与投融资模式选择错配, 导致现有投融资体系涵盖环保领域缩减, 出现一些重要项目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增强融资项目与投融资模式选择的合理匹配, 提高各类投融资模式的投资针对性。财政转移支付和国际融资集中投资于重大环保设施建设、生态保护、环境污染治理、新能源开发等领域; 银行贷款、环保产业基金重点投资于规模较大且经营状况良好的环保企业和高盈利性的环保项目, 如技术开发、设备制造等; 股权、债权融资模式融资门槛高, 适用于具有一定规模、经营状况良好的环保企业, 融资项目包括环保技术开发、环保技术支持等; BOT、TOT、ABS 三类项目投融资模式灵活性强, 模式成熟, 应广泛运用于公共环保项目建设领域; 可建立环保企业信用担保投融资模式, 主要投资于中小企业的环保技术支持及服务等领域。

参考文献: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与并购战略研究》(2012)。
2. 王金南、逯元堂、吴舜泽、严刚、吴悦颖、蒋洪强、朱建华:《国家“十二五”环保产业预测及政策分析》,《中国环保产业》2010 年第 6 期。
3. 温美旺、杨春鹏:《国外环保产业融资机制对我国的启示》,《当代经济》201 年第 1 期。
4. 杨竞萌、王立国:《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效率问题研究》,《当代财经》2009 年第 9 期。
5. 李淑梅:《环保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渠道》,《社会科学家》2008 年第 9 期。
6. 刘丽敏、底萌妍:《我国环境保护投融资方式探析》,《财政研究》2007 年第 9 期。
7. 王莉:《西部环境产业投融资制度创新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8. 王文军:《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9. 丁军:《环境产业融资研究》,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10. 王珺红:《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及效应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1. MA Yunz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a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 China, Energy Procedia, 2011 (5): 275-279.
12. Tiong, Robert L K, Alun, Jahidui. Financial commitments for BOT proj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997 (4).
13. World Bank.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Background to the PPI in Water. <http://lnweb18.worldbank, org/>. 2003.
14. King Robert G, Ross Levine.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 32 (3).
15. J. Vickers. China Project Finance Arrangers[J]. Euromoney Publication, 1993.

责任编辑: 晨 乔

用法治保障改革的平稳进行

张大勇

摘要：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就需要把改革同法治结合起来，通过法治保障改革，也就是把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使改革进程尤其是重大领域的改革做到有序、可控，同时用法治的手段来促进改革，及时对改革成果总结和固化，通过形成制度增强改革执行力、普及力和权威性。本文从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要全面准确理解法治，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最后倡导建立综合改革试验点，通过贯彻民主、法治和德治的治国方略，实现重点领域有突破，各领域均衡发展的格局，并实现群众在改革进程中的真正参与。

关键词：法治 改革 稳定 民主

作者简介：张大勇，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副院长、博士。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现有的矛盾和挑战已不容回避，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攻克体制机制上的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我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在攻坚克难的进程中，面对更多严峻的考验。因为，改革从来就不是风平浪静的，我们始终在风浪中前进，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前景。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不但改革无法推进，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如何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每一

个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思考解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把改革同法治结合起来，通过法治保障改革，这应该是中央在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项事实求是的战略选择。具体讲，把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使改革进程尤其是重大领域的改革做到有序、可控；用法治的手段来促进改革，边整边改中对改革成果及时总结和固化，通过形成制度就能大大增强改革执行力、普及力和权威性，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改革的风险。因此，如何全面准确理解法治，特别是领导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变得格外重要。

一、法治为什么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法治与人治相对立，但都是人类发展历程中基本的治国方法。关于法治，其核心与精髓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强调法律作为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而人治，概括地讲，是要依靠社会中具有高尚道德和高度智慧的贤人智者，并赋予他们决断事物的最终权力来统治国家。那么，与人治相比，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法治？应该承认，贤人智者在智力和道德水平上确实比一般人更高，更有远见。人治的决策方式往往可以当机立断，不仅省时，而且还能周延许多法律照顾不到的地方，即使是好法律也还必须要有贤人和能人来运用。但有两个问题是人治没有办法解决的，一是世界上是否有在一切重要关头都能高瞻远瞩、不犯错误的贤人智者；二是怎样通过某种方式发现并保证这样的人处于适当的治理国家的位置。再看法治，法治要求一切人都要按照既定的普遍为人们知晓的规则办事，而不是凭着自己的主观看法行事，即使对统治者也是如此，以此来防止和减少统治者犯错误和滥用权力。法治和人治都具有其特定的合理性，但相对而言，法治具有更多的普遍合理性。人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社会，但无法避免一个最坏社会的出现，因为人的理性力量永远是有限的，而法治虽不能像圣人贤者一样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社会，却能避免一个最坏社会的产生。由此，法治便成为最可依赖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法治的原因。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在社会需要变革的历史时期，人治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因此更强调贤人和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首创精神。与此同时，领导干部更要树立法治观念，那就是要时刻意识到权力是有边界的。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不仅是改革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其本身也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是否

有明确的界定，有哪些已有的权力需要梳理、简化甚至剔除，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加以廓清。

二、要切实认清法制和法治的不同

法治与法制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相对于政治、经济等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法治则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当然，实行法治的前提是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

我们常讲四句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是依据；“有法必依”，是尊法崇法的观念；“执法必严”，突出法律的执行力；“违法必究”，强调法律的普及力和平等性。从法制和法治的角度讲，除第一句是法制范畴，后三句话应该都属于法治范畴。对领导干部而言，我们不能只重视立法，简单地把做到“有法可依”就视为法治。某种程度讲，一个社会尊法崇法远比拥有健全的法制更为重要。

三、要明确法治到底有没有政治属性

西方的法治与中国的法治是否一样？资本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是否一样？对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法治社会。近代法治的理论、制度和价值观体系发端于西方，发展和完善也在西方。在建设中国法治社会时，我们确实要借鉴西方的理念、制度和管理经验。应该明确，法治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法治建设涉及法律制度，也就必然会触及一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法治与我们的根本冲突不是原理的冲突，而在价值观、根本社会制度等的冲突。法治也没有一个完美理想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具体建设什么样的法治社会，必定是基于各国自己的特殊国情、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规律而定。

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中国在长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同时，已出现了将法治理想化、格式化、神圣化的不良倾向。今天，我们在忠实贯彻法治理念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变相全盘接受了西方关于法治所设定的标准，接受了西方以法治指导我们治国，统领和左右中国治国方略的现实。这种情况下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党政领导干部在思想意识形态和具体治国方式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分歧，不少领导干部错误的认为，我们建设国家的未来就是西方国家的现在。在各领域我们都有相当一

批党员和领导干部不顾中国国情，不切实际，照搬照抄，完全移植并且套用西方法治标准来解读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与中国现实状况严重对立和脱节。长此以往，中国必然面临党员干部变质、国家变色的巨大政治风险和严峻考验。

这些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资助学习、开展培训等种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向党政机关、政法学界等，推销、灌输西方法治模式和理念，其深层次的谋划是要通过西方法治对中国改头换面，让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成为西方的制度和精神附庸。这样的谋划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受到内外两种势力的影响，国内有不少人患上了“幼稚病”，有很多知名的学者教授成为了西方法治的吹鼓手、马前卒，对自己的制度凡是与西方不一致的，就百般指责。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政法界实际产生了一个“政法系”，它不仅包括了法律界不少知名专家学者，还吸收了不少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领导干部、骨干精英。这一股力量鼓吹西方宪政、普世价值、军队国家化等，其实质和根本目的就是要去共产党化、去社会主义，对此我们要特别警惕。

对领导干部而言，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保持敏感、旗帜鲜明、坚持法治的实质，廓清“法治不等于西方法治”这个基本概念，树立法治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的观念。在具体的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中，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稳步推进全社会各领域的法治建设，既不能操之过急，同时也要尽快探索出一条适合的道路。

对领导干部而言，还需要增强法治建设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我们有不少领导干部在与西方的交往和比较中不仅患上了“幼稚病”，同时还患有“软骨病”。从建党到建国、到改革开放，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人类奇迹，马克思主义也通过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早已成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这样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国情，这样的历史进程，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经历过、成功过，中国近代历史中的重大历史进程都是我们自己的首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完全靠别人，或者拾人牙慧是不可能成功的！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国人民向实现“两个一百的目标”前进，对此，我们更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站稳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的头脑。

四、要树立依靠法治根除腐败的信念和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指出：“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这一段关于反腐败问题的讲话不仅显示了党中央一方面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狠抓廉政建设的决心。改革开放 30 余年，我们在各主要领域都出现了贪污腐败现象，致使很多改革措施不能落实到位，尤其在涉及民生等领域不仅没有真正惠及民众，反而被少数利益集团钻了空子，逐渐形成了深化改革的强大阻力，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苏共垮台的教训很多，但有两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那就是党内形成权贵阶层和党政官员的贪污腐化。新华社原驻莫斯科分社的记者对苏联解体的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为什么？一是因为苏共执政的群众基础没有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大批党内各领域掌权的骨干精英正在等待（或者说期待）共产党政权“静悄悄”的倒台，这样，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将不再被追究，违法所得也将合法化，甚至还可以借政权更替之名浑水摸鱼。事实证明，在随后近乎野蛮的私有化进程中，最大的得利者就是苏共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

目前，国内也出现了少数利益集团与境外资本相互勾结利用，在中国兴风作浪，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性大大增加，若不采取措施将会导致严重后果。今天，中国的改革正进入深水区，所触动的利益面将会更多、更大、更广，同时因分配不公等各种矛盾引发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如果不能在反腐败问题上取得根本成效，改革深入的进程不仅会产生更多的漏洞和腐败，还会被少数人利用，借此要挟民意，打乱改革整体部署，让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对于改革开放产生更多的不信任。能否根治腐败确实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真正惠民、能否平稳进行，以及国家和社会能否平稳发展。只有依靠法治的方式和力量才能根治腐败，保障改革的平稳进行。

古今中外的当政者无不希望有一个风清气正的官场，朱元璋称帝后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运动，数十年间，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 13 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但是，贪官还是一茬接一茬。连朱元璋都感叹，为什么官员会不怕死的去贪污。还有一个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腐败现象已成为全社会的毒瘤，在警界更甚。自廉政公署成立后，先后在警界展开过数十次的反贪行动，抓获数十个团伙，警界风气确实有所变化，但也造成了 1977 年警察与廉署的大冲突。最后，港英当局还是采取的折中的办法，对普通警察 1977 年之前的贪腐行为赦免，对 118 名要犯坚决打击，平息了这场冲突。由此可以得知，一是靠威权、靠严刑峻法，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的；二是贪官不

是查出来的，是制度催生的。

近年来，由于中央反贪惩处力度加大，特别是新一届党中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细化了制度反腐，强化了机构反腐，一批大案要案以及一批官员得以查处，通过“苍蝇”、“老虎”一起打，让百姓看到反腐成果和决心，但是，离遏制和铲除腐败根源的目标还相差很远。古人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要从根源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就需要构建一整套预防、教育和惩治的法治体系，首要的就是要治病于未发之前，加大预防力度，扎牢反腐的第一道制度篱笆，使官员做到不能腐；其次就要治病于初起之时，加大思想的教育引导，扎牢反腐的第二道的道德篱笆，使官员做到不想腐；最后才是对腐败分子动手术、下猛药，严肃查处，坚决清除出党员干部队伍，使官员做到不敢腐。2013 年，在透明国际最新公布的全球清廉度排行中，新西兰和丹麦同以 91 分并列榜首。自 2006 年开始，新西兰就一直占据清廉指数排行榜的榜首，到今年已经是连续第 8 年。新西兰是如何做到无官敢贪的？简言之，新西兰政府官员不论级别高低，不仅受法律约束，而且受到公众的监督，同时政府透明公开，社会监督不流于形式。新西兰政府的清廉形象，不仅缘于政府对贪腐官员的零容忍，还缘于政府致力于净化腐败滋生的土壤，缘于通过构建不能、不想和不敢的反腐法治体系，这样才真正让贪腐无处藏身。

五、要明白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大保障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过著名的“窑洞对”，面对黄炎培提出如何跳出“王朝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能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能不能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检验和决定着我们党能否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华丽转身。问题不复杂，解决起来却不简单。

如果把权力比做老虎，制度比做笼子，要老虎进笼子，一是靠老虎的自觉，这很难，二是靠人，那就是驯兽师。这个驯兽师就是人民，具体讲就是民主。只有时时刻刻把领导干部的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这样的权力才不会横冲直撞。同时，民主的参与也能不断修正权力的偏差，让权力始终在健康正确的轨道上运行。约束权力，本身也是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增强社会活力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

目前，我们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法治的发动和推进主体是政府，

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结果必然会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

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于保障法治的重要意义。如果不让民众参与法治建设进程，政府往往会陷入被动，最后还得征求或尊重民意。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当触及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碰到难啃的硬骨头时，发动群众，利用民众的力量，争取民众支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力量汇集，打破利益固化就会相对容易，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民众支持。在改革的攻坚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好好思考并探讨出一条让民众自觉参与，并能充分吸取民众智慧和力量的可行模式，不断将群众路线教育引向深入。

六、要思考法治是不是最完善的治国方法

历史发展到今天，法治仍是人类最为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其作用和地位不可替代。但是，法治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最终和最完善的国家管理制度，法治社会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其本身存在相当多的缺陷：法律条文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领域，法律本身的不完善会造成许多人想方设法钻法律漏洞，也会使许多人因此遭受不白之冤。

宪法和党章都明确规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可以讲法治和德治作为我们党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得到了宪法和党章的认可和保障。领导干部在重视法治的同时，要摒弃简单把德治等同于人治的观念，切实重视德治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加以利用。在我看来，德治至少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以下几个大问题：

第一，中国文化主体性地位问题。清代龚自珍在研究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从中总结了一套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5000年来，依靠“道德”这两个字，中国成为全球唯一绵延至今的大一统国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经过几乎毁灭性的改造，现今绝大多数中青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相反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可以说，经过近百年来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不但没有解决，形势反而越来越严峻。只有恢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和意识，才能够有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主体资格，否则，只会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以德治国”如能充分利用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从而化解当前中国

文化危机。

第二，共产主义信仰问题。共产主义信仰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如果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信念产生动摇，党中央还能靠什么来统一全党 8700 多万党员的思想，还能靠什么来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这确实是一个关系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通过德治，我们可以继续解放思想，用创新的方法，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同社会”相结合，创造性地把共产主义信仰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仰价值观相结合，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共产主义信仰危机。

第三，世界面临的深层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完全是由部分贪婪的金融家人为利用，或者说是其一手制造的监管漏洞造成的，其更深层次原因是西方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长期倚重法治，忽视德治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金融灾难，我们看到了法治的无力，因为法治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避免或者迅速解决这场危机。直到今天，西方社会反思的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并没有深入到道德层面。我们真正需要补上的不仅仅是监管制度的漏洞，我们需要补上的更应是人们道德上的漏洞，这是未来防止再出现类似经济灾难乃至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西方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一个警醒。

1988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在巴黎的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上说：“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 25 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1972 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要解决 21 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就是可悲的。”可以说，几十年前，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就看到了来自东方的德治思想对于解决人类发展困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德治国”也必能为全人类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国家治理的新路来，为整个世界做出表率，那时中国不仅是 21 世纪经济、文化的领导者，同时必定是 21 世纪政治的领导者。

新时期，我们可用“德法互融”模式创造性地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各取所长，各补所短，根本上解决简单将“德法并立”，你管政治，我管精神的观念，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发展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新路。在“德法互融”模式中，法是治理国家的依据，道德是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必须渗透的基本精神。一方面，我们党要通过法治保障人权、民主和自由，通过德治排斥恶法，保障国家能有好的法治；另一方面，我们党要通过德治保障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以及道德层次的不断提高，通过法治来保障国家能有好的德治。法治治标、德治治本，德治结合法治就能有效填补国家管理的权力空白，重塑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实现对国家全方位深层次治理，并使德治得到有效行使和规

范；法治结合德治能使中国国家管理行为有本、有源，从而把握坚定的政治方向。并且，以德治来甄别法治，就能确保树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观，重新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保证广大党员干部不变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变色。

七、保障改革平稳进行的建议

我们正步入改革的深水期，同时我们也正经历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一场大时代的变迁。中国的崛起必定会打破旧有之世界格局，外界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也随之大大增加，同时历年来国内发展矛盾累积，在经济转型关键期也必定要通过一定方式和渠道加以缓解和释放。改革步入深水期，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困难重重，还要预防敌对势力内外勾结，利用矛盾的多发制造事端，应该说，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之大，矛盾和问题之复杂前所未有的，所经受的考验也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也应树立起必胜的信心，诚如毛泽东同志所激励我们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这个发展的关键期，我们首要的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方向性错误，要千方百计保障改革顺利平稳进行。第二，在改革攻坚克难的时候一定要给人民群众以希望，最大限度让群众与党和政府心手相连。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勾画未来7年发展蓝图，民众也满心期待，我们一定不能让人民群众失望，我们必须行动。第三，必须实现改革发展全局可控。“军令状已下，集合号已吹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改革必须落实到位，只有依靠法治的方式和力量才能在各领域改革中做到有序进行，把风险和人为因素降到最低。第四，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创造性和人民的首创精神，立足实际，放眼未来，尝试建立综合改革试验点，不局限于某一领域的改革，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重要领域改革要下决心实现突破，同时还要实现各领域改革的均衡发展。同时，通过贯彻法治、民主和德治的治国方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群众真正参与改革进程，成为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改革才能真正深入下去，真正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责任编辑：李蕊

· 名人观察 ·

改善中国城市财政

黄佩华

摘要：为了满足大规模和高速度的城镇化，中国城市财政体系已经处于极度不健康状态，面临着许多问题，使城市财政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应该是中国政府未来政策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中国 城市 财政

作者简介：黄佩华，牛津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专业教授、跨学科领域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一、中国城市财政处于不健康状态

城镇化是过去 30 年来中国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城镇化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已有 5 亿人进入城市。仅在 2000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增加了 2.1 亿，而同期全国总人口仅增加了 7300 万。上海的人口在 2010 年人口普查中比 2000 年增长了 44%，从 1600 万增加至 2300 万。而北京的人口仅在 2008 年至 2010 年的 3 年间就增加了 150 万，每年平均增长 50 万。

为了满足如此大规模和高速度的城镇化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任何政府都会感受到巨大压力。在中国，这一挑战更大，因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各个方面，并在改革的头 20 年给政府的税收机制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预算收入从 1978 年占 GDP 的 1/3 下滑至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 11%，直到建立了

新的税收体制才让政府的财政恢复健康。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恰逢财政环境比较困难的时期。而中国城市的财政机制和战略也是在这一艰难的环境下形成的。

尽管开局不利，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貌似为政府有效管理城镇化进程提供了证据。新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现有的城市也在扩建，市中心都被整修得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城市设施貌似也能跟上需求的增长。刚到中国的旅客首先看到的是世界一流的机场，以及从机场到市区的多车道高速公路。城市内遍布着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中国地铁线路的建设速度也创下了世界纪录。

事实上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在这一期间，政府为支持经济增长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业绩卓越。2010年，中国在世界银行155个国家的物流表现指数（LPI）排名中位列27位。这一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货物流通效率的指标。中国的LPI总分为3.49，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分3.55，远远高于和中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但在这一华丽表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城市的公共财政体系已经分崩离析，并迫切需要修复。这一体系鼓励过度投资，对决策者的监督和控制太少，从而造成了低效率和高风险的行为及众多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问题。

二、中国城市财政恶化的过程

在上世纪90年代，财政体制改革没有考虑到城市及城镇化的财政需求。除了沿海富裕省份的少数几个享受特殊政策的城市外，目前的分税制没有为城市提供足够的资源，让它们履行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养老金及市政设施等）的艰巨责任。此外，城市即使有资本支出的需求也不能举债，因此很难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尽管存在这些制约因素，城市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原因是政府领导愿意容忍诸多的非正式和走后门解决方案，使城市既获得了需要的资源，又限制了获得福利的资格。

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中国的城市财政越来越依赖于预算外资源和举债。除了对各种服务收取使用费和征收准税费，城市政府还利用国有资产来获得收入，以弥补预算资金的不足，而土地是它们最主要的资产。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高了土地的价值，土地已成为预算外收入的最大来源。2010年，卖地的收入约占地级市（二级城市）综合财政收入的35%，而税收所占比例仅为30%。除了卖地的收入外，城市还从土地及相关活动中征收各种税费，例如物业税、产权交易契税，以及向建筑及房地产公司征收营业税等等。即使在上海这一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也占到上海总收入的35%及总财政收入增长的50%。

由于市政府不能直接举债，它们只能利用融资平台。这些地方投资公司是市政府部门下属的企业，负责城市设施建设（例如供水、洪水处理、公路和公用事业联网等）的

协调和融资。这一模式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上海进行了试点，现在被广泛应用于中国所有城市，对帮助地方政府实现世界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通常这些地方投资公司作为银行贷款和其它类型融资的主体，将这些资金打包，使用各类城市资产，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作为股本金及抵押品。随着城镇化推高了土地价值，土地现已成为支持地方投资公司的主要资产。

三、中国城市财政面临的问题

中国当今的城市财政是过去 30 年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建立的。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转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从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这些转型推翻了已有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从而必须建立新的体系。由于中央政府疲于应对国有经济下滑带来的财政危机，城市只有靠自己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这一财政漩涡中，城市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必须提供新的社会保障网以取代国有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持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大军。政府只能见机行事，一种做法是限制获得城市服务的资格，以减少对城市服务的需求增长。上世纪 50 年代制定的户口政策为它们提供了方便有效的机制，可以将新的流动人口排除在外；另一种做法是寻找预算外资源，在这个方面城市政府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

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和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果：第一，目前对土地的高度依赖风险很高，而且不可持续。土地价格波动性很大，而且土地收入作为地方财政的支柱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土地使用权的期限是 40-70 年，因此土地是一种会枯竭的资源。例如，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没有土地可卖了。第二，土地和地方投资公司的相互关系已经导致了两者的过度使用，而不断扩大的资源已经弱化了对城市政府的预算约束，并造成了浪费和低效投资。第三，对预算外资源的依赖已导致城市预算的分散化，并使宏观经济调控变得非常困难。收入由不同的机构和地方政府征收，信息也分散在不同的渠道，从而得不到完整的汇报。第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决策体系及中央政府的忽视形成了两级社会。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享受重要及昂贵的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及养老金，而居住在中国城市但事实上是二等公民的 2 亿流动人口则被排斥在外。

四、中国城市财政未来可采取的措施

中国是一个以城市为主的国家。城市如何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服务及基础设施，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福祉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城市财政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应该是中

国政府未来政策日程的重中之重。政府应该采取的重要措施是：

（一）化解地方政府的高负债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估算，截至 2010 年底，地方政府的总负债为 10.7 万亿人民币，其中有一半是 2008 年至 2010 年的财政刺激措施累积的。中国人民银行的估算更高一些，达 14 万亿人民币。由于目前限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使土地市场交易放缓，根据中国银监会在 2011 年年中的初步估算，有 2-3 万亿人民币已经成为不良贷款；根据其它机构的估算，最终会有 8-9 万亿人民币的贷款需要核销（渣打银行 2011 年 7 月 18 日）^①。由于有一半的债务在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到期，中央政府在 2012 年 2 月命令银行将地方政府的贷款展期，并同时寻找解决方案。部分债务的重组及坏账的快速核销将结束过去两年的政策瘫痪，并为城市政府和银行创造更大的操作空间。10.7 万亿人民币的债务相当于当年 GDP 的 27% 和地方政府收入的 263%。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寻找解决方案，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却无能为力，尤其是考虑到债务负担的分布不均。与此同时，政府必须严防银行通过将这些贷款重新包装并以复杂金融产品的形式卖给寻求收益的消费者从而转移金融风险的做法。

（二）建立一个管理地方举债的新框架

为长期基础设施融资而举债既公平又高效。通过延长还款期使之与基础设施（例如桥梁、地铁或学校）收益的较长回收期相匹配，这一融资模式符合用户付费的原则，也有助于确保代际公平。在大多数国家，地方政府可以为资本支出举债，但这一过程需要有效的管理，以便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包括项目风险、还款风险、财政风险、银行系统性风险，以及宏观经济过热的风险。

在中国，不将公共投资纳入预算并将其交给金融系统的做法似乎是对金融市场约束地方政府举债的能力过于信任，很少有人关注潜在的财政风险。2011 年，财政部推出了一个监控和监管框架，要求地方政府汇报它们的债务。这一框架还可以增加一些措施，使其变得更加有效，例如对地方债务进行年度审计，采取步骤确保地方政府的预算制定过程完全透明，定期公开披露主要财政数据，并与财政部完全分享信息。地方政府应该定期和经常汇报它们的直接及或有债务，包括地方投资公司的债务，贷款的还本付息情况（包括偿还贷款是否有违约或延迟），以及举债计划。这是一个明确公共与私营部门界限的机会，可以更清晰地界定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而哪些可以交给市场。这也是一

^①Green, Stephen, China—Solv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Problem, Special Repor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July 18, 2011, https://research.standardchartered.com/configuration/ROW%20Documents/China%20-%20Solving%20the%20local%20government%20debt%20problem_18_07_11_09_13.pdf.

个为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建立完备金融工具（包括长期债券、公私合作及地方投资公司）的机会。作为变相的上市公司，地方投资公司需要仔细的监管和特殊的公司治理安排。

（三）摆脱“土地财政”

城市政府需要获得透明和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包括税收、用户收费及补助金。为了减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城市必须通过扩大税基，寻找替代性收入。提高用户收费及上一级政府转移支付的使用效率还有空间，但问题是中国的很多用户收费（例如教育和医疗保健）已经很高或很繁重，上一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与其它国家相比也已经很多，而且通常使用效率不高。改善城市财政状况最有效的办法是改变分税制，以促进收入和支出的匹配，并反映近期人口构成的变化。

经济学家的普遍共识是：更大的收入自主权，再加上透明和受监管的信贷渠道，可以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的硬约束，使财政管理变得更加审慎。在不进行大规模分税制改革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可以给予城市更大的税收自主权，使它们在征收某些税费（例如车辆税和牌照费）时有一定的自由度。地方政府也可以在中央或与中央分享的税种上征收额外的地方税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是很好的例子。更加激进的做法是考虑引入不同的分税率，例如将更大比例的增值税分给大城市。与此同时，目前将营业税转化为增值税的改革必须谨慎管理，以防止进一步削弱城市的税基，营业税是地方政府最大的税种，占二级和三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收入的 30% 还多。

土地和房地产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城市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原因是城镇化和收入的上升将继续推动对住房需求的增长。创新的方法可以用于建立一个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框架，使城市获得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最近的一个建议是允许私营部门投资，将开发区内大片闲置土地用于建造保障房。

（四）将没有户口的人纳入主流城市服务

将没有户口的人纳入主流城市服务应当是建立和谐社会和投资中国未来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范围内，有近 1/3 的城市人口没有户口。在上海，这一比例从 2000 年人口普查的 20% 上升到 2010 年的 39%。将超过 2 亿人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范围的成本非常高昂，需要中央政府的注资。最理想的做法是将这些成本纳入分税制的改革。在短期内，中央政府可能需要按人头提供补贴，促使城市政府接纳更多的人口，从提供基础教育、大病保险和社会救济开始，然后在预算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逐渐增加其它服务。

经历了 30 年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中国现已成为一个地区间联系更加紧密、流动性更大的社会。许多以前“地方”的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和教育，都有较大的溢出效益，并具备了“国家”的特征。城市财政也应当改变，以反映新的现实。

责任编辑：李蕊

ABSTRACTS

(1)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able Irrational Financial Fear in Indonesia

Liu Zunyi

The Indonesian rupiah has been devalued a lot since the East Asian currency crisi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o prevent capital flight, exchange rate going out of control, and economic sufferings, the top priority would be preventing Indonesian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from irrational financial fears. A timely and resolute intervention would be helpful, yet its success depends on that the foreign exchange resources must be considered sufficient.

(2) About the Revisions o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of China

Xu Xianchun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demand of economic management,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as started a revision o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of China. This article expounds some of the major revisions.

(3)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s Think Tanks

Lu Zhongyuan

In the current arduous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s think tanks should take their ow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Firstly, they should be daring and be good at uncovering the trends and law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staying in the superficial stage and short-term changes; secondly, be more constructive and inclusive; and thirdly, have the ambition and ability to get a bigger global voice.

(4) 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s over the Next Decade Prospects

Chen Wenling

Over the next decade, Chinese economy's growth rate will be little lower than the last decade, yet its development quality will improve greatly; consumption will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will be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will go into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or even finished; and urbanization will reach developed countries' present mean level.

(5) Chinese Common Prosperity: Contents, Features, and Evaluation Indexes

Song Qun

Chinese Common prosperity has become one of Chinese Dream's great goals and one of Chinese people's common views and expectations in the new period. Yet, because of high integrality, comprehensiveness and complexity, its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mature practical experiences haven't been formed so far. This paper tries to define Chinese common prosperity's contents, analyze its features, and make a preliminary design of its evaluation indexes.

(6) Reforming the Chinese Pension System

Robert C. Pozen

Firs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challenges facing the Chinese pension system: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ystem, the lack of advance funding, and the low level of investment returns. Second, it examines the causes of each of these challenges. Third, it puts forward several proposals to address each of these challenges. In each part, this paper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Urban Enterprise Pension System of China.

(7) An Analysis of 2014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Wang Shaohui

The world economy in 2013 faces sluggish growth, yet presents some bright spots. In 2014, growth fore-

casting for developed economies is generally optimistic, but there will be also some risk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Emerging economies being still lively, but will face a slowdown stress. In a word, the 2014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will have a great hope and many difficulties, a full economic recovery and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8) World Economic Growth Will Accelerate in 2014: A Summary of Major Global Institutions' Predictions

Liu Shiguo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will accelerate in 2014, and particularly advanced economies will grow faster than the others. However, gradual exit of the Fed's quantitatively easing monetary policy and increasing accumulation of American and Japanese giant volume of public debt will challenge the world economic governance along with further adjustment in European commercial banks' balance sheets and emerging economies' structural problems.

(9)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The Future Steady Growth Expected

Luo Zhongwei

Cloud computing, mobilizing, socializing, big data, and integrated integration are becoming five hot spots of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will also inject new vitality to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Chines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should strengthen confidence, seiz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new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ransform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implement an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and improve its core competitiveness.

(10) The status, Idea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Modernization in China

Zhou Lingyun & Gu Weidong

Compared with circulation industr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still has a great gap. Facing the new patter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should make a

strategic adjustment by deepening the mechanism reform, speeding up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changing the development mode, in order to increase gradually its modernization 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11)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 Selection and Mode Efficiency

Fang Hong, Yao Peng, Fang Hui & He Qi

Industri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s a cor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mode selection and mode efficien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s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aims at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a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solving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 the total funds.

(12) Ensure the Steady Reform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Zhang Dayong

Chinese reform has entered a crucial period and the deep zone. Stabil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o grasp the unity of the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we need to combine the reform with the rule of law, and ensure the steady reform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That is to say, the reform should be put into the orbit of the rule of law, the reform process, especially the reform of important fields must be keep under control and orderly.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advocates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reform experimental sites, through carrying out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virtue of statecraft, to implement breakthrough on key areas, the pattern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every field, and to realize the masses real participation in the reform process.

Editor: Xie Yunliang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 征稿通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深切缅怀新四军革命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砥柱中流，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伟大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昭展丹青名家并推书画新秀；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等 8 家单位发起“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活动，参展作品将在全国范围征集，经活动艺委会评选后的 320 幅优秀作品于 2015 年 5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展，之后在相关省市巡展并筹台海联展。同时活动中的部分甄选作品将捐由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永世纪念、教育后人。我们诚邀全国画坛诸位艺术家与各界贤达加盟本次展览。

一、组织机构

（一）组委会

主 任：欧阳淞 蔡 武 陈昊苏

副主任：李忠杰 杨志今 左中一 王占生 邓淮生 薛德堂 毋瞩远 黄如军

委 员：张永新 张光东 韩铁成 桂建平 叶小楠 何光耀 乔泰阳 张淮流

刘延淮 周善平 赵黎明 邓小燕 张末生 彭 华 吴长江 赵长青

葛 华 颜 宁 张士明

（二）主办单位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四师淮北分会

中海外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美协及新四军研究会

（五）军史专家委员会

寿小松 黄如军 耿成宽 徐维国 王传厚 张学忠 徐君华

（六）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大为

主 任：吴长江 副主任：徐 里 杜 军 秘书长：丁 杰

二、展出日期、地点

2015 年 5 月（拟定），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展出规模

本次展览展出美术、书法作品 320 余幅，其中特邀美术名家名作百余幅，全国征稿入选优秀作品 100 件，同书法作品共同展出。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作者待遇

1. 该展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具备申请加入中国美协会会员的一次条件。
2. 优秀作品 100 件（税前收藏费：中国画作品 50 件；15000 元 / 件。油画作品 50 件；25000 元 / 件）。
3. 画展将出版画册，每位参展作者均可获赠一本。
4. 组委会向参展作者颁发证书。

五、参展要求

1. 参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照片 1 张（10 寸以上）参加初评，照片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初评入围者接到电话通知后邮寄原作（送原件地址另行通知），同时通过邮局汇寄 150 元评选费进行终评，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终评落选作品退件。

2. 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检测后发现作者使用高仿作品参评，中国美术家协会将在三年内拒绝此作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任何展览活动。

3. 初评投递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如反复多次投递，中国美术家协会将视为无效稿件取消参评资格。

4. 送件要求：中国画幅尺寸不小于 6 尺整张，横竖不限；油画画芯尺寸：不小于 1 米×1 米。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写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寸（高×宽 CM）、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送件须妥善包装并挂号或特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

5. 收作品照片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6. 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 32 号楼 A 座 710，邮编：100083；收件人：张英财；联系电话：（010）59759683。画展信息可登录 www.caanet.org.cn（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站）查看。

六、特别声明

1.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2. 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 年 12 月